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陈毅系列传记



外交部“夺权”前后的周恩来与陈毅

金戈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产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9年之后，1958年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陈毅副总理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

在陈毅接替周恩来所兼外长职务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决定：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由陈毅担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这样，建国后一直为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而超负荷工作的周总理，终于有了一位十分得力的助手。应当说，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长期考察、选择的结果。

这先后两任外长，一位是开国总理，一位是三军元帅；既是上下级，又是老战友。

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一直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批中华英才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仅锻造了两位革命家坚韧的意志和超人的胆识，同时，他们的革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发展、加深。正是这两副铁肩，承担起开创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新局面的重任。到1965年底，已有49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冲决障碍，与日俱增。

然而，就在陈毅外长任职的第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外交格局受到严重干扰，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随之一个个被打乱、被破坏。面对这突如其来、变幻不定的形势，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周恩来、陈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担忧之中。与此同时，几十年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又使得两位革命家奋不顾身地投入面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种种极左言行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复的斗争；其间，这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友谊也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周恩来以身作盾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作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

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

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 1966 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作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

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总理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从中可略见当时“形势”之一斑。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 1966 年 12 月 3 日晚 7 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谈话前，到会学生代表纷纷对外交部派驻外院工作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表示不满。

总理（对一学生）：你今年才 20 多岁嘛，活到我这么大还有 40 年。你晓得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吗？怎么把刘新权说得那么可怕？

学生：刘新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总理（摇头）：还不能作这样的结论。

学生：我们就作了。

总理：我还没有同意。

学生（不服地）：那我们各自保留看法吧！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

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总理：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总理：说反对毛主席还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11月13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总理：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总理：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毛主席说的……

总理（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

总理：你们对陈毅同志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

学生：……反正陈毅同志的许多讲话没起好作用。他还说刘新权是我陈毅派出的，我担一半责任。

总理（点头，满意地）：是负责任的话。刘新权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同志是外交部长，他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这很好。

学生：他还说，将来你们对就立一功，不对就向我道歉。

总理（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总理神情严肃，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总理：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总理：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总理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10天之后，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总理连续5个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问题”不放，实际是逼总理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

下面是双方谈话最后结束时的几段：

学生（咄咄逼人地）：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

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总理：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我一大叠东西（注：即12月13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插断）：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总理（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作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总理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际，有些人的讲话却与周恩来所言大不一样，就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代表的同一天（12月13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为《红旗》杂志发表某篇社论前来“报喜”（注：名曰“报喜”，实则让领导人出来接见，发表讲话，以获取“中央首长”支持的资本，此举为当时北京所司空见惯）的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这位权势显赫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注：凡遇组长陈伯达“称疾”时，她便成为“代组长”）此时此地的这番言词，绝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而已。她实际上是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受阻的情况下，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公开亮出了“后台老板”的招牌，煽动天真的“革命小将”在前面打冲锋，她知道，自己的这篇讲话，当天便会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为题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继而传遍全国。与此同时，她手中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劝阻、引导这些青年学生吗？那便是“给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泼冷水”；你要制止乱打乱揪吗？那便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运动”……

特别是对11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师们的讲话，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满，伺机反扑了。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随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也马上在不同场合与其主子呼应：“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划脚地指责”；“（老师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等等。

在后台老板们的“指点”下，北京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招牌。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来势凶猛，冲及整个北京城。

1967年1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1月

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了。”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不得不减弱下来；中央文革中的某些大员也开始变换出另一副面孔，在不同场合“表态”，称陈毅、叶剑英二位副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云云。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二、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台风骤然刮起，全国上下到处一片“夺权”之声，真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由此，外事口造反派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迫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是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狂澜面前，周恩来稳若泰山。他坚持过去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

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

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

几乎是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1月18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陈毅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实际上是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陈毅在对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

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参加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并未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3000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一、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三、“出于好意”和“希望群众掌握政策”而讲的一些话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四、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五、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总理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总理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时过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帐，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作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师、副总理的日子都过得不好。只是在3月18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

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陈老总在这里指的是40年前，反动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的屠杀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

那时，26岁的陈毅曾亲自组织参加了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群众斗争。当然，陈毅的这句“牢骚”话是私下里说给身边工作人员听的。

然而，在“后台老板”的鼓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们却一天也没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对陈毅等老师和副总理们大兴问罪之师之际，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也争先恐后，一起动作，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们所使用的口号也越来越升级，由原来“批判”、“火烧”，发展为“炮轰”、“打倒”，直至最后竟使用了“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最极端的口号。一时间，对陈毅“问题”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口号，都成为划分某个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的标志，由此，不少群众组织内部出现分裂，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相互不服，纷争不已。最后，只要是坚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陈毅的组织，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衷”的大帽子。

为证明本组织是“坚定的左派”，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还竞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本组织已获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对此，周总理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并为一直拖延不开的第二次外事系统“批陈”大会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反复周旋。下面是总理同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

外交部“联络站”（理直气壮地）：今天上午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支持我们的还有外事系统的9个组织。我们发起游行的主要一点是要求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

根据“揭发”的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从他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

总理：本来“五·一”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不是学校，不是红卫兵，你们是外交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为。

一造反派：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您讲清楚些。

总理：外交部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这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造反派：您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总理：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

众人：总理应当相信群众。现在外交部环境很好。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总理：批判错误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众人：什么条件？

总理：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

众人：好几个月了，他（指陈毅）总也不露面。

总理：是几个月了，但中间有反复嘛，这是正常的，何必多问！

造反派：陈毅不到群众中来，是心里有鬼。

总理：“有鬼”是你们的看法。可你们想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把陈毅同志揪去，这又像什么样子！

造反派：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总理：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众人（命令式地）：请总理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武斗，你要相信群众。

总理（生气地）：我说过，还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要创造条件。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岔开谈开会方式）

一造反派（突然地）：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外院造反派）？

总理：现在还不能交给你们。（气愤地）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对众人）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不要在这里又搞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我说了，陈毅同志现正患肠炎，等肠炎好了，我再陪他参加大会。

造反派：总理，是不是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

总理：那也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交“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应交给我们先批判，然后再交（外交部）联络站。

总理：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众人：我们就是要打倒陈毅。我们下定决心。

总理（激动地）：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随便哪个人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众人：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总理：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的方式。

一造反派（狂妄地）：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总理（气极）：这样子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成熟，大会还是不能开！我现在跟你们商量问题，可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人（和缓下来）：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总理。我们相信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总理：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至于批判“错误”，还要创造条件，现在，我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总之，开大会时我一定要陪陈毅同志来，不光是他，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

否则无法向主席交待。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总理：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刘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你不能这样提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们走？不能这样，那就没有领导了！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当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斩钉截铁，寸步不让：“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以上是这一年的5月间，周恩来连续数次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谈话的一部分。与“二月逆流”前比较，很明显，造反派的口气变得更加强硬，其来势也更加凶猛、更加无所顾忌、咄咄逼人了。从中已不难看出，总理本人当时的困难处境和暗藏的某种危险预兆。

果然，从5月16日起，外事口的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先后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对此，外事系统内部并不一致。许多老干部、党团员和业务骨干等对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十分反感，明确指出：这是“政治性错误”。但在某些造反派组织当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炮打”总理，其“根据”是：一、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二、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三、（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总理主管外事，很多东西违反毛泽东思想；四、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不会和总理没关系（即副总理们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五、运动以来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六、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今天看来，当时的造反派们也并非一味只知打、砸、抢的狂热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是颇有些“头脑”的。然而，和其他地区、其他部门的所有造反派一样，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极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才会不惜将矛头对准为国家、为人民日夜操劳的人民的好总理！

对以上情况，我们的总理并非没有一点预感。5月15日凌晨，他在对外事口造反派讲话中曾发人深省地道出这样一段话：“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10天之后，5月29日，毛泽东也从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特别是外事系统一些造反派，因陈毅“问题”而每每对周恩来进行非难和攻击。

毛泽东挥笔批道：“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的批示虽十分简短，却极不寻常，可称得上字字千钧。首先，

他明确提出了“极左派”这一概念。几个月前，毛泽东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当时指的是搞“打、砸、抢”的造反派。而这次毛泽东又亲自将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炮打、攻击周恩来的言行，均属“极左派”之列。这样一来，不论明里或暗中支持、怂恿这类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极左派”的支持者和后台。这无疑是对江青、康生等一伙人的沉重的一击。此外，毛泽东又特别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们“做说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次日，周恩来在该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这是周恩来以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名义，在同江青、康生一伙对抗的“棋局”中，变被动为主动，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将军”！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批件后有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这永远是个历史之谜了。但在此前对所谓“伍豪事件”（即三十年代初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的污蔑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阴谋事件，康生是这一事件的知情人。1967年5月中旬，江青曾借此伪造的“伍豪启事”非难周恩来。）装聋作哑的康生，这时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了。5月31日，康生在写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称：我建议由文革小组来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毛泽东抨击“极左派”之后虽顾虑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后也在一些场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称“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却一直缄口不言，若无其事，置毛泽东批示于脑后。

尽管真真假假，阳奉阴违，来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毕竟不容抗拒。这一年6、7月间，炮打周恩来的言论有所减少，非难总理的行动也有所收敛。

三、严寒的夏季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的5月至8月间，是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

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情上的摩擦。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对于当时的每个事件的细微末节以至双方“责任”大小、先后等，这里且不去也无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证、评判，但我们不妨从周总理后来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一篇谈话中，来冷静地反思这段沉重的历史：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

很遗憾的。

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甸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

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总理1971年8月间的一次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我们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有关外交部“夺权”的来龙去脉，还需再回过头来从前面说起……

就在毛泽东批评“极左派”以流言袭扰“周公”的那个极不寻常的5月份之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确实“安静”了一阵子。迫于形势，有的造反派组织还不得不就炮打总理的言行展开内部“整风”，作了“检讨”。尽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们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陈毅的“问题”。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挑衅性的语言，陈老总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眼睛。这时，猛见周总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外交部长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不动声色，未置一词，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总理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作“检讨”时，周总理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

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我们的总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怀，又一次宽容了屡犯错误的年轻人。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〇”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谢于7月22日从武汉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与谢富治同日返京）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股脑地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

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卜分委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3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

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对于几个月来一直感到“压抑”的造反派来说，这番讲话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刺激效应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事件中光荣负伤、“胜利”凯旋的一位英雄！这时候，即使是头脑再迟钝的人，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总理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总理的一些看法，这再次证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对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于总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总理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总理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答应了。

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午后1时，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总理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昨天说的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气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总理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僵持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

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而被“王七八”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理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老总临时藏入盥洗室内，在场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紧急向总理报告情况。傍晚时分，由总理亲自布置，北京卫戍区两个连队战士迅速开来，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总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此时，总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行为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8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总理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到晚间8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主席、周总理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晚，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

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冰点”。

4年之后，周总理在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谈话中，对火烧英代办处曾作了这样的叙述：“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对群众的冲、烧行为）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事情很明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之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煽动下一小撮坏人所为，是与中国党和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一次严重破坏。由于这一破坏行为是在外交部“夺权”后不久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才多次将“火烧”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和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开始批判陈伯达反党乱军的罪行时，毛泽东提到过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年6月，在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批运动中，毛泽东又以此为例，痛斥那些“极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而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举世公认的著名外交家周恩来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更是他整个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肤之痛”。也正由于此，我们的总理才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博大胸襟、气度和坦诚，来直接、恰当、稳妥地处理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后工作。

1971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驻华代办处修复工程竣工，英代办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等迁入新居。对此，周恩来曾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向英代办当面表示：1967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周总理批评他说：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总理的亲切教诲，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和启发。之后，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我表示愿意撤销英在台湾淡水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鉴于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条件，两国终于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至此，中英两国

由“半外交关系”进入“全外交关系”，从而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香港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江青痛失“车、马、炮”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那一块“毒瘤”。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场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至其后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确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也暴露了借此“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的坏人。

周恩来正是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文革中那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在这个“拆庙”过程中，王力、关锋二人首当其冲，接下来，便是戚本禹。“小三”（王、关、戚）们的相继倒台，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以下，便是“火烧”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直接或间接较量的过程：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总理批评他们的话，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因而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作文章，一再无理阻挠周总理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中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这之前，周总理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后仍不见好转。总理的保健医生曾把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一造反派头头，却被置之不理！听到以上总理对造反派、更是对那些幕后策划、纵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造反派头头面前大声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扶总理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汽车中，保健医生含泪给病势加重的总理紧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从这时起到28日下午5时，整整36个小时无法工作……

狂热中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前，一项经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二人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有关材料，也已报到毛泽东处。对那篇“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5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了解到周总理因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等情况后，毛泽东建议：

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30日，是处理王力、关锋两人的日子。据王力本人后来回忆，这一天，他与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而戚本禹暂还在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康生给王力加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诬蔑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随即，王、关二人被送入秦城监狱。

9月4日，还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其中，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处置王、关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他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造反派头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46年了（注：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只能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自上海“一月夺权”以来一直大喊“打倒”、“砸烂”、“夺权”和“反翻案”、“反复辟”的笔杆子们，忽然改变了腔调，扭扭捏捏地反起“极左”、“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了。那个“刀笔吏”姚文元，还率先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称得上贼喊捉贼，欲盖

弥彰！

这一年 9 月，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亲自过问、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恶劣影响，并对外交部“夺权”、提“打倒刘、邓、陈”口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言行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关押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们也相继被审查、处理。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其次，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

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分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可以说，在那个政治气候依然冷峻的“严冬季节”，两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战友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是对成千上万为中国前途命运担忧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莫大慰藉；同时，也是对那几个不安好心、专以整人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讽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毅元帅于 1960 年冬天题写的这首著名诗篇，正是数年之后那个“严寒岁月”里周恩来、陈毅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刘军

—

民国初年，人称大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溥仪的族弟溥侗（红豆馆主）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其时，军阀混战，群雄争霸，外贼乘虚而入。一时间，一批批堪称国宝的极为珍贵的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纷纷流向海外。为了国宝的失而复得，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曾不惜倾家荡产，置生死于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作过惊心动魄的争斗，显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功成不居、蒙冤不颓的宝贵品格。解放以后，尤其是 1957 年“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伯驹的名字几近被人遗忘。《张伯驹和陈毅的交往》，就是一个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编者

1952 年春节。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齐白石宅。

齐老先生整整九十岁了。

劈柴胡同（今改为辟才胡同）是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中间还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跨车胡同是其中的一条。周围邻里的人，每每以此而自豪。嘴边上，时不时地要带上一句：“齐白石和我们住街坊。”

今天，从一大早，齐家宅院里就特别热闹，人进人出。张伯驹和王樾一路走，一路聊着什么。进了院子，正碰上于非、陈半丁、王雪涛几个从里面出来。雪下了四五天，昨天夜里就晴了，今天的太阳也就特别大。空气中，弥漫着炖肉的香味和鞭炮的火药味。

到处都可以听见有人在互相唤着：“走哇，逛厂甸去！”

上房里，白发苍苍的齐老先生眯缝着眼睛，正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双清楼主何香凝谈着什么，旁边坐着专程从天津来北京的画家刘奎龄、刘继卣父子。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禅执弟子礼，站在一边。

见到张伯驹和王樾，老人站了起来。笑吟吟地扬了扬手道：“哇，丛碧兄、森然兄，你们也来了。坐，坐！”

叙年齿，张伯驹、王森然他们比齐先生晚了整整一辈人。齐白石为人谦逊热诚，便是晚辈，只要是有书画往来之谊的，一律以“弟”相称相属。

二人依着老例，给齐老拜了年。齐白石见王樾竟穿着军装，皱了皱眉，问道：“森然，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也凑起热闹来了？”

王樾回道：“湖北解放后，陶铸邀我去武汉，接收敌产，所以，我就去了。”

张伯驹在侧补了一句：“他是临时帮忙的，在军管会文教部当副主任，就快完事了。”

齐白石点点头，有些感慨地说：“比来比去，倒是解放了的好。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这几十年，乱子就没停过，这儿打了那儿打，都说自己对，是为民立命。搞来搞去，还是共产党拿了天下。”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捋着胡子说：“那毛泽东，还是正经八辈儿我们湖南的老乡呢，也是湘潭人。前些天他接我到中南海，唠了一下午，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说着，他指了指身后挂着的一幅大字篆书对联道：“我送了他一幅对子，也不知写得对不对？”

王樾看看张伯驹，张伯驹把那幅擘窠大字的对联看了一遍，点点头道：“这字是没得挑了。倒是有个字，面生！”

王樾问道：“对子已经送去了？”

“送去十几天了。”齐白石笑道，神色有些紧张，看着张伯驹道：“哪个字面生？”

张伯驹笑而不语。

论交情，却是王樾同齐先生更熟一些。王樾曾就师于齐白石，后引为知己，往来频密。王樾主攻诗画评论和教育，也爱画，画风老辣沉厚，不拘成格。齐白石老年变法，画风陡然一新，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同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密切关系。不久前，齐白石曾亲书了一幅大字对联，送给王樾，居然是“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十二个大字，亦可见交谊之深厚。

王樾道：“这两句，当出自清季安徽完白山人邓石如的成句。”

齐白石连连点头，道：“对，对，是邓顽伯的话。”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幅对联。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当时，他写了两幅。一幅送给了毛主席，另一幅自己留下来了。

王樾道：“邓石如的原句，下联为‘天是鹤家乡’！”

齐白石面色一沉。好一会儿，才摇摇头道：“对，对，是个‘天’字。当时我就觉着不大顺呢。唉，这下麻烦了，对联已经拿去，如何是好？这要是在过去，可是杀头之罪呢！”

张伯驹微微一笑道：“齐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派。依我之见，这个‘云’字便好过了邓石如的那个‘天’字。上联若是‘地为龙世界’，下联的‘天’字便不可一动。

上联为一个‘海’字，与‘云’字相对，又有什么不妥。”

听张伯驹这么一解释，齐白石才宽了宽心，笑了起来。

话题自此扯开，张伯驹说起了民间传的纪晓岚改唐诗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个十分珍贵的扇面，让纪晓岚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在上面。晓岚得意，一挥而就，写完一看，才发现丢了一个字。那原诗本是一首七绝：‘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一时得意，竟写丢了一个‘间’字。”

齐白石问道：“那怎么办了？”

张伯驹继续说道：“扇子递给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来。这位‘古稀天子’自幼饱读诗书，岂能骗得了他？一问。纪晓岚答得却妙：古人向有‘一字师’之说。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涣这一首，‘间’字原本多余，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让纪晓岚详述。纪晓岚便道：这本是一首词，词，长短句也，方名实相属。这首词念来，却是这样：‘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听罢，连声道好。”

齐白石听了，细细一想，也觉有趣，笑了起来。

小叙片刻，齐白石忽然对张伯驹说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见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告诉我，《伯远帖》已从香港买回来了，不知是花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用的是外国钱。周先生说了，有时间，可以去故宫看一看。”

张伯驹心头一震！

他仿佛听到了久别的亲人的消息。

“听森然说，这《伯远帖》在丛碧兄手上过过？”齐白石问。

张伯驹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听到齐白石问什么，怔了好一会，才对齐白石说：“齐先生，过了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好！”齐白石连连答应着。

方才他们进屋的时候，何香凝便出去了，这时，她同齐白石的夫人胡宝珠一同拉着手进了屋。因为常来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张伯驹问起了他的夫人：“伯驹，这两天慧素怎么没到我那儿去？”

何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健朗，广东口音很重，为人热情豁达。她的画属于岭南画派，高洁冷艳、苍劲峭丽，尤工画松竹花卉，别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刘继瑛、肖淑芳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做几幅大画。自古以来，女画家便寥若晨星，女国画家、女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画家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张伯驹道：“这几天，孩子有病，脱不开。”何香凝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听人说，慧素临过一张吴历的山水，绝了，不少人题词呢，真该看一看。”张伯驹热切地表示了欢迎。大家又闲聊了片刻，便告辞了。

齐白石送他们出了门，临别，不放心地嘱咐道：“对联的事，就不用往外传了，免得不好。”张伯驹见老人慎重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又劝了几句，便离去了。

二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一位稀客：谭得侃。

一晃几年不见，谭得侃明显地老了，皮肤松弛、粗糙，抬头纹又密又深。走起路来，步子也不那么稳了。一双黑黑的眼睛，全无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装，只能带给人一点儿强打精神的感觉。看得出，这几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他从广东来。

北平解放后，为还欠款和维持家用开支，张伯驹把护国寺的一处老宅卖了，全家迁到了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里。这是他最后一点儿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四间北房，西边是一个偏厦。街门冲着后海的南沿，进门是个不大的天井。右手拐过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早年间，这个小院是安顿老家来人临时住一住的，全然是寻常百姓之家的模样。张伯驹会住到这种地方来，谭得侃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领路，他根本就找不到这里了。

一见张伯驹，谭得侃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方便不方便？”

张伯驹自然应承了，让荣管家把谭先生带到客房里安顿了下来，谭得侃一路劳累，洗了洗，便关上门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虽说睡了一大觉，可他的气色依旧不大好，分明有什么心事。

谭得侃是有心人，礼数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来，是沉甸甸的两口大号木箱。谭得侃让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开来，居然全是各地的名产，有南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姑苏的酥糖，山东的牡蛎，江苏的银耳，广西的猴头，浙江的鲤鱼，广东的龙眼和月饼。一个大箱子，装得满满登登。张伯驹颇觉意外，客气了两句，谭得侃却随意说道：“一点土仪，不成样子，胡乱送人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谭先生好似有什么心事？”张伯驹关切地问。

谭得侃目光发涩，微微一叹，好一会儿才说：“张先生，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请借一步说话。”

张伯驹好生疑惑，便把谭得侃请到了书房里，关上了门。

谭得侃闷闷地吸上了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傅湘兄说，你把城里的房子家里的地，都卖了？”

张伯驹点点头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后。”

谭得侃目光发滞，点点头说：“你是聪明人，聪明！得侃当初不服，还想同仁兄一争高下，如今才知道，确是万不及一。”

“谭先生这话是从何讲起？”张伯驹更加不解了。

谭得侃一叹，摇摇头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本来，我这个人抱着宗旨，一件古董不卖的。可那一阵，地贱得让人流口水，钱又毛。我想着是

机会来了呢，一下子买了八千多亩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古董，一下子卖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产党真得了天下，上来就搞土改。开头，我以为是减租减息呢，没怎么当回事。唉，结果是分田地。八千多亩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张伯驹默然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是命中注定，还是因为贪心不足呢？

谭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义买的，要不，非得划个地主，戴上高帽儿游街不可。”谭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嘘了几声，又说：“这还不说。最惨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着上海自古便是块风水宝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阵，房子稀烂贱，买幢三层的楼，才几百块大洋。正好，上海有几个南洋来的商人想买古玩，我就把余下的都拿出来，换了几十万现洋，买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间房子，有楼，有店铺，还有厂。”

“也没收了？”张伯驹问。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这不属于没收之列。

“麻烦就出在这儿！”谭得侃连呼吸也粗重了起来，说道：“这个事，外界一般还不知道呢。民国十七年，孙殿英不是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的陵么？民国三十四年冬天，曹志福又带着遵化县县长贺年汉、民兵队长穆树轩一伙，偷着把同治的惠陵、康熙的景陵也给盗了。东西装了几辆大车。中间，因为穆树轩私藏，让曹司令给崩了。接着，又一口气把咸丰的定陵也给掘了。那东西，真是没少弄。”

张伯驹点着头说：“皇室的载涛、载润上书政府清查，但没有下文，对吧？”

谭得侃恨恨地说：“事情，又毁在项林这个混蛋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他同贺年汉这伙人拉扯上了，劝我买下一点儿来。那价钱，也真是过得去。我动了心，弄了一批回来。在上海卖给那些南洋来的商人的古玩，就是这批东西。事情，就麻烦在这批东西上。”

他说得有些气促，喘吁吁的。张伯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双手把杯子捧着，喝了几口，一声长吁道：“那些东西，让上海军管会的人发现了，全扣了下来。张伯公，听说，你跟共产党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交情挺深。能不能帮着……通融一下。我实在是……倾家荡产了。一念之差，竟落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太没想到……”

说到这里，谭得侃突然停住了。

张伯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谭先生，你让我为难了。”

谭得侃身子一震，呆呆地望着张伯驹，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呼噜了两声，没说出话来。

张伯驹道：“谭先生知道，我是国民党的旧人。同陈仲弘先生，我只是以文会友。”

陈先生精于诗词，每有佳咏，令伯驹钦敬。至于别的方面，他当他的市长，我当我的百姓，是没什么联系的。这类事，我看，倒是谭先生的不是。审时度势，顺乎潮流，是我们文化人的立身之本。发国难财，趁乱投机，正是伯驹一向所不齿的。”

“张伯公，你和陈市长讲一下，成不成另外再说。堂堂一市之长，这么点小事，打个哈欠就办了。在我，却是一生的心血。我家上有老，下有小，这辈子，真是不敢吃、不敢喝，有了病，连剂药都是舍不得吃的……”

他说得声泪俱下，张伯驹却不为之所动。

“谭先生，这件事，伯驹实在难以开口，你还是听凭军管会处理吧。”

谭得侃脸上的肌肉滚动，眉目中，是一种使人看不下去的绝望。

第二天，谭得侃便离去了。

两口箱中的土产，一箱给张伯驹，一箱是打算由张伯驹拿去送给陈毅家的。张伯驹执意让谭得侃把东西带回去，谭得侃死活也不肯拿。张伯驹无奈，便把家中的最后一百块银元包了一包，拿给了谭得侃。

送走谭得侃，慧素道：“他这是贪心不足、机关算尽，聪明过头了。”

张伯驹道：“古人云：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他这是一个太好的例子了。”

这时候，门外一阵热闹，竟是何香凝老太太同几位女画家一齐来串门了。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人是张伯驹夫妇所没想到的——西谛。

西谛比张伯驹略小，三十年代初便已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著述甚多，尤以藏书丰富著称。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留居，致力于进步文化。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二书，享誉甚高，亦为张伯驹十分推重。以往，张伯驹同他来往不多，只是一般的相识，打打招呼而已。一九四一年张伯驹被韦江魂绑架，慧素找到了他，他当即鼎力相助，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通过舆论界向歹徒施加压力。

张伯驹脱出樊笼之后，曾同慧素一道登门道谢。解放后不久，他出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长，事务多多，二人之间的往来便少了。张伯驹为人倨傲，尤其对当官的人，你不理我，我决不去求你，免得让人看低了。一上岁数，他的这股劲就越来越突出了。

“伯驹，老郑来请你出山呢，”何香凝热切地说：“为新中国，你应当干点什么。”

一个人闷在家里，会老得快！”

西谛的本名为郑振铎。

张伯驹忙道：“我一个衰朽之人，能干什么？”

“起码可以自食其力。”何香凝不客气地抢白道：“新中国不喜欢吃闲饭的。我这个人，别看七十多岁了，这些年，还不全是靠着事撑着。真闲下来，什么也不干，早就死了。李济深、蔡廷锴、程潜，还有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都是你熟悉的，哪个不在干事？昨天我碰见了李书城，比你岁数大多了，光绪七年（1881）生人，才比我小三岁，还不是干得热火朝天？最近，准备出任农业部的部长呢。”

张伯驹连连摇头道：“晓圆先生（李书城字晓圆）乃一代人才，伯驹怎么和他比？辛亥武昌举事时，他便是汉阳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了，后来又出任过北京摄政内阁的陆军部总长，乃国之耆宿。伯驹何德何能，只要不给人家添麻烦，也便心满意足了，不敢再奢望什么。”

何香凝冲着西谛一笑，指指张伯驹说道：“瞧丛碧这股劲，竟是比我还老了呢。”

满屋一阵哄笑，闹得张伯驹也有些不大自在起来。

三

何香凝她们是来看画的，于是，慧素取出了《雪峰图》。《雪峰图》画心不大，高二尺许，宽一尺许，原本乃是清六家之一吴历所作。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桃溪居士，江苏常熟人，生于1632年，歿于1718年。他五十

岁上入天主教，后至澳门进耶稣会。

在上海、嘉定一带，传教三十年。其善画山水，初学黄公望、王蒙，丘壑层叠，笔墨苍润。自澳门归来后，画风有变，构图设色更为邃密苍郁，多用干笔焦墨，格调独特。

慧素临这件东西，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呢。

《雪峰图》原为傅湘之父所藏，传到傅湘手中，自是极为珍贵。傅湘个人收藏不多，唯有这一件《雪峰图》，是可以自豪的。

民国二十七年夏天，突然一场豪雨，使傅湘家那栋年久失修的房子四处漏雨。傅湘的夫人和孩子们帮着搬东搬西，竟然把挂在墙上的这幅画给疏忽了。傅太太也知丈夫对这件东西的珍爱，当时，傅湘碰巧外出，没在家。傅太太把画摘下来，卷好，因为孩子在里面叫，她随手把画放到了柜子顶上，一转身，便忘了。雨停了，傅湘回来，一进屋便找这幅画，傅太太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急得傅湘又摔碟子又摔碗。后来，总算在柜子顶上找到，已经让漏进来的雨水泡得面目全非了。傅湘一急，登时说不出话来。

傅太太知道这下祸事大了，吓得周身发抖。

“就你的破衣烂衫是金的，我这东西全不是东西！”傅湘恨得直骂，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里，寻死觅活。书房里的盆盆碗碗，全让他摔了。

他一辈子也没发过这么大脾气。

傅太太跪在房门口，央求他看在孩子分上，看在她多年操持这个家的分上，饶了她这一次，开开门。傅湘不听，房门紧锁，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傅太太怕出人命，打发孩子去请来了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夫妇和傅家，说不上是世交，门第也相去甚远。但张伯驹一向喜欢傅湘的为人，闻听这事，马上同慧素赶到了傅家。

听见是张伯驹夫妇来了，傅湘总算是开了门，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这是要我死哇……”他一声长叹。

张伯驹把残画拿在手里，看了看，又看看慧素。

慧素凝目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

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伯驹上前一步，不屑地一笑道：“傅湘，亏你也是搞了几十年古董字画的人。这幅画，就完了么？”

“这……”傅湘不解。

“古来传下的那么多画，历尽几多风波？吴历的东西，才有几年历史？莫非那古书古画，一浸水，便都不能要了么？这画补一补，重新揭裱一下，根本没问题，行家都看不出来！”

张伯驹的语气肯定而自信。他平素的学问和威望，更为他的话增加了分量。

傅湘半信半疑。

张伯驹道：“傅湘，这件事就由我来办吧，没问题的。小事一桩，何必生那么大的气？瞧把你太太吓的，真有个好歹，你就该后悔了！”

张伯驹夫妇回到家中，马上就开始了着手临摹。仿制古画，第一位重要的是纸。一个时代同一个时代的纸不同，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看就能见真假。张伯驹是鉴赏名家，认出那纸是一种泾县出的熟宣纸，恰好家里收着一张，找出来一量，刚好可以画两幅。

“一幅先练练笔，一幅定稿。印章，我找金禹民帮帮忙。”张伯驹说。

于是，慧素便画了起来。

她胸有成竹。傅湘的原画，经水一浸，已然面目全非，颜色尽脱，只剩下依稀的轮廓，模模糊糊。不过，这难不倒她。她不但熟悉吴历的画风，便是这张《雪峰图》，她也临摹过多次。

整整十天，她足不出户。有伯驹在一旁指点，她更放心大胆了。伯驹的目光如炬，十分挑剔，些微不足，也瞒不过他的眼睛。

这天，金禹民刻的章也送来了，张伯驹亲自试了几个样子，拿准了分寸，小心地印在了临摹成的画上，终于说了一句：“成了。”

慧素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说成了，那就是问题不大了。这方面，慧素佩服得五体投地。

两件临本，一模一样，毫无二致，张伯驹随意拿了一幅，让荣管家拿去荣宝斋裱了，另一幅则留在了家中。

没过几天，便是八月十五了，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好几位都是书画界的名家。有文坛耆宿章士钊、著名画家黄宾虹、书法大师沈尹默、于右任、孔子的后裔孔德成等。后来，张大千和溥儒也来了。

这幅画竟骗过了“伪造大师”张大千。

“哦，丛碧兄，你从哪儿弄了一幅吴历的真家伙来？还没装池呢！”

“是吴历的东西么？”

“骗得了我么？我是干什么的！”张大千的口吻十分肯定。

“值不值三百块大洋？”张伯驹故意问。

张大千道：“你卖么？”

张伯驹呵呵笑起来。

“张大千骗过了汉卿，骗过了罗振玉、陈半丁，天下传奇，想不到，也有受骗的时候！这一幅，是假的！”张伯驹说。

张大千把画又细细地看了一遍，摇摇头道：“丛碧兄便没有看走眼的时候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叫了另外几位道：“心畲兄，沈默老，黄公，潘（伯鹰）兄，你们看看，这件东西莫非有假么？”

章士钊已把画拿在手里，正在细看，沈尹默、黄宾虹都凑了上来。

画面风情古朴，景致深郁，韵味十足，实为佳作。

章士钊点点头道：“确是吴历的风格，真若是临本，临者的技艺也当十分惊人了。”

正在这时，荣管家从外面进来，把一轴刚裱好的字画递到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爱和大千开玩笑，故意走到大千面前，笑笑说道：“那么，我们赌个东道如何？”

张大千自付便是输了，也可赖三分，便不假思索道：“可以。不过，我不会输。你拿出证据来。”

“你若输了，便拜这临画的人为师，不过分吧？”

“可以。”大千叫道：“真有这等高手，还怕求不到呢！”

张伯驹取过画竿，挑住手中那幅画的一头，把另一幅《雪峰图》挂了起来。

两幅画，一模一样。

大千叫道：“怎么能说这一件便是真本、那一件便是临本呢？干这行，我的经验多了。有一回，罗振玉借给我一张苦瓜和尚石涛的中堂山水，我临了一幅，把假的还他，他深信不疑。后来我拿真的去和他换，他还不换

呢！这套猫匿的东西，不新鲜了。”

张伯驹却不理他，招手叫过慧素，笑着说：“哈，人道南张北溥，如今南张要拜到你的门下了，来，看看你这个学生。大千兄，还不快来见过师傅！”

张大千愕然。

他不相信这画竟出自慧素之手。

慧素脸边儿一红，说道：“你胡说什么，能给张先生当学生，慧素便感激不尽了。”

张大千知道慧素为人一向认真、不苟言笑的，听她这么一说，开始相信了，问道：“那……吴历的真本呢？”

慧素从书橱中取出那幅已被水浸坏了的原件，递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细细看了，连连跺足而叹。他这个人却是应了便做的，恭恭敬敬站在慧素面前，行了个大礼，直弄得慧素面红耳赤。

张伯驹把事情原委一说了，众人皆惊叹。这两幅画，慧素临了十四天，伯驹也在边上指点了十四天，可谓炉火纯青。慧素的功力，加上伯驹的眼光，在这幅画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章士钊道，“慧素将来定有造就，我们每人题一句，也为今天留下纪念，如何？”

众人一致说好。伯驹便让家人备好了纸笔。公推之下，章士钊最先挥笔，题了一句。

接下来是黄宾虹、孔德成、沈尹默、潘伯鹰、溥心畲。张大千早已想好了句子，拿过笔来，也不犹豫，便写了一行：

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扬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放下笔，张大千又道：“丛碧兄，这重男轻女，实在是要不得了。依弟之见，莫若让大家都看一看，你把这一幅也裱了，裱得大一点儿，给人们留下题词的地方，将来，也算是个纪念物儿呢。”

张伯驹点头称是。

待众人走后，张伯驹便亲自拿上另一幅《雪峰图》，让人裱成了中堂大幅，所留空白，远大于画心，几位名家的题字，也裱在了上面。未久，这件事越传越广，许多人闻讯而来，一饱眼福，并于画上题词。时间不长，便已题满了。题词的人，达五十多个，蔚为奇观。

画一挂出来，便是满堂彩！

大家细辨着在画上题名的人，只见夏敬观题道：“妙似冰蟾笔，能追墨井踪，为谙松柏性，写出岁寒容。”

陈庸题道：“墨井安能独擅名，纤纤女手白描成。漫劳重立门前雪，云水光中老眼明！”

傅湘题道：“瀑光寒不流，山容静逾妩，幽入夜未眠，坐玩群玉府。”

众人一一看去，五十多家题咏，直看得眼都花了。

“真正叫人扬眉吐气！”王雪涛的女弟子刘继瑛不胜兴奋地说：“潘大姐给我们女人好好地出了一口气！”

何香凝喜爱地把慧素拢在怀里，笑着说：“我们的张夫人胜过了当年的管夫人（传说中的女画家）呢。女人画山水，也能有这样的造就，真让我们这些老派人羡慕了。是谁说的，女人只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不是也有大匠之笔么？那些老封建，该都让他们看看！”

刘继瑛道：“何老，您也应当在这上面题一句什么。”

“不，我不题，”何香凝得意地一笑道：“让男人们题，也杀杀他们的威风霸气。”

凭什么就该女人众星拱月地捧着男人？”

众人都道痛快，在边上的西谛和张伯驹反倒像是做了天大的错事一般，成了众矢之的。众人说笑一阵，何香凝又问：“伯驹，慧素自打解放后，可是干了不少事，你呢？你干了些什么？”

张伯驹喏喏连声，竟无言以对。当下，勉强答应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当顾问。

又坐了一会，何香凝等人便离去了。临走时，何老把《雪峰图》借了去，说是要让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张伯驹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支笔，呆呆地发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给他沏了一杯热咖啡，放到桌边，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上了门。

他在想到文化部当顾问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总会有一批这样或那样的“遗老遗少”。前朝为官，新朝又为官，向为张伯驹所不齿。他更欣赏史可法、郑成功，自然还有郑所南。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他应当效忠于谁呢？他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不盲从。一旦决定了，便义无反顾。

他还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赖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走。张学良去了台湾，溥心畬、梁容若，都去了台湾。张大千则去了海外。陈诚 1948 年底便去了台湾，给他来过信，劝他去台湾，词义恳切，并夸了一番台湾如何好，如何有发展。可是，他连封信也没回。

他也曾想过：共产党得了天下，会和他们这些国民党的人过不去。解放后，共产党一边搞土改，一边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间还搞了一阵“三反”和“五反”运动，声势大得很。可是，却没有触及他。相反，把他当作“开明人士”对待。从内心来说，他喜欢现在的这种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乎透明，简单，坦率，很少等级的观念，似乎大家都是从小远的地方来，在这儿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没有什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际关系简单、直接。而从前，则复杂得多。那时，每个人都把自己武装了，像一个个圆球。所谓接触，只是那么一点点。礼貌多，真情少。谁也不愿意自己那个球削掉一部分，因为一厢情愿，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触点。像傅湘那样的人，王樾、张大千那样的人，委实太少了。如今呢，却比比皆是……

或许，真是自己的脑子太旧了？门“砰”地一声开了，女儿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爸，有空儿么？”女儿问得突兀。她已经十六岁，十足的大姑娘了，刚刚读高中一年级。

“坐吧。”张伯驹指指旁边的一把椅子。

女儿坐下了，问：“爸，咱们算是什么出身？学校里要填登记表呢？”

“出身？”张伯驹皱眉反问：“问这干么？”

“都要填的呢！”女儿的声音有些发急：“有人说，你是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

张伯驹正色道：“官僚？谁？你爸爸是旧官僚？去问你妈，你爸爸什么时候当过官？”

“那……是什么呢？”女儿有些迷惘了。

“算什么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写上去，人家该说咱们吹牛了。你爷爷，倒可以算个官僚，当过河南督军。你爸爸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想当官，要想当，也早当了。”

“那……算资产阶级么？”女儿认真地问。

“资产阶级？”张伯驹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个么，也算，也不算。咱们家有什么资产呢？抽屉里还有三千多万块钱（当时发行的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这所房子，或许能值五千万，就这么多。”

女儿颇有点失望：“终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张伯驹摇摇头：“咱们家没有地，一分地也没有，河南老家还有块坟地，一个宗祠。”他想了想说：“你把表放在这儿吧，明天我问问再说。”

“爸，您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女儿扁着嘴道：“人家的父亲都上班儿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么说不工作？”张伯驹不愿被女儿看不起，不假思索地说道：“不信，去问你妈！”

女儿高高兴兴地走了，张伯驹也站了起来，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刚刚丢掉了一些什么，也像是刚刚得到了一些什么，觉得一阵轻松。

许多时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样，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与解脱。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从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轻易决定，也不轻易转变。一旦决定了的东西，便不后悔，而且不再去考虑这决定是否正确，只是想怎样才能把事干好。这一次，他的转变可以说是缓慢的，沉重的，却也是发自内心的。

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四

他开始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置下来的一点小事，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多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好评。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多干一点事情。

事业使他年轻了，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到台湾去。

可是，不久，他的热情便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件事，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目光虽然游动，却是有力的，坚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绍，同时，伸出了一只又湿又软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视眼镜，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个执著、自信而富有学识的人。

张伯驹双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产党里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肃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内心。

“我们随便一点，好么？”康生的问话颇有风度，有着一一点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一种领导者的从容。

然后，他不等主人让，便坐下了。

“听夏衍同志说，张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还要多担一点呵！”康生微笑着说，“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来牵头，搞点现代戏。毛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国的舞台上，如果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恐怕说不过去。当然，搞新戏，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不热心，遗老遗少的那一套，让人不舒服。听陈毅同志说，当年你也登过台，唱过《空城计》，对么？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牵头，你看怎么样？”

“我不行。”张伯驹出言无忌，马上回道：“我是个局外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杂，或许还可以，让我牵头，这个我可真是干不来。”

“哦？”康生皱皱眉，颇觉意外，顿了一下，用手轻轻压了压前额的头发，目光炯炯地说：“不要这么肯定，可以先试一试嘛。张先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旧瓶装新酒，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哟！”

张伯驹无言以对。

康生站起来，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最后站在了墙上挂的那幅《雪峰图》前，细细地看了好一会。画是昨天何香凝托刘继瑛送回来的，张伯驹想再欣赏一下，便挂在了那里，没有收起来。

“你认为这种情致很好么？”康生背着身子问。

张伯驹不知他想说什么，便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现在仍挂在这里。”

张伯驹道：“终是一种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吧？”

康生摇摇头，转过身来，口吻宽和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传统，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风，这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张先生是人到了社会主义，心还没到。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是不是？”

张伯驹觉得有些气闷。解放以后，他见过不少国家领导人，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教训的口吻同他说话。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大问题，不可小看。搞现代戏，也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后面推他一把。”

“我是说，对现代戏，我一点也不懂，恐怕……”

“这没什么，会推碾子就会推磨。旧瓶装新酒，旧瓶还是要的嘛。自古以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我们的步子就要大一点儿，口号就要响一点儿，决心也要坚定一点儿。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识形态。如果思想仍停留在从前，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张伯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康生挥了挥手道：“好吧，这个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虑好了，再答复我。”他的声音低了一低，关切地说：“张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我也这

是为了你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抢着干，我还不一定相信呢。”

说着，他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词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兴致勃勃地说。

方才那些关于“传统”之类的议论，一下子全丢到一边去了。

张伯驹让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

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五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

《伯远帖》的手续。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

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一种亵渎呢。后来，在张伯驹手上，又呆了整整八个月。八个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伯远帖》细细地看好一阵，对上面的一笔一划，都印象极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到了脑子里。便是上面的渍点，也印象深深。

今天，他又站到了《伯远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唤。

他强作镇定，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平素罩上蒙着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的照射而损坏画面。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背着一架照像机。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防对画有破坏作用。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

国民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

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于民间的珍贵文物尽数收购下来，以存国粹。后来，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国故委员会，可直到最后，甚至得不到一纸政府的委任。为了和美国老板交谊，政府甚至劝他把《平复帖》拿出来，送给美国人。解放后，正是百端待举，到处都在用钱之时，国家却不惜重金，将此画从香港购回。天渊之别，只一比较，又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一件东西上，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实在太多了。

《伯远帖》静静地躺在绒布的衬底上，显得华贵而精美。书右，是两款乾隆皇帝的亲题，写道：

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 dang 此幅，兰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

御识

又一款题曰：

乾隆丙寅春月，获王 dang 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额，日三希堂。

御笔又识

书左，是一幅吴昌硕的题字，并有一幅小画，老树半石，别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画家赵望云道：“张伯老，都云你收藏巨富，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过，为什么你没把它买下来？”

张伯驹不知从何说起。

千头万绪，又怎么能一下子说得清。

赵望云小张伯驹近十岁，是王 樾的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黄胄、方济众等后起之秀，都师承于他。他久在西北，这边的事不大清楚，这时，正好王 樾过来了，说道：“那时候，他也差不多是个‘无产者’了，买不起呢。”

蓦地，张伯驹又想起了卫福海将《伯远帖》拿走时的情景。可惜，卫福海已于去年底去世。否则，让他一同来看一看，怕是会有更多的感叹呢。

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细细地向慧素说了，慧素也是感触万千。当晚，张伯驹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却见外面月色正好。时钟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铺纸振笔，写了起来：

钟敲夜半窥长沟，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他觉得写的很不理想，太浅，也太杂乱。他的心太冲动，像年轻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两封信。第一封是陈毅寄来的，照例是最近写的几首诗，请他指正。陈毅的诗词有一种大将风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胆，貌似浅显，其义却深，很为张伯驹所喜爱。说起来，当初他与陈毅认识，也是命中有缘呢。

全国解放后，张伯驹与慧素前往苏州扫墓，回来时，应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

一天，旧友丰子恺、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个聚餐会，他去了。

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老词人柳亚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谈起诗词来。听说柳亚子同陈仲弘先生相熟，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托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诗词集转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本来没什么。这几年，他不断地见到一些陈仲弘的诗作，有几首，甚至他都能背出来了，可谓心仪已久。他发觉，在陈仲弘的诗词中，有一种他最缺少的豪迈之气。比起来，陈仲弘的东西是豪放派，若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之悲壮，若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深邃，若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雄壮，而他的东西，则每每总有一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几次想写一些奔放的东西出来，总不能如愿，苦恼了好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对陈仲弘的诗文特别欣赏。

有这样几句，他最为叹绝：

“后死英雄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此去泉台集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严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淋漓酣畅，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见，作此诗词的人，一定是卓犖不凡之人。

后来，他才知道陈仲弘竟然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原来的新四军军长陈毅。

他愕然，失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

“人家一个共产党的大将，会理睬你一个不足挂齿的国民党遗老么？”他在心中暗说。

想不到的是，聚餐会后不久，陈毅便给他来了信，信中对他的诗词大

加赞赏，并指出尤其对哪几首最为喜欢。显见，陈毅已把那本诗词仔细看过了。信中，还给张伯驹寄来几首他的近作，并邀他有时间到家中一坐。张伯驹犹豫再三，终于去了，在陈毅家吃了一餐饭，并谈到很晚。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友谊。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来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纸的公文口袋。打开来，是一封便函，很短，仅寥寥几句话，无非是问候一下，并说那几幅借去的画，夫人和朋友见了都很喜欢之类。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来潮，书章单一幅，尚觉满意，寄上。

张伯驹打开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张宣纸，中间，分两行写了十六个字：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署款为：“康生左手”。

一侧，别有一行行书，写道：

值康生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归来，兴酣而草。

署款为“伴竹”。

慧素走进书房，把这幅字看了看道：“这也是草书么？”

张伯驹点点头道：“对，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一种字体。

字字不连写，流行于两汉时期，史游的《急就章》使用的这种字体，所以叫‘章草’。

应当说，这一幅写得不错。”

慧素道：“怪不得口气那么大，果然有点本事。这一幅，要不要裱起来？”

“先放着吧！”张伯驹淡淡地说。

不知为什么，他不愿同这种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他不愿意勉强自己。

六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空前高涨。

几年的工夫，张伯驹更有了一种“新中国的主人翁”的感觉。

热爱从来离不开参与。在文化部，他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见，提建议。有时，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面上来，供具体办事的人参考。他的见解独特，从不人云亦云、旅进旅退。文化部负责文物的整理与收集、鉴定工作，这上面，张伯驹也付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个现代戏创作小组一直没搞起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借走的那几幅古画，也再没了下文。从内心深处说，他不愿意同那些爱教训人的人在一起，更不愿意听那些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康生不再找他，他也乐得少一点应酬。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他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

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以后，周恩来戎马倥偬，这幅字同许多东西一道都遗失了，可张伯驹这个名字他却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听傅作义、何香凝、茅盾等人谈起过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陈毅有些不服气，说道：“他这是老毛病了，见了好东西不肯撒手，开头说得好听，借。借借就不还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我让颖超和小曹谈一下，慢慢来。否则，对张先生也不好。”

康生同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的。”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然耿耿于怀！

曹轶欧把邓大姐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伯驹这般小气，不识时务，委实是他所没想到的。这几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画、碑帖砚墨，也有几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还未必收呢！张伯驹算个什么人，国民党的遗老。解放初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没拉他去“打靶”，已经便宜他了。如今神气活现起来，以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真正让人切齿。前番让他出山搞现代戏，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干。为几张破画，居然告到了总理那儿去，实在是太过分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帐。

有帐就不怕算，等着吧！

这些，张伯驹一点儿也不知道。

虽说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参加现代戏的创作一事，但他内心里，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还是极为偏爱的。1942至1943年间，高庆奎、言菊朋、余

叔岩接连去世，令张伯驹极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听戏，不去戏园子，怕触动伤心事。高、言、余三位同庚，均生于1890年，又几乎是同死，死时均不过五十岁出头，怎不让人难过。忆起依稀往事，每每怆然泪下。解放后，四宇宁和，万象峥嵘，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几分岁数，从前的爱好又浓了起来。北京的票友、戏迷最多，不相识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戏中找到共同的语言，像张伯驹这样的老戏迷，自然不甘闲呆。他不懂现代戏，但对传统的保留剧目如《让徐州》、《卧龙吊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遥津》等几十个剧目，还是耳熟能详的，高兴时便哼上一段。天桥戏院只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别的事，肯定是场场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剧演员，如长于“方巾丑”的萧长华，演旦角的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文武善能的谭富英，演净角的裘盛戎，演老生的马连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无论如何也要看一场周信芳的《四进士》或是《徐策跑城》。这一年，文化部搞传统剧目的整理等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地参加了，任顾问。虽忙，却乐此不疲，为传统保留剧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许多点子，被授予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名誉理事。康生见到名单上有张伯驹，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为这等于是对着干了。

而张伯驹，却以为这是在为革命做贡献，年届六旬，他反倒更觉年轻了。

七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

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千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吧。”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一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元，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

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前两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轻，把东西卖了，慧素将来怎么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还年轻，才四十岁出头，孩子又小。将来，她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顾忌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总可以收到万儿八千块的租息。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只靠那么一点儿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钱，月月花光。将来自己死了，她们怎么办呢？

再有，女儿已经大了要给她今后的婚事考虑了。没一份像样的嫁妆，在他们这么样的一个家里是很丢人的……

他要强了一辈子，如今老了老了，却要丢人现眼了呢！

慧素见他闷闷不乐，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解不开的心事。她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他这种样子了。他这个人宽心，一般的事，从来不会皱眉头。

“吃饭了？”她小声地问。

“唔。”他随意应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绿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阵酥暖。

人一老，便更觉得妻的可贵了。这么多年了，她总能理解他，总能帮助他。可自己，却总给她添事。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似乎做了什么错事。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么？”妻子的声音分外柔和，充满了关心。

“没……没有。能有什么呢？”他勉强地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老傅今天下午来了，说是谭先生故去了，死的时候很孤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噢！”张伯驹若有所思，应了一声。

谭得侃也算是个精明人呢。对古董字画，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么贪心，何至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上次谭得侃从这里走后，不久，他便听说了，谭得侃被划成了漏网的地主。在新社会，地主是很让人憎的。谭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张伯驹也向陈毅问过了，其中的情况比谭得侃讲得还复杂。陈毅告诉他：那是一批官僚买办的资产，中间的内容很肮脏，政府已按规定全部没收了。

也许，这就叫“鸡飞蛋打”吧？

人世间，有没有“命运”这种东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质相联系。能说谭先生是一时糊涂、走火入魔么？他本来是可以很有发展的，他的收藏之丰富，是罕见的。

然而，从一开始，他的心术便不正，为的是钱，是待价而沽……

这么多年，他也算是阅尽沧桑了。光他认识的人名字写出来，也够挺厚的一本书了。

老谋深算的大帅张作霖，英雄一世，盖棺却仍无法定论；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鸿铭，反对白话文，却提倡纳妾。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的筹安会，陈独秀的激进，蔡元培的宽容，胡适的风流，曹锟的滑稽；鲁迅、郭沫若和一班旧派人物的论战，周作人、张资平的鸳鸯蝴蝶派，胡秋原、苏汶

的“第三种人”。文坛上，有郭沫若、蒋光赤提出的“革命文学”，马上便有了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学”。哦，让人眼花缭乱呢！《玩偶之家》，《温少奶奶的扇子》，林语堂，严复，易卜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几十年中，社会像个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都变得警觉，也变得麻木了。每一种爱，都像一个裂得很深的伤口，充满了痛楚；而每一种恨，却又像吸剩下的烟头，马上就被丢在了脑后。人人身如不系之舟，进，身不由己；退，身不由己，不但失去了选择，而且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从光怪陆离的上海十里洋场，到老气横秋的北京遗老遗少，都让中国这幅大画儿变得让人无法理喻、也无法琢磨了。兵荒马乱，勾心斗角，腐败，堕落，面上的夸夸其谈，实际的口是心非。人们为意气、也为主义而争着，为面子、也为实惠而打着。三民主义，总理遗训，联合政府，国共合作，有真诚相见，也有同床异梦，有听天由命，也有恬不知耻。三十多年的民国史，就这样走马灯似地一场又一场地演着，终于轰然一声大幕落下，让共产党坐了江山。开始，他以为恐怕也是一阵子的事。到底江山谁坐，还不一定呢。历史上，大凡根基牢一点的朝代，灭亡之后，都是要好好乱上几年的。汉朝完了，有三国，魏、蜀、吴，打了几辈人，归到了晋朝的司马氏坐天下。两晋一百五十六年，亡了，又是一场大乱，南北朝，斗了一百七十年，归到了隋朝。隋朝短命，权归李唐。唐朝二百九十年，气数尽了，出了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昙花一现。大清二百多年，亡了，谁知道会乱多少年呢？可是……

共产党倒真是替天行道呢！这江山，看样子真会坐下去了呢。当初，真是把共产党看小了！

北京还是从前的北京，不过名字变了。中央公园改成了中山公园，从前的社稷坛改成了文化宫。可大街上，扬眉吐气的，是从前的那些泥腿子了。这朝代真是变了呢！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国民党没能实现，却让共产党实现了。天下事，就是这么让人不可琢磨……

他微微一叹，闭上了眼睛。

八

整整一天，张伯驹没去上班，关在书房里，一个人闷坐。

他只觉欠慧素的太多了。他不忍把这个帐再增加，因为他恐怕来不及偿还。

毫无疑问，他的心中还有很浓厚的旧的意识，认为女人同男人不一样，即便不叫男尊女卑，终是女人更软弱一点儿。况且，他从未把慧素当成妾，而一直把她作为夫人。

慧素嫁给他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自古以来，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都是什么都靠男人的。可如今……

他看了那么多书，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三百五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没点儿本事，又怎能名登“四大公子”？然而，今天，他却没了一点儿主张。

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这个家，还没有真正穷过呢。

慧素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边，也不知已经站了多久。

“告诉我。”她的语气平稳而坚定，不容有别的选择。

他顿了一下，长出了口气，低声说道：“部里开会，动员大家带头买公债。西谛一次就买了八千，以后还准备再多买一些。”

慧素心中一宽。

“那就买嘛，何必愁成这样子，让我担心了一天，昨天夜里也没敢睡。”语气从容而轻松，全无一点儿顾忌。

“可是，我们……哪儿有多少钱？干把块钱，怎么拿得出手？”

慧素淡淡一笑，看着他，似乎也在等着他。

她已经猜到他的想法了。

“实在不行，恐怕……就得卖……卖点儿字画了。”他的语气实在艰难。“咱们……可不能丢这个人，不能的，慧素。让人家在后面指手划脚，我心里……不安稳。”

“卖《平复帖》？”慧素故意问。

张伯驹嗫嚅，不知说什么好。

“你打算卖给谁呢？谁有那么多钱？”慧素又问道。

张伯驹立时怔住了。这一点，他竟完全没有想到。

慧素又道：“另外，你打算把这些字画传给谁呢？”

“那些，我都已经做嘱，留给你了……”

“给我？”慧素一笑道：“我可背不了这么重的包袱，也操不起这份心。就算是天下太平了，不怕人来抢，可万一虫蛀了，霉坏了，我也负不了责。”张伯驹有些茫然。

藏在老家的那些古画，他们去年已经全部取回来了。有一部分因为保管不当，让虫咬坏了。所幸埋在地下的那些完好如初。一点没变。不过，张伯驹也明白，放在家里，终非长久之计。汉唐以来，人们画了多少画，可以说数也数不清。一个画家，一辈子能画几千张画。一千个画家，就是几百万张。然而，真能传到后世的，又有几张呢？据史书记载，最早的画家可考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曹不兴。相传，孙权命他画屏风，他不小心将一个墨点溅到屏风上，便随手绘成了一只苍蝇。孙权见了，以为是真的，竟用指去弹呢。但在当时，曹不兴的画已属珍品，为人们所珍藏，名气甚大，可是，在南北朝时代，他的画便已经失传。唯有南朝的谢赫，在秘阁中见过一个曹不兴画的龙头，赞曰：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在记载中居第二名的，是西晋时的画家卫协，师法曹不兴，擅画神佛及人物，据传笔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古人曾评道：古画皆略，至协始精。

“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他一生作画甚多，但亦已全部失传。排在第三的是东晋画家戴逵，第一次有了卒年的记载，殁于公元396年。他是安徽宿县地方人，擅画人物山水走兽，被誉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名重一时，可是，作品也全部失传了。再接下来，是东晋时的画家顾恺之，比戴逵略晚，时称“才绝、画绝、痴绝”。他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据说三天便为该寺募捐款几十万。存世的《女史箴图》，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被劫去英国，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可惜的是，这张图只是后人的摹本，原画早已失传。他的另一幅《洛神赋》，其实是宋朝人画的，不过伪托了他的名而已。再往后，是南朝画家宗炳（375~443）、陆探微、张僧繇，都是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像那古传“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故事，便说的是张僧繇，然而，这几位画家，传世的真迹也已经一件也没有了。因此，比他们都晚的隋朝画家展子虔，才领受了“传世第一”的荣誉。由此，亦可见保存之艰难。千千万万珍贵的古画，被无情的历史、沧桑的岁月，一点点地吞噬了，因而才使得传下来的东西那般

稀少而珍贵。

这件《平复帖》，这件《游春图》，又能传多久呢？

想起来让人心颤。

两幅东西都传了一千多年了，被无数的人珍玩过，占有过，几千几万只手拿过它。

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本身。万一有了什么不测，前人心血尽失，后人又将如何评论！

它们真真都是有灵性的呢！否则，为什么单单它们能传下来？

不难想见，便是那权倾天下的帝王将相，在观赏它们的时候，也会肃然起敬，屏住呼吸，在遐思中作冥冥之想，仿佛面对着神圣的祖先一般。再有，那天他去看《伯远帖》，不是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吗？那种神圣，那种庄严，那种忘我的劲头，便是在大雄宝殿里，也难以得到。

那么，谁又能保证它们以后的命运呢？

他感到周生长久的震颤。

慧素的话听上去很平淡，细一想，却包含了更深刻的东西。

“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

“我？”慧素粲然一笑道：“我有两只手，可以自食其力。如今是新中国了，解放七年，天下安宁，四宇和平，你却担心有一天我会吃不上饭、靠卖画过日子？伯驹，别忘了你自己也曾说过：有些时候，财产其实是一种负担。所以，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才那么笨，念不好书；贫穷人家的孩子，反倒聪明伶俐，干成了大事。再说，就算那些画值几百万，能卖么？当初我们买这些画，难道目的就是为了卖大钱么？谭先生的教训，已经足够了！”

“那……你的意思是……”张伯驹看着慧素，似乎在期待。

“你也知道，”慧素不假思索地说：“再珍贵的东西，在私人手里，也很难传到三代人以上。项元汴可谓一代收藏大家，却有了项林这样的败类。他的那些收藏，也早不知都流落到了什么地方。现在，《平复帖》、《游春图》在我们手上，可十年后百年后呢？”

张伯驹不住地点头。

“所以，依我看，干脆，都捐出去，给国家，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你不相信共产党会把它们保存得很好么？”

慧素说得从容、轻松，仿佛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对她的态度，张伯驹深感吃惊。

他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她的美好。

在一般人的眼中，女人爱计较，太实际，顾虑多，私心多。可是慧素却全然不同。

蓦地，他有了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而她却是在他面前突兀而起的一座高山！

他的顾虑、担心显得多可笑噢。

饭桌上，慧素一边给丈夫倒了一小杯北京特产的二锅头酒，一边用体贴的口吻埋怨道：“你呀，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儿似的，一遇上点儿什么事，饭就不好好吃了，一点儿不知道爱惜自己。瞧，肩胛骨都高出来了！”

张伯驹听着，心中甜甜的。

“哎，我怎么那么有福气，会找上了你呢？”他傻傻地一笑，问得没头没脑。

“又说傻话，吃菜呀！”慧素吟吟一笑，也抿了一口酒，脸边红晕晕的。

“人家家里的那些太太，净是把家虎，什么都看得紧紧的。可你，真就那么想得开。

瞧吧，这事，老傅知道了，能愣得说不出话来，你信不信？”他的话显得特别多。周身的每个汗毛孔似乎都充满了兴奋。

“我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呢。”慧素的口吻淡淡的，很平静，像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

她这个人，喜欢把高兴埋在心底。

“把我名下的那二十件，都一起捐出去吧。”她又说了一句。

“嘿！”张伯驹把杯中的酒一口吞了，放下杯子，使劲地搓着双手道：“你真舍得！你说，别人眼里，会怎么看我们呢？”

“管他呢！”慧素道：“普天之下，没有一件事会人人说好的。我们做得光明磊落、坦坦然的，就行了，又不想当官，又不想捞什么好处，问心无愧，由他们说去吧。你瞧着吧，便是老傅，也不理解呢。”

这一晚，张伯驹怎么也睡不好，几次一个人爬起来，到书房里坐上一阵。那二十件东西已经找出来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个包，静静地放在桌子中间。他呆呆地望着它们，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儿女出远门，又像是准备接受一项新的使命。这么多年中，它们带给他的牵挂太多了，感情上，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他觉出来了，这一夜，慧素也没睡好。

这么大的一件事，她又怎么可能不想呢！

九

张伯驹夫妇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锁链般的震动。文化部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正式的捐献仪式，为他们夫妇发了“褒扬奖”和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赞誉鹊起。

那三万块钱，张伯驹本意坚辞不受，怕沾上“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画款，只是对他们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勉强把钱收了下來，并全部拿去买了公债。

了却了这桩心事，他们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般轻松，同时，也像肩起了一个神圣的使命，脚步分外地庄严了起来。他们把那张奖状仔细地收好，放到箱子里，依旧像从前那样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种主人翁的参与感更强烈了。此后，又陆续捐了一百多件。

看着报纸，康生的心中阵阵燥热。

如果他早一点儿知道张伯驹夫妇的手中藏着这样的宝贝，他会对他们采用另一种态度的，会更含蓄，更柔和，更从容。

他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恼火，想发脾气。这么糊里糊涂地“败”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张伯驹也太嚣张了！那次，他看张伯驹的藏品，张伯驹只拿出了那么几件破烂充景，真正的好东西却藏起来，秘而不宣。真是太张狂了！

这么多年，有几个人敢这样对他呢？

西太后的一句“名言”跳进了他的脑际：你若让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这年头，还轮不到这些资产阶级站起来说话呢。

况且，整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本行了。这方面，他的经验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

任你张伯驹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么？

张伯驹有足够的学识，却缺少最起码的狡诈。他又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身后，已经张开了一张报复的大网。

任何时代，当权者只要想找，便一定能够找到那种特务式的帮手。那种人不但机智、灵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许多时候，你甚至会承认他们并不是坏人，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职责，在表现对事业的忠诚。

罗迈便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广东客家人，大高个，肩很宽，全无广东人的那种瘦小与灵巧劲儿。从延安整风时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深沉，不苟言笑，说话时喉音很重，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阶级与使命的庄严。他办事认真，仔细，韧性十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然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但是，无人会怀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交给党的事业。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一种人，生活简单而无奢求，不吸烟，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以“清贫，洁白而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为荣，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财或当官。可惜的是，他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只习惯于接受和服从，从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与分析。因此，康生选中了他，把他视为心腹。

因为他无需伪装，他表里如一，他能够坚决服从。康生需要他的无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诚。许多时候，这样的人才更有威力，因为他身上无懈可击。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一旦被邪恶所掌握，其破坏力常常是毁灭性的。从延安整风、以后的反右斗争，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这种人充当了最出色的打手。当他们从事着破坏的时候，与那些幕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坚定地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康生找来了罗迈，亲手为罗迈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脸上，是长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罗，最近很忙么？昨天轶欧同志还问起你，怎么不去家里玩？没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进了城，便忘了当年的老战友了。”

罗迈听着这亲切的话语，只觉周身一股暖流在游走。

“康生同志，您那么忙，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这难道就不是工作了么？作为一个革命人，应当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们聊天、吃饭、看戏、看书，其实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车跑起来是工作，难道停下来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么？”康生说得从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个年轻人唠家常，平易而近人。

罗迈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番话记到了心里。

从延安整风的时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的大将风度了。在那次整风运动中，康生同志的一双眼睛多么尖锐，挖出了多么隐蔽的“第五纵队”（即隐藏的特务和异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呢。因为可以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本来，我是有点儿私心的，想把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办事放心。可

是再一想，又怕影响了你的发展，所以，就没有调。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哪儿都需要人。我们这些人老了。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挑更重的担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轻轻地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一只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幅丝织中国地图。那地图高一丈，宽一丈五，把整面墙都挡住了。他的样子十分严肃，眯着眼，挺着胸，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叉在腰间，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

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

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惑性，脑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

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

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与蓝天。

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在罗迈整理出来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动情况汇报材料”中，密密麻麻地开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行录。罗迈工作认真而审慎，他开列的名单，分成了三大类：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党言论”，不但有现在的，还有以前的。

时间、地点、证明人，清清楚楚。

张伯驹被划在中间那一类里面。

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也可以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现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语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里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 hong 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有会议记录为证）”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他们那

样讲，也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 hong 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

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可谓是深文周纳了。

康生把关于张伯驹的言论部份仔细地看了两遍，微微一笑。

然后，他用红铅笔在张伯驹的名字旁边，大大地写了“极右”两个字。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

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笔批字，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虽然茅盾、夏衍、郑振铎等部里的领导都为他做解释工作，特别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贵的书画捐献给国家。然而，功不抵过。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样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

并说：他那些东西，刚解放时便应当视为官僚资产，予以没收呢。

张伯驹看了自己的“言论汇编”，也惊得目瞪口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他痛悔，发自内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观上怎样想，客观上，起到了危害党和国家的作用。回头细想一想，委实吓了一跳。

部里的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罗迈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你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还不清楚！”

张伯驹连连点头。

他开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单最后公布，全部上下开始大批判的时候，张伯驹才把被划成右派的事情告诉慧素。

他怕她伤心！

慧素听了，什么也没说。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泪，可是，她的样子却异样平静。

“伯驹，你说心里话。你真的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么？”

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十一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贵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废寝忘食、焚膏继晷，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

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宏、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黽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胡须都是每天早晨她为他梳理的。作为夫妻，还有什么能比共患难更为珍贵的呢。

没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会倒下去。

这天吃过了晚饭，傅湘悄悄地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闻喜的煮饼。

他刚从儿子那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运城盐化局工作，他去看儿子，在运城住了半年多。

回来一听说张伯驹出了事，就马上来了。

“老了老了，又摊上这路事[害！”傅湘的样子极为伤感，叹着气说：“都说大起才有大落，若没有去年那个事，兴许这回就不会。有人说，去年你们那是‘冒进’呢，一下子把那么多东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什么呢，消消停停地呆几天，比什么不好？”

张伯驹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前些天王越来，两个人谈起来，倒还投缘。许多事不必解释，便能理解。而且，王越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王越从武汉回来，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他这个人也有点儿像张伯驹，看见不对的事便要讲，倔起来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由于和院领导意见相左，他顶了几次，一气便退休了。就这样，运动中，还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呢。若不是因为他已经退了休，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认识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谈谈心里话，精神上多少算是有点安慰。

中间，王樾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可你那些《言论》，分明是有人去年就开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不妥的地方。”

张伯驹暗付。

王樾又道：“这个事，应当让上边知道，给总理写信，剖白自己，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算了！将来，对孩子也有影响。”

张伯驹也曾想过，向上面反映一下。可是，一拿起笔，又觉得无从说起，便又放下了。此刻，听傅湘一说，张伯驹的情绪立时变得很坏，脸绷得铁青，一句话也不想说。

冤屈比打击更难忍受。傅湘走后，他开始暗想：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存心整自己呢？否则，为什么那些“言论”那么清清楚楚，时间、地点、证明人，都有。若不是存心整人，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运动是今年夏天才搞开的，可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去年的呢。

他茫然，惶惑，期待。总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吧？

岁月显得异样地沉重与压抑了。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十二

1961年。

几年梦一般的生活，悠悠过去了。

仲秋的一天，慧素掣着一封电报，从外面一边看，一边走进了进来。

“你认识宋振庭这个人么？”慧素把电报递给张伯驹，奇怪地问。

可以说，张伯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认识，起码，也听说过名字。可这位宋振庭，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宋振庭？”张伯驹凝神想了一想，摇摇头，便看那封电报。电报是从吉林省长春市拍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张伯驹不解地望着慧素。

慧素也是一脸迷惘。那问题，也正是她要问的。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封电报更让人怦然心动呢？

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这弱点有时是属于人性本身的。在疯狂的批判游斗之余，能够静静地坐一会儿，已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他希望能够避一避，因为他的意志已经开始溃懈。

那种批斗，不但是一种对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对意志的折磨。莫大的屈辱，使他甚至开始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一次，连慧素叫他，他都惊

得跳了起来。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冤屈，常常都会有些精神变态的。

“宋振庭……”张伯驹默然地念着这个名字，努力在脑际中寻找着。

他确信自己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

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请伯驹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他难道不知道伯驹已经当了“右派分子”么？

夫妇二人相顾无言。

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等一等再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知道张伯驹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贸然答应了，跑去吉林，岂不是会弄得大家尴尬么？若是没有这顶帽子，他们会欣然答应的。老年时候，能够干一点实事，也是一种幸运呢。可是……

他们觉出了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沉重。

一批又一批“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到边远的乡下去“劳动改造”了。文化部牵扯的面比较广，还在抓漏网分子。也有消息说，第一批去“劳改”的人也快走了。罗迈在一次会上很认真地说：“没有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刑，投到监狱里，这已经是一种宽大了，是党的‘给出路’政策的具体体现。下去的右派分子，应当发自内心感谢党的宽大。”

张伯驹听了，也觉得有些情绪上的激动。

他做好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慧素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

以往，慧素一向听他的，可这一次，她却极为坚决。

“我要去。”

“你不是右派，去干什么？”

“那我也要去！”

“不行。”

“不行也要去！”

他火了，吼了起来：“去干什么？丢人现眼么？我一个人丢人就够了，不用把你也搭上。这不是去逛公园！”

“那我也要去。”慧素的声音不高，却异样地坚决，不可动摇。

“不准你去。你在边上，我更烦。”

“烦就烦，时间一长就好了。这么多年，不是也烦过来了么？”慧素平静地说，她正在装一只木箱，认真而从容。

“我想把这套《文苑英华》也带上，闲的时候看一看。会不会带的东西太多了？”她又问。

“走开，我讨厌你！”张伯驹一声狂喝，把桌上一个瓷笔筒摔到了地上。

笔筒摔碎了，几支毛笔七零八落地丢在地上。破碎的瓷片，有的飞到了门外。

慧素的身子怔了一下，手中捧着的一叠书几乎扔到了地上。

结婚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

慧素咬了咬嘴唇，还是把那叠书慢慢地放到了箱子里，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好。

三尺多长的樟木箱子，已经快装满了。

“伯驹，我们走了以后，就让孩子到老傅那儿去吧。老傅……”

她忽然觉出了他的异样，直起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了。家里，只用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太，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老人应了门，拿进了一封电报。

又是从吉林长春市打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望尽速来吉。

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无言地看完了电报，递给了慧素。慧素看了。又递给张伯驹。

“有好人在帮我们。”慧素声音颤抖地说，眼角有些湿润了。

“我们是不是回一封电报去，讲明情况。”张伯驹道：“应当把底细告诉人家。否则，万一他们不知道……”

慧素的目光淡了一淡，接着又是一亮，道：“那边，一定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一定。”

“那也是问一问好。”张伯驹仍觉不大放心，审慎地说。

毕竟他是“右派分子”，慧素不是。声势咄咄的批判与斗争，使他自己也对右派分子恨起来了。这种时候，又有谁能真正相信他，真正理解他；知道他这个“右派分子”同别的那些不一样？

坐到书桌前，他拟了几份电报稿，都觉得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纸短话长，几句话说不清楚。一向以“文才”、“诗才”著称的张伯驹，竟然有了一种无从下笔的枯竭之感。他担心写不清楚，反而引出误会来。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张伯驹亲自到邮电局，把电报发了出去。当他把写好的电报纸交给邮电局的营业员姑娘时，甚至觉出了一丝难堪。

几天后，他收到宋振庭打来的第三封电报。电文很简单，只有六个字：

电悉，盼速来吉。

见到电文，二人都感到一阵狂喜，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人能够永远是坚强的，因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正确。因此，这封电报便驱散了他们心中的疑雾，使幻想变成了真实。二人决定，把家存的剩余一百余件宋元书画，一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以谢知遇之恩。

东西很快便收拾妥当。这时，吉林省委派来的两个同志也到了，协助他们把行李托运去吉林，并为他们办好了调动的手续。显然，在调动的问题上，吉林方面早已和北京联系好，所以十分顺利。春节前夕，一切应当办的事都办完了。

“应当到陈毅同志那儿去辞一下行。”张伯驹说，“你说，他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右派呢？”

慧素想想说：“嫌弃也应当去。不去，是我们缺少了礼数。什么时候，自己的腰板别弯下去，别人就骑不上来。”

张伯驹听出话中有话，惊讶地看了看妻子。显然，妻子早在怀疑是有人在故意整他。

他只顿了一下，便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去了。他这个人，不愿把周围的人想得太坏。

他暗想：陈毅或许还不知道他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

那么，怎么向陈毅同志说呢？

几天前，陈毅还给他们寄来了一幅小手卷，上面是他的两首短诗。诗照例是他的亲笔抄录，字体整齐。这么多天了，张伯驹却没有回一封信去。如若不辞而别，自然是不大合适。自从他戴了右派的帽子，莫说门前冷落，连书信也显见得稀了。因此，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谊更值得珍惜。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张茜，看陈毅同志有没有时间。”慧素主动说。

张伯驹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的心中，也油然升起了一股甜甜的苦涩。

他希望能够被懂得，被原谅，被接受。

他需要朋友的同情。

在他的心目中，陈毅并不是一位大干部，而是一个深沉的朋友，一种精神的象征。

他们虽然更多地是在信中交谈，在诗词中交流，但是，他却觉得他们已经相识了许久，早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接到陈毅的来信，他都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神圣与崇高。也是在陈毅的身上，他们更深切地懂得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

十三

家宴。

酸菜水饺，麻辣豆腐，蒜泥白肉，蚂蚁上树，泡菜，热热闹闹地摆了一大桌。怪味鸡和煎蛋汤是张茜亲自做的，味特别浓。四川的特产“五粮液”酒一倒进杯子里，满室的香味便弥漫了。虽然外面正是冰天雪地，室中却是暖融融的，很有点儿家庭的味道。

孩子们还小，有客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另外一个房子里吃，所以，今晚的“宴会”只有两对夫妇。相识这么久了，他们还是第一次这样没有旁人地坐在一起吃饭呢。

陈毅擎起酒杯，笑着说：“张先生可记得这样一首古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张伯驹不假思索地接道。

“哈，那就饮了这一杯。讲清楚，要喝干的噢！我这个人，在饭桌上可从不愿意吃亏的哟！”陈毅看着慧素，把酒一仰而尽，一言一动，都带着一股子武将的味道。

慧素和张茜挨着坐，觉得十分兴奋。她是不喝酒的。如此热情，知道不能推，屏住呼吸，把一杯酒也一下子喝了进去。顿时，两颊升起一片晕红。张茜比慧素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显得娇小玲珑，一副欢天喜地的活泼劲，全无犹豫地也把酒喝了进去。

可这杯酒，在张伯驹的手中却显得特别地沉重。

餐前，他已把这一段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陈毅细细说了。到戴上右派帽子一段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似乎做了天大的对不起人的错事一般，并告诉陈毅，他们夫妇已应宋振庭之邀，去吉林工作。陈毅耐心地听完，竟什

么也没说。

那样子，像是早已知道，又像是根本没所谓，使得张伯驹心下好生奇怪。接着，就开始吃饭了。一上来，陈毅这么好的兴致，先念了半首古人的诗，倒像是方才张伯驹什么也没对他说一般。

他思付着喝那一小杯酒，喝得很慢，很小心。他能够把事情压在心底，但无法让人认为他没有心事。“喂——”陈毅见张伯驹终于把那杯酒喝完，拖长了声朗然一唤道：“这么斯文，这餐饭可就太难过了。我可是个大食家，放开肚皮能灌一整瓶进去，张茜想拦也拦不住！”他一边说一边动手给几个人面前的杯子又斟上了酒，说道：“还在想刚才那件事？想它干什么！人生一世，受点冤枉有什么奇怪。我这个人，对这个看得最开。‘非其罪，虽累辱而不受’，你还怕事情没有弄明白的那一天么？”

“可是……或者是我错了。”张伯驹辩道。

“你？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毅的声音分外地响了：“你们把最最珍贵的东西捐献给了党，给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倒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嘿，峨嵋山的猴都不信！”

张伯驹心头一热，握酒杯的手颤抖了。

“我有些话，可能是讲得过头了，比如说……”张伯驹想说明。

陈毅摆了摆手。

“我根本不问那些！”他声音重重地说：“如果我陈毅不知道那些珍贵文物在你们心中的位置，我还不这么肯定。你们的事，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几个人讲过了。陈毅熟人多，但朋友不多，我这个人从不滥交朋友。俗话说，朋友是半个自己。如果会吹会拍的就是朋友的话，我陈毅的朋友就太多了。人生在世，难得的是诤友、畏友，光能喝酒不行。伯驹先生，你不至于把我看得也那么糊涂吧？”

慧素一动不动，用力忍着眼边的泪水。

张伯驹的心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这样的话，他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过了。

在部里，他想解释，却没人相信，因为人们不理解，也因为人们太热爱，太单纯。

而在这里，他并没有解释一句，却得到了这样的肯定，换了谁，也会激动的。

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擎着酒杯，猛地往陈毅面前一送。由于过猛，酒泼到了手上，他却一点也没觉察到。“来，喝了这一杯！”他从心底里喊出了声。

感情的第一个浪潮过去了，女人们开始褒贬自己的丈夫，这是她们的乐事，于是，小房里的气氛分外轻松了。

“陈毅同志，这位宋振庭先生，你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人么？”慧素见张伯驹一直不问这个问题，忍不住自己问了出来。

陈毅粲然一笑：“给我点儿时间，我也许想得起来。不过，这并不重要。普天之下，好人终是多数。每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总会表现出来。”他狡猾地眨眨眼说：“我倒挺佩服宋振庭这个家伙。这叫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也可以叫伯乐识马，慧眼寻人。不然的话，上哪儿去找你们这样儿的人才？就算你们肯去，文化部也不一定舍得让你们走呢。你们，也是名人噢，嘿！”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一连打了三封电报来。他怎么知道我们？”慧素仍旧想弄清楚这个底细。她已经隐隐觉出，陈毅似乎同这个事有什么关系。

“唔，八成有点儿灵性。也许，只是灵机一动；也许，是你们忘了。话说回来，张伯驹鼎鼎大名，又有几个不知道的？”陈毅悠悠地一笑说。

张伯驹却认真，思忖着说：“在东北，我真是不认识什么人，我想了半天，确实没有。”

“那只是没想起来！”陈毅哈哈一笑又说：“那张作霖、张学良，不也是东北的么？一个人，多做点好事，总会有人记着的。这道理很简单，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看我这个人共产党，可我相信因果报应。张茜说我这个人得罪人太多，不得好死。可我琢磨，好事也干了不少。将来我死了，有人笑，也会有不少人伤心。”他故意看着张茜说：“别看你对我总是挑毛病，到时候，你比谁都哭得凶。来，吃菜呀，怕不怕辣？”

便是很普通的话，经陈毅的口一说，也显得妙趣横生了。心情开朗了，饭菜也显得格外有味道。这顿饭，吃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饭罢，几个人回到书房，又闲谈了一会儿。看看时候不早了，张伯驹起身告辞。由于此番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每个人都有些伤感。

陈毅从书柜中取出了一轴用牛皮纸包得很仔细的轴画，双手递到了张伯驹的手上，说：“这点小礼物，算个纪念吧。你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另外，见了宋振庭同志，代我和张茜向他们夫妇问好，就说我很感谢他们。”

张伯驹把牛皮纸包接了，嗓子眼发堵，说不出话来。陈毅又道：“到那边以后，可不要把老朋友忘了，常来信。这几年，我自觉在诗词方面，心心得不少。和你们通通信，多有裨益。我这个人，别看肚里墨水不多，眼光还挺挑剔呢。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东西，一个是毛主席，博大宏远，气势咄咄，不拘成格。再一位便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韵律铿锵，字字功夫。到吉林后，可不敢把这支笔扔下哟。人一上了岁数，一旦把笔丢下，再捡起来可就难了。”

握别陈毅夫妇的第三天，张伯驹夫妇便乘火车去东北了。家中的一应事务，托付给老傅照看，却也不必担心。女儿已经大了，能够自理，也已经有了男朋友，是搞考古研究的，人很老实，老两口也很满意。就这样，他们了无牵挂地走了，走向了一片陌生而新鲜的生活。

十四

车到长春，已是傍晚。手忙脚乱地下了火车，一阵北风吹来，两个人都感到了冷。

他们还是第一次到东北来，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

“他们会来么？”慧素帮丈夫裹了裹脖子上的围巾，担心地问。上车前，他们已经给宋振庭拍了电报，告诉了他们到达的时间。然而，这种时候，人总愿意往坏处想。

“不一定收得到。快过年了，好多地方都放了假。”张伯驹弯腰提起一只箱子，对慧素笑笑说：“走吧，先去吃点儿饭，我有点儿饿了。反正没什么行李，自己走吧。”慧素觉得有些失望。

因为有许多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份。毕竟，现在他们的身份不同。

“等一下吧。万一他们来了，找不到我们……多不好。”慧素坚持说。张

伯驹点了点头，放下了手提箱。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少。上车的上车去了，下车的出站走了。火车一声长鸣，也开出了站，站上渐渐静了。没有人来接。

张伯驹微微一笑，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走吧，我们还没有老到走不动。恐怕，人家也很忙。你想，这年头，宣传部能不忙么？”慧素的心绪有些灰冷。两个人提起行李，慢慢地出了站。

“先找旅店，还是先吃饭？”慧素问。依她的意思，是先安顿下来。

“听你的吧。”伯驹答得有些心不在焉。虽然他没有表露出什么来，但心里对没有人来接感到有些失望。

车站的门口人很多，张伯驹似乎是不经意地在人群中看着，希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每个人都似乎是来接站的，但每个人又都不是。

雪花飘飘，在街灯下看去，像是在飞舞。落到脸上，凉滋滋的。张伯驹挺了挺身子，用力说道：“一定是没接到电报，我们走吧，雪越下越大。”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跺了跺脚，向外走去。

一辆人力三轮客车停到了他们身边，一个声音高声搭讪道：“要不要雇车，快——”

张伯驹问道：“附近有什么旅店么？”

“这时候？”蹬车的汉子嘲弄地一笑道：“住大车店，便宜，两毛钱一位。可惜，没有夫妻房嘞！”

张伯驹忙追问道：“没有别的旅店么？”

“明儿清早！今儿黑，您老就忍一宿吧。除非您是大干部，上头来的。”汉子用手往前面一指道：“像那样的，就行了，小汽车候着，一天一宿了，那还差不多。二位，上车吧！”

张伯驹无意地抬头一望，立时怔住了。

汉子指的地方，是一块好大的木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北京来的张伯驹先生

每个字，都有一尺见方，高高地挂着。方才，他们因为没注意高处，竟没有看见。

慧素已经把行李往三轮车上放了，张伯驹一把拉住她道：“走，走，瞧那边，瞧！”声音激动得已经走了调儿。那汉子也愣住了。

两个人提着行李，连忙向那块大牌子走去。

牌子下面，真是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顶上积了好厚的雪，显然已经来了许久。

车旁，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中年人正一边跺脚，一边说着什么。

“恐怕这趟车又没有。”那姑娘说。

“八点钟还有一趟到齐齐哈尔的车。”男人的口吻很耐心。听得出，他们已经来了好久了。

张伯驹走到他们旁边，才猛地停下了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回头看看，慧素正双手提着一只大号的旅行袋跟过来。见伯驹停下了，她便问：“是这儿么？”

张伯驹抬头看了看空中挂的木牌，点了点头。

那姑娘猛然见到了他们，用手一指道：“嘿，可能来了！”那中年男人连忙转过了身子，迎了上去，热切地问：“你们……从北京来？”

“对，对，我叫张伯驹。”

“哈！”那姑娘高兴得直拍手，出言无忌地说：“可把你们等来了！你们的电报上没说坐哪趟车。这时候了，真担心你们到不了呢！”

“嘿，这怎么好意思！”张伯驹喘息着说。由于激动，他的脸泛起了微红。

姑娘和中年人帮他们把行李放到车里，中年人又把那块牌子从电线杆上解了下来。

一边说：“老宋担心我们不认识您，出了这个主意，还挺灵！”

汽车在斯大林大街上平稳地行驶着。张伯驹望着窗外银装了的世界，揣摩着这位“宋部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觉出，这里一定有个谜。

起码，他们今晚不必住大车店了。他并不怕住大车店。但他希望能成为一个体面的客人。

慧素新奇地看着窗外，问那姑娘：“我们现在去哪儿？”

“到宋部长家。宫大姐说了，这顿饭，一定要大家一起吃。今天一上午，宋部长都在车站上等你们，猜你们会上午到。下午他有个汇报会，来不了，才没有来。”姑娘笑笑，又说：“我叫小华，宋部长说了，以后，让我给张老当学生，不知道行不行？”

“宫大姐是谁？”

“宋部长的爱人，你们不知道？”她奇怪地看着慧素道：“天下第一的好人，一点儿没架子的，待人可真心呢！”

宽阔的斯大林大街，笔直地伸向前方。街边树上，积了厚厚的雪，煞是壮观。从今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了，这使得张伯驹心中十分感慨。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车子拐上了一条窄马路，速度也明显降了下来。不一会儿，便驶进了一个大院，绕了几个弯，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中年司机响亮地按了几下喇叭，跳下了车，先为张伯驹拉开了车门。那边平房里，匆匆忙忙地跑出了几个人。司机打开后车厢，一个大个子的中年人抓起最大的一个袋子。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则拿起了张伯驹的手提箱，一边忙不迭地问：“冷吧，快到屋里暖一暖。”

张伯驹猜：这个大个子，可能就是宋振庭了。从气质上，他感觉得出来。

他有点儿紧张，正了正头上的棉帽子，跟在大个子后面走进了房。

房里暖如夏。不一刻，大家都进了屋，热切地道着短长。大个子把一杯热茶双手递给张伯驹，问道：“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不，没什么。”张伯驹接过了茶杯，看着对方的脸。

“我是宋振庭。”大个子微笑着伸出了一只手，轻松地说：“我们好做认识了很久，对不对？”说着，他招招手，那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忙走了过来。不知怎么搞的，她的脸边竟抹上了一点儿面粉，全然像个乡下的妇女。“她叫宫敏章，我爱人，叫她‘小宫’行了。来，吃饭吧，看凉了。”那口吻，像是拉家常。

张伯驹方才的紧张劲儿一下子消失了。他有了一种感觉：回到了自己人中间。

从接到宋振庭的第一封电报时起，他就在心中刻画宋振庭这个人了。此刻真正见了，大家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毫无拘束地东拉西扯着，海北天南聊着，他觉得，那正是自己心中的他。如果说，在陈毅家吃饭，他心中更

多的是崇敬、是负疚，是对明天的迷惘的话，今晚的一切，则是和睦、是亲切，是对周围的放心。桌子一边，慧素和宫大姐攀在一起，小声地说着悄悄话，那劲头，像是已经相熟了二千年。

好猛的酒！一杯下去，周身都热辣辣的了。

“省里决定，就由你来担任省博物馆的副馆长。省里没什么人手，就不准备设立正馆长了。明天，让小华带你去看一看，在西安大路，不算远。是过去的老底子，三层楼。”

张伯驹庄严地点了点头。

他没想到，从三十多岁上，自己便绝意仕途，立志不当官的。老了老了，成了右派，反倒当上官了。而博物馆工作，不但是他熟悉的，而且是他热爱的。

他几次想问问宋振庭，他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可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宋振庭给他介绍着东北的风土人情、奇闻怪事，绘声绘色。虽然是刚到，他已经开始热爱这里了。而且，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饭后，宋振庭领着他们夫妇一起去看了已经布置好的新居。房子离宋振庭的家不远，是个小院子，雪已经扫干净了，房里升上了火。三间北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待客，一间是书房。同北京比起来，似乎是差了一些，可宋振庭是宣传部长，也不过住了这么三间。相比之下，已经是够宽的了。房中，一切都已布置得有条有理，不必他们再操什么心。小华和宫大姐帮着他们打开行李，安放好东西，直到半夜时分了，才离去。

关好房门，张伯驹与慧素对着看了好一会，相视一笑。陌生而熟识的一切，多有意思。

慧素从旅行袋中取出了那一卷东西。陈毅说，要他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

慧素好奇，早已忍不住了。

“打开么？”她问。

“打开！”张伯驹喜不自禁。

慧素小心地拆开了粘得很紧的封套。里面，是一幅裱得很好的立轴。她搬了张凳子，把立轴小心地挂了起来。是一首《冬夜杂咏》：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又题：“书赠伯驹夫妇仲弘一九六一年冬又题。”

两个人肃然立着，两只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力，在他们的周身游走着！

十五

1971年，春。长春市。

虽然地下室里也有电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可在里面呆了两年，猛一走到阳光下来，仍旧感到眼睛被刺得睁不开。他扶着墙，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梦中多次回到过的世界。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前走去。

两年了，真快。这两年中间，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走出那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房一步。七十多岁的人了，刚进去的时候，每一天是多么难熬，他以为不可能活着走出来了。想不到，他又走到了阳光下。

让人莫名其妙的世界！真是老了呢，连步子也走不稳了！他在心里用

力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张伯驹，你还能走，就走下去！”

这条路好长！周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是年轻人的世界，聚在一起，不知正在谈论些什么。自负的人多话，骄傲的人则微哂。红海洋，红袖章，临行喝妈一碗酒，一个个像座黑铁塔……

好热闹的世界，大家的劲头还那么足！

依着放他出来的那个红卫兵的吩咐，他喘吁吁地上了二楼。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他试探着往前走，乡巴佬一样看着门上的字。

“你找谁？”一个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像在唤一条船。

“我……找这的负责人。”

“什么负责人？”一个大个子红卫兵气宇轩昂地站到了他的面前，胳膊上的红袖章足有一尺宽。

“是……红总司吧？”他依稀记起了这个名字。

“红总司？你是什么人？”红卫兵警惕地把他周身打量了一番，又问道：“你从哪儿来？”

“我……来报到。”

“报到？”红卫兵更奇怪了，大声说道：“红总司是反革命组织，一年前就取缔了。”

你认识红总司的哪一个？”

“叫……杨……卫东。”

“他，已经关起来了，政治骗子，小爬虫，野心家。他是你什么人？”红卫兵的架势咄咄逼人了。

“是他派人……把我抓起来的，在地下室里关了两年。”“刚放你？”那红卫兵好生奇怪。

“是，就刚才。”张伯驹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他还不知道“红总司”已经被取缔，说了不算了。可倒退两年，“红总司”的劲头比谁都大，顶得上当年的义和团呢。那杨卫东，比省长还威风，光是私人“警卫”，就有二十多人，男男女女，一律短打扮。走到哪儿，地动山摇，谁敢说个“不”字。

“你是……地窖里的那批‘牛鬼蛇神’？”大个子红卫兵猜出了他的身份。习惯中，人们都把地下室叫做地窖，因为过去那是食堂冬天储存大白菜和土豆的地方。

“我……”他已经习惯了“牛鬼蛇神”这个称呼，点点头。

“那边，第三个门。”大个子朝前面一指，便转身走了。张伯驹定定神，走了过去。

那间房子的门上写着“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他敲了敲门，听见里面有人应了一声，才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里，几个男女红卫兵正在高谈阔论，争着什么，又像是在打情骂俏。他站了半天，竟然没有人理他。他有些尴尬，不知是不是应当退出去。低头看看脚边，却发现了新大陆，

地上丢了许多烂纸。墙边，有几幅揉皱了的轴画。有一幅，已经打开了一米长，是个横幅，上面是茶缸子口那么大的行书。他只扫了一眼，便怔住了。那像是米襄阳的东西！

米襄阳，姓米名芾字南宫，湖北襄阳人，为宋朝四大家苏、黄、米、蔡之一。他的真迹，明清时代已不可多得，可称奇珍。如今，竟像烂纸一般被丢在那里。再看地上那些撕碎了的纸片，有些也是字画的残片，但面目已

无法认出来了。

他感到了心疼！这是在毁灭文明呵！顺着墙边，他慢慢地蹭了过去。在那幅字旁，他镇定了好一会儿，才弯下腰，把那幅字拾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说话的，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一双大眼睛清澈见底。白白净净的脸上，有一抹好看的红晕。

“我……是来报到的。”

“你拿那东西干什么？”口气像刀子那么厉害。

“我……看掉在地上了，怕弄脏了，没别的意思。”

“那都是四旧，封资修的东西，专门毒害老百姓的！”女孩的口气全然是教导。

“是，是。”张伯驹一边说，一边把那幅字仔细卷好，别上了封口的象牙签。封口木杆的边上，贴着一张长条形的标签，上面写着“南宫墨宝”四个小字，赫然正是乾隆皇帝的亲笔。

那女孩冷冷一哼，又问：“你是刚解放的，对吗？”

“是。”

“历史反革命，还是地富反坏？”

“牛鬼蛇神。”张伯驹答道。

那姑娘点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来，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

“识一点儿。”

“填个表儿。”姑娘吩咐道：“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你们一律要下去。”

“可以，可以。”张伯驹连连答应。

他正琢磨怎样才能把那幅“南宫墨宝”带出去，使这件珍宝不致落个引火柴的下场。

“在那儿填吧，填好了，等信儿。”姑娘的口气冷得像十冬腊月的街面，硬梆梆的。

“小玲，电话！”外面有人叫。

那姑娘应着跑出房去。

其余几个人还在说着什么，张伯驹趁他们没注意，把那幅字用脚尖踢到了门外。然后，从桌上拿起笔，飞快地把那张表填了。这时，那姑娘回来了。

张伯驹把表递了过去，只盼快走。

“嚯，你这老头，字儿还不赖呐！乍一看，像个屯老庄。当过屯老庄么——就是屯子里的乡巴佬，庄稼人。记住，去了以后，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好了，你去吧。”

张伯驹如释重负，连连答应着，退了出来，小心地关上了门。站定之后，他四下一看，发现那幅字竟然不见了！他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远处，有个人戴着口罩，正在扫楼道，他忙走了过去。那人身边有个筐子，里面有许多烂纸。张伯驹盯着那个筐，觉得有名堂，一只手探了进去，一下子便摸到了那轴字画。

原来在这儿！他心中一喜，把轴儿拿了出来。身子尚未站稳，却被那个扫楼道的人把轴儿从手中抽了出去。

“你……”他一怔，这才认出，那个人，竟然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宋振庭。

他们都几乎认不出对方了，只在感觉上，听出了对方的呼吸。

“是你么，老宋？”

口罩上的眼睛和悦地一眨。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了。“放进去。”宋振庭的声音很低，同时，眼睛四下一扫。那目光，是坚定而有力的。

张伯驹立时明白了，把那件东西又丢进垃圾筐里，在上面盖上了烂纸。这种地方，手拿着这么一个东西，是马上会被人发现的。

宋振庭猛地转过了身去，又清扫起楼道来。楼梯口，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一群红卫兵正走上楼来。张伯驹知道这里不是久呆的地方，便向楼梯口走去，下了楼。

他多想同宋振庭聊一聊呵！

他慢慢地向家中走去。

慧素在干什么？一别两年了，她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呵。结婚以来，他们还从没有分别过这么久呢。

门上贴着封条！

走近了，他才看清，那封条还是两年前“红总司”贴的。门上挂着锁，已经有了斑斑的红锈。显见，好久没有人过来了。

慧素呢？一颗心立时提了上来。两年了，她会到哪儿去了呢？

透过窗子看里面，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老样子。两年前，红卫兵第三次抄了他的家，然后，便把他带走了，一直关到现在。房里，还是当时抄家的样子：痰盂扣在写字桌上，满地都是碎瓷片和纸，一部精装的《文苑英华》被倒上了墨汁，然后又被脚踩过。砖地上，还能看到墨色的脚印。

就是说，那一天，慧素也被带走了，没有回来过。

一股不祥的恐惧，开始咬噬他的心。他知道，单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长春市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有上千人。那伙发了疯的公狗，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

还有，她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像有些人那样，自寻了短见呢？

他几乎站不稳了，扶住了门。

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使他的心脏承受不了太多的紧张。他有些心慌，上不来气，甚至想大便，耳朵也有些听不清了。他张开嘴，大口地吞着气，有一种渐渐下沉的感觉。脑子里，已经无法思想了。

猛地，他觉得膝下一软，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他心疼！

不知坐了多久，天色渐渐发暗。一阵风吹了过来，带来了一片湿湿的杏花瓣，贴在了脸上。四周是异样的静，听得见风在树梢上走。

他重新站了起来，从门楣上摸到了钥匙。他除了身上带的门钥匙外，为防万一，门楣上还藏了一把。身上的钥匙早被抄走了，想不到，门楣上的那把还在。

费了半天劲儿，他打开了锁，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中土蒙蒙的，又阴又冷。他在门边一张小马扎上坐了一会，觉得好一点儿了。

屋里杂乱异常，他却像是根本没看见，站起来，走到里屋，抬头看着门边的天花板，几节旧的铁皮烟囱还挂在那儿，没人动过，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

陈毅那幅“大雪压青松”，就藏在那几截烟囱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

也许因为那些烟囱太脏，居然忽略了。这两年，他一直担心这件东西会被抄走。

1962年初到吉林来，他们带了上百件古代字画，都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家中唯一令他珍惜的，便是这幅字了。

四年多了，一切，像一场恶梦。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靠边站了。未久，作为“文化界黑司令”的宋振庭，被揪了出来。宋振庭长于写杂文，以“星公”为笔名，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文笔犀利，颇有点鲁迅的风格，蜚声整个东北三省。这样的人，运动一来，自然是首当其冲。北京有个“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他则成了吉林的“小三家村”之首，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抄了宋振庭的家，从宋振庭的笔记本上，他们发现了宋振庭同陈毅的关系，于是，又大作了一番文章。直到这时，张伯驹才真正知道，他和慧素到东北来，正是陈毅同志苦心安排的。

从1966年冬天开始，张伯驹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一共八顶，可称是洋洋大观了。开始，他还能记得被批斗的次数，后来，根本记不清了，完全成了个机器人。造反派来叫，跟上就走。在台上，挂着大牌子，造反派在那里喊口号，他在心里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人们讲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听不见。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争着以“对敌人毫不留情”来表现自己这一派的革命与正确，有几次，连慧素也被他们拉到了台上。

若不是有陈毅这幅字支撑着他们，他们会双双死去！

而且，宋振庭夫妇俩不是也被游斗了么？斗他们的场面，听说更大呢。那可是实心实意为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奋战了几十年的人呵！

他无法理解。

斗他们这样的人，从道理上来讲，还有可以说得过去的地方。斗宋振庭这样的人，又是为什么呢？

尤其看到那些平素点头哈腰、缩肩挤笑、一脸阿谀的人，摇身一变竟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时候，他更无法理解了。在他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派”这个名称，是十分神圣的。

他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只有误会，才可以解释这一切。人与人之间不是经常发生一些误会吗？既然这样，社会和国家有些误会，又么不可以呢？

他忽然很想把陈毅那幅字取下来。抬头看看顶棚的烟囱，离地太高了。慧素若在家，自然没什么问题。当初，还是他扶着凳子，慧素站上去，把东西藏好的呢。

慧素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问题，憋得他真想放声大哭。

她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当右派的不是她，她历史上也没有反过革命。到吉林来后，一直是安分守己，当一个美术教师，与世无争，甚至没得罪过一个人。那么，她去了哪儿呢？有人会把她也关起来，一关关上两年吗？

想象把他自己吓坏了。

他担心她寻了短见。这房子里，有一股阴阴的邪气！

于是，拿到那首诗的念头更强烈了。他从门边拿起一根画竿，那是挂轴画时用的，竿顶有个分叉的铜架。举起画竿，刚好探到烟囱。他用力拨了拨，吊着的烟囱悠了一下，似乎要掉下来。

他拨第二下的时候，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他一慌，马上收竿。殊不料，捆烟囱的线绳已经朽了，一下子断了开来，几截烟囱，砰砰咣咣地打到了他的身上。他站不稳，一下子扶住了门边，闭上了眼睛。

“伯驹”——一个声音冲了进来。

是慧素！

他以为听错了，以为是梦，骂了起来：“你干吗要藏起来！”

一双手扶住了他。他觉出了那双手的熟悉。

然后，他小心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双满是泪水的大服。

他又闭上了眼睛。“伯驹，你……怎么了？”是慧素，在焦灼地问。

他觉出了额角的疼，那是方才烟囱落下时打的。

“慧素？”

“伯驹？”

“真是你？”他又睁开了眼，看到了两行晶莹的泪。

他无法抑制自己，一把搂住了她，委屈万分地哭了起来。

他从五六岁起，便只流过泪，但没有哭过。

流泪同哭是不同的。无声的泪包含了悲痛与坚忍，包含着压抑的恨；而哭却是一种委屈的诉说，是失禁的倾泻。

她第一次看到他哭。

他终于哭过了。

“我知道你关在七号，可是，我不敢叫你，怕你担心。”慧素扶他坐下，静静地说道：“我在三号，和你那里隔了三个房。我知道你回来了，他们说……”

张伯驹用眼睛在屋里找了起来。

终于，他看到了。那幅字好好的，一截烟囱中探出了一个头来。慧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马上明白了，过去把那幅字取了出来。

她用探询的目光问他。他点点头。

于是，慧素把那幅字挂了起来。

房子里立时变得生气勃勃了。

傍黑的时候，宋振庭夫妇来了。慧素已经把房间整理好，并升上了炉子。时间尚在早春，天还有点阴寒。屋里一有了火，马上便是另一番劲头了。四个人坐在房里，热热闹闹地道着别后的故事。原来，宋振庭已经被“解放”，等待分配工作，目前先帮助搞一些杂务。革委会专案组查了宋振庭的祖宗三代，证实确无一个污点，老婆也是个革命干部，因此，便被“解放”了。

“我问过，可能送你们去前郭旗，或者是去农安县。”宋振庭沉着脸说：“中央的‘一号命令’，说是要搞战备，所以要疏散城市人口，好多人都要到乡下去呢。”

“去乡下干什么？”慧素急于弄个明白。

“插队落户。”

“像那些知识青年一样？”

“也许是。”宋振庭皱皱眉，暗叹了一口气，担心地看着张伯驹的身子说：“我担心，张老的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没事！”张伯驹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有慧素在侧，他平添了无数的气力，似乎登时年轻了许多：“一把老骨头了，扔在哪儿也没关系。这两年，还不是挨过来了。”

“我怕帮不了你们多少忙，只好你们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你们记住，普天之下，走到哪儿，也是好人多。”宋振庭声音里，含了一股苦涩，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潘大姐，你多受苦了！”宋振庭说完这句话，一颗泪再也忍不住，悄悄地爬了出来。

宋振庭把那幅劫后余生的“南宫墨宝”带来了，张伯驹看过，认为确是真迹。能够使这样一件珍贵文物免遭厄运，张伯驹心中亦感到一阵欢欣。不知为什么，他有了一种感觉：尽管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前面的路，依旧还有很长，很长。

这一晚，他们一直聊到了天亮。

十七

村子很大，足有七八百户人家。由于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有十几里路，又有公路从村边过，直通长春，所以颇有点小集镇的味道。

张伯驹他们一到村里，便发觉这里对他们不大欢迎。而且，当慧素客气地说了一声“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时，一个辈份很高的老汉一声冷哼，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冷冷地说：“教育？这里不是学堂。那伙子知识青年，把人折腾得还不够！”

他们这一批一共来了三十多人，各村的贫协代表、支部书记在公社里讨价还价地争了一天，才最后确定了每个村里应该分派的人数。张伯驹两口子岁数都大了，谁也不愿意要，推来推去，直到公社同意这个村只收留他们两个人（别的村四至六人不等），大队书记老高才算勉强应承下来。

老高叫高庆思，三十岁，大高个，红脸，说话粗声大气，一张嘴不饶人。

张伯驹的住处是高庆思安排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惹这份麻烦。张伯驹已经七十多了，用老乡们的话来说，是已经老得“只剩一堆渣儿了”，谁都怕他死在自己家里，沾一身的晦气。最后，是在一个五保户的偏院，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土房。大队出钱，买了几样必需的水缸、锅盆之类，就算把他们安顿下来了。

正是小麦拔节、玉米点种的季节，乡下人忙得忘早忘晚，没有喘气的工夫。他们干不了什么正经儿的活，队里便分派他们跟上一批村里的老人小孩去“踩格子”。

初开始，觉得没什么，可走了两根垄，伯驹便吃不住劲了。土很松，踩在上面走，像走在沙漠上一般，十分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一直顶到了中午。回到了土房里，腿往炕上一放，周身便像散了一样，没有一处不疼了。

长这么大，这还是他第一次干田里的活。

就连年轻力壮的知识青年，村里人也不那么待见，更别说这些“残渣余孽”了。他们来村里，分明是给村里添麻烦呢。

比如说，吃水，便成了一件大事。

村里有两口井，都在南头，挑一担水，来回要走二里地。一担水七八十斤，他们怎么担得了？

慧素咬牙，不求人，夜黑人静时，一个人拿个脸盆，到井边去打水。一次端一盆回来，还累得脸发白。毕竟，她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

在村里，用脸盆端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慧素怕被人笑，只好天黑了才去端。一个晚上，要端五六趟。为了省水，他们连衣服也不洗。干一天活，周身脏兮兮的，两个人只能用一盆水，洗了脸再洗脚。夫妇二人以沫相濡，互相鼓励着，度着这艰难的日子，就这样，队里有人还专门和他们过不去。

他们到村的第六天，大队的副书记找到他们，让他们为大队画一幅毛主席像，要画一人高那么大。

“你们不是画家么？画几天能画完？”

“我们……不是画人物的。”慧素解释说。

“画家不会画毛主席像，这可是个态度问题。”

慧素只觉和这样的人讲不清道理。

那个副书记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忽然看到了墙上挂的那幅字，冷冷地说：“这时候了，你们还弄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快点儿摘下来！”

“这不是，是陈毅写的。”

“陈毅？北京那个陈毅？”副书记背着手，在那幅字上扫了一眼道：“是不是真的？我屋里还有毛主席写的字儿呢，一毛钱一张！”

他走到那幅字前，把那上面的诗念了一遍，冷冷一哼道：“嗨，自比是青松呢！有你们这样的青松么。狗尾巴草！”他抓住画轴，微微一笑，便要往下扯。

“放下！”张伯驹吼了出来。

副书记一怔，扭脸看了看张伯驹：“你让我放下我就放，我不是好没面子？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你们来的时候，上级交过底了。你是个军阀，国民党的军阀！”

“你放下！”张伯驹的口气比刚才还硬，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

副书记一用力，把那幅字从墙上拉了下来。上面的横杆被拉断了。

他悠悠地把那幅字卷了起来，晃着膀子，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放聪明点儿，不老实，我下个令，马上就可以开你们的斗争会。”

张伯驹气得脸发青，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出工。

天黑了，慧素去端水。来了这么多天，衣服确实是不洗不行了。

没干活，身子不那么乏，她一连端了六趟，眼见得小水缸快满了，心里挺兴奋，端第七趟时，他带几件内衣到井边，在井边把衣服洗干净了，打了一盆水，把洗好的衣服顶在头上，往回走。刚走了不远，便听见了有人说话。

“他们也太嚣张了，狂得很呢。据说，这几天，他们都没下地去干活！”是那个副书记的声音。

“算啦，何必那么认真？那么大岁数了，就是反动，也有限了，由他们去吧。反正，一不占队里工分，二不占社里的口粮，只当没这回事就算了。再者，兴许他们真有点儿来头。那陈毅，也算是个大人物呢，咱们脑瓜子，

惹不起那些事。”

是大队书记高庆思。显见，他们刚从大队部开会回来。

慧素听得心、里发热，一个不注意，绊到了一块石头上，一下子摔倒了，手中的脸盆扔出去老远。

“什么人？”高庆思大声问。

“是我……”慧素尴尬万状。

高庆思二人走了过来，一见是她，都没说话。

“我……真对不起……”慧素紧张地说。

副书记的态度也和白天分明不同了，他问道：“快起来，看碰着了没有。”

“没……没事？”

高庆思一双冷目在她身上打量了一阵，嘴里“唔”了一声，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高庆思便来了，并送回了副书记拿走的那幅字。

“从今天起，地里的活，你们量力而行，想干就干一点儿；累了就别干。别的事，会有人帮忙的，你们别问就是了。”

他的语气完全是像在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冷冰冰的，像有一股怨气一般。

在这个村里，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最高指示”。说完，他便走了，连个笑模样也没有。

“这是个好人！”张伯驹对慧素说。

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便不那么难熬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呢，一定有人送一桶水过来，刚好装满一小缸。他们吃的米面、烧的柴，也都有人送。当劳动不再成为一种负担时，下田也不那么吃累了。再没人强迫他们，喝斥他们，好像他们头上有顶伞一般，日子便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一转眼，冬天又来临了。北方冬季来得早，刚交十月，便已滴水成冰。

白露那天，宋振庭来了一封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信上没说什么，只是要他们多保重。

正看着信呢，高书记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到这小房里来。脸上，还是冷冰冰的，像挂了一层霜。

“你们，在北京有个房？”他生硬地问。

“有，有个家。”慧素忙说。

“有人么？”

“我女儿在。”

高庆思抚着下巴，愣了片刻，喉音很重地说：“今天，你们去北京吧。”

张伯驹大吃一惊。他担心出了什么事。

高庆思又道：“把东西收拾一下，一会儿有车去火车站。赶晚班的火车，正合适。”

“这……”慧素有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北京？”

“在这儿，冬天能把你们冻死！”

高庆思说完，膀子一晃，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张伯驹愣了一会儿，望着慧素说：“这是怎么回事？”

慧素想了想说：“人家都说，高书记这人，看上去凶得很，其实，心肠最好。不是他，那回蒋副书记真打算开我们的斗争会呢。让他给拦了！”

“北京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张伯驹有些担心。

这时，高书记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说：“别带太多的东西。要有人问，就说到县里看病。”

他们俩立时明白了。

老宋的话委实不假，走到哪儿，也有好人呵！

两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北京。

十八

父母的突然归来，使他们的女儿传彩又惊又喜。若是他们再晚回来几天，传彩便要带着孩子去东北看他们了。传彩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丈夫人很老实，话也不多说一句。

孩子太多，难免操劳。才三十岁出头，传彩已经明显地老了许多。

原来的那个小院，早已又挤进来了四户人家，占去了一多半房子。他们一回来，女儿马上腾出了两间正房，她自己则带着一群孩子挤到了角落中的一个偏厦子里。经历了这一番折腾后，他们生活上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只要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天清闲日子，便是天堂了。

可是，回来才四天，街道的家属委员会便找上门来。

“谁批准你们回北京的？”

“你们有户口么？”

“有没有证明？”

“你们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

慧素忍气压气，陪着笑脸向她们解释，说是组织上批准，回北京看病来的。于是，问话又劈头盖脸地来了：

“什么病？分明是假的！”

“组织是谁，有证明么？”

“为什么回北京后，不马上到街道办事处报到？”

张伯驹纵有一肚子学问，也招架不住这些“街道老娘们”的进攻，最后，只冒出了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十年！”

那些人气吭吭地走了。第二天上午没什么动静，下午，又一起来了，另外，还多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这么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偏这时，邮递员来了，送来一封信。民警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那封信，拆了开来。

里面，竟是一张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信上，证明他们确实是回北京看病的。

一见到介绍信上的红戳子，民警的脸色马上好多了。他暗怪这帮“街道老娘们”小题大作——用她们的话来说问题才严重呢，既然有介绍信了，就该没什么。

“去上个临时户口，就行了！”民警交待了一句，便独自走了。

几个老太太颇有点儿失望。走的时候，脸上都是讪讪的。没能把威风好好抖一抖，几个人心里都有点堵。

第三天，她们又来了。为首的一个年约五十多岁，嗓门最大，在家属委员会当副主任，一进门，便钦差大臣一般说道：“张伯驹、潘素，你们听着。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在北京，你们也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从明天起，家属委员会决定，由你们俩负责清扫后海南沿的街道，每天一次。”

慧素觉得气闷。扫街，这并没什么了不起，这些年，比这更难十倍的事，都熬过来了，扫大街又算得了什么。她受不了的，是这口气，是扫街中间另外包含的意义。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一件事中包含更多的内容，上边如此，下边紧跟。人一倒了霉，鸡呀狗呀之类，便都站到你身上去屙屎了。

“不去！”张伯驹先冷冷地说了。

“什么？”那副主任没想到张伯驹会明目张胆地对抗，立时怒目圆睁了：“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服从！”

“不去！”张伯驹又是一声冷哼，转身走进了里屋。

副主任头都气昏了，叫了起来：“好，你们不去。行，到时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慧素对这一套也见多了，既然抓破了脸，也就不再顾忌了，回道：“负责就负责，没什么了不起。”

副主任闹了个没趣，跟着她来的几个也好没面子。两个老顽固像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奈何不得。大凡这一类人，总有这样两个毛病的，一是顺乎潮随乎流，借别人的势抖自己的威，自己的利益是断乎不能有什么损伤的；二是见了song人（弱者）便压不住火，一碰上硬的便没了主张，只好拿大话吓唬人。一句“你等着，咱们走着瞧”，既体面，又风光，还让你睡不着觉。

副主任插着腰，叉着腿，死死地盯着慧素，恨恨地说：“你们真以为我们就没办法了，是么？作梦！告诉你们，别狂大了劲，闪了脖子。你们等着，咱们走着瞧！”

言罢，几个人威风凛凛地走了，街门摔得山响。临走时丢下的那几句话，也不能不让人考虑。这年头，那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足为怪。这般顶撞，他们肯定不服气。慧素坐在房中，暗暗担忧了。

相比之下，村子里的生活虽然苦一点儿，毕竟没这么多麻烦。人一上了岁数，便喜欢清静。可惜，偏有人和他们过不去！

里屋，张伯驹伏在桌上，奋笔疾书。

他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恶气。陈毅先生并张茜夫人：

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与慧素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即遭贬黜。

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遣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筋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已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

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

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

张伯驹 1971年11月18日

慧素进屋的时候，张伯驹已经把信写完，正在气吭吭地找信封。慧素知道家里没有信封，便找出一张牛皮纸，裁开来，动手糊了一个。张伯驹写好信皮，便道：“拿去，马上发了。”

慧素拿上信便出去了。事到如今，只好请陈毅同志出面了。以往，她几次让伯驹给陈毅写封信，伯驹都是不肯。让他开口求人，比什么都难。

信发出去后的第五天，回信来了。

是张茜的笔迹。

张先生并慧素夫妇，你们好！

信收悉。

最近几年，仲弘一直关心你们的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信昨天我已给仲弘念了。他因患癌症，在三一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待秘书，对你们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局面原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当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

盼二位保重身体！

张茜

1971年11月21日

闻听陈毅已因癌症入院，且已到了晚期，张伯驹黯然神伤，后悔写了那封信。这种时候，还去打扰他，让伯驹心下阵阵难过。

“我们自己克服吧，看他们还能怎么样！”张伯驹把信小心地折好，放到抽屉里，看着慧素，好一会儿又说：“我就不信这天会总是阴着不晴！”

十九

想不到，下午，王樾来了。执手话旧，自是一番感慨。

王樾的身子已经明显地发福了，精神却依旧很好。一别十余年，大家皆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不过，相比之下，倒是王樾，更见年轻。

“差一点，我们就见不着了。”王樾笑盈盈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能吃得苦的人，未必便能忍得气。那一年，我真是打算死了。”

张伯驹实出意外。

在他的印象中，王樾是最看得开的，一生的座右铭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再者，自打“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他便献身于民族的复兴，功劳多多。难道，这场“大革命”对他也不放过么？“‘大革命’一开始，我的家便被连抄了八次！”王樾伤心地说：“伯驹，我后悔没像你那样，把东西捐献出去呵！”

王樾一声哀叹，往事便江河之水一般泄了出来。

1966年8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席卷了中国的大地，“破四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对文化的征伐。

这天一大早，街道管片的民警王连生急匆匆地来到了王樾的家。

“王老，到处都在抄家，您这儿，我怕也躲不过去了。”王连生焦虑地说：“这一片，就数您最出名，枪打出头鸟，不能不防着点儿。丁字街的陈半丁家昨天也抄了。齐白石家、李苦禅家，也都抄了个底儿掉。不是我拦着，上个礼拜他们就这儿了。”

王樾担心地问：“都抄些什么？”

“什么都抄！金银财宝、古董、古书，总之，一切‘四旧’的东西。”王连生的神色很紧张，话说得也很快。“王老，您最好收拾一下，把最珍贵的东西挑出来，先放到我那儿去。”

王樾感激地看了看王连生。

王连生不到三十岁，中等个儿，白净，看上去挺斯文，薄嘴唇，讲起话来特别快，一双眼睛透着精明。

“快点，我怕他们就要来了。现在，他们正在周用良家抄呢。知道周用良吧？周一良的妹妹家，去了几十人！”

王樾有些慌了。他想不出哪些东西更重要。

他有八间书房，是用来放书画和古董的，光是轴画，就有两千卷！

还有秋瑾——鉴湖女侠的日记九本；

邓中夏的日记六本；

李大钊手书的对联；

敦煌的壁画两块；

古代的三叶虫化石；

精心、写作了几十年的《春妃秋郎阁曲目》手稿，近两万页；

全套的《新青年》杂志；

还有一万多本书，其中，有许多是善本书，孤本书。

哪一件都极为珍贵！

见王樾犹豫不决，王连生有些沉不住气了，催促道：“你快一点，我得马上走呢。”

让人家看见了，麻烦！”

王樾定了定神，马上想到了一件东西——《聊斋志异》下部的手稿。

手稿他已找出来了。本来，他是打算俟这部一千多万字的《春妃秋郎阁曲目》脱稿之后，便着手进行整理的。他已退休十年，终因岁数大了，又不想假手于他人，所以，《春妃秋郎阁曲目》到现在，才算接近尾声。这是部大型的戏曲辞书，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搞了。

《聊斋志异》的手稿放在桌子上，方才他正在看。

他急步走到桌边，双手捧起了那叠足有一尺高的手稿说：“这件东西，是无价之宝，什么也换不来的……”

“这是什么？”王连生的脸立时沉了下来，目光中透出了怀疑。

“《聊斋》，蒲松龄的《聊斋》下部的手稿！”王樾的语气十分庄重，希望能引起王连生的重视。

“《聊斋》？讲神讲鬼的那个《聊斋》？”王连生接过那叠手稿，胡乱一翻道：“这种反动的东西，别人烧还来不及烧呢，你还当宝！现在这是在破‘四旧’！”

“这……真是……”王樾一急，便说不出话来了，额上沁出了汗。“这件东西，真是最珍贵的了。”

王连生的目光咄咄地瞪着王樾，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好呵你，好心当成驴肝肺，糊弄我，当我是吃奶的孩子！”他把那叠手稿高高地扬了起来，看着王樾，一声冷哼，便把那叠手稿摔到了半开的门上。

正巧，街道上收烂纸的孤老头背个纸筐，正从门外过，王连生一见，便叫住了他：“嘿，老雷，把这堆烂纸收走！”

“你……怎么能这样！”王樾光火了。

这时，门口响起了汽车声，接着，十几个戴袖章的红卫兵冲了进来。其中，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反动学术权威王樾，从现在起，红卫兵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个短头发的姑娘扯着嗓门喊道。手中，提着一条巴掌宽的牛皮武装带。

王樾正色道：“我从来不反动，你们可以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调查！”

那姑娘走到墙边，一指墙上挂着的一幅北宋画家李公麟的《牧马图》道：“不反动，挂这个干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四旧’！”说着，一皮带抽了上去。

那画年代已久，纸早酥脆，让皮带一抽，马上便碎了。

“你们……”画樾心疼得叫了出来。

老雷走了进来，笑嘻嘻地把那部珍贵的手稿装到了纸筐里，背走了。

“老雷！”王樾朝外面喊。

皮带在空中呼啸了一声，抽在了桌面的玻璃板上，整块的大玻璃粉碎了。

“你想干什么？”一个威风十足的男学生立目横眉，站到了他的面前，“是不是不服气，想搞对抗？”

王樾无言，脸上的肌肉抽搐般滚动。

那一侧，大规模的抄家已经开始了。

就在这一瞬，他看到，在靠窗台的角落里，还丢着《聊斋》手稿中的一页。

“你出去！”一个人向他呼喝。

他用力地咳了起来，咳得满脸通红，咳得弯下了腰，咳得蹲在了地上。

趁人不注意，他拾起了那一页手稿。因为没地方藏，趁势把那一页手稿夹在了一本厚厚的地图集里。然后，他才站了起来。

一个小个子红卫兵，把一个笔记本从高高的书架上丢到了地上。

王樾喊了起来：“那是秋瑾的遗物！”

“谁是秋瑾？”一个杀气腾腾的人问。

“她是著名的女英雄。”

“呸，叛徒，破鞋！你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好人的东西，全是封、资、修！”

又一是叠笔记本。

“那是邓中夏的笔记……”

一句话没说完，几个人便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推进揉揉地拖到了院子里。

耳际，传来了花瓶被打碎的声音，书籍被撕烂的声音，花盆被推翻的声音。

这便是“革命”的任务么？

一切，都太令人无法置信了。这社会在痉挛，在抽搐，更在疯狂。尤其可怕的是，是这些打手们居然掌握着真理！

红卫兵们整整折腾了一上午，装了一车东西，浩浩荡荡地走了。余下的书籍之类，都堆到了两间大房子里。另外，周用良家的书也拉过来了，堆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三个房，都贴上了封条。

望着劫后的惨状，他的周身像害寒热病一样发抖了。

就在这天下午，他听到了老舍自杀身死的消息。老舍是他的朋友，满族人，比他小四岁，生性朴实、耿直。解放后，他写了二十三个剧本，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他的《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荷珠配》、《柳树井》，写得多好。这样的人，也会去自杀。

“那么，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他问自己。

这天夜里，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太平湖边。当生与死十分接近的时候，生是一种负担，而死是一种解脱。死是容易的，活下去却要承受十倍的艰难。

粼粼的湖水，勾起了他情思。

他想起了许多已经作古的朋友：李大钊、鲁迅、邓中夏、刘志丹、赵平复（柔石）、应修人、闻一多，许许多多。他们都死了，可他们是肩着黑暗的闸门，为了放一缕阳光进来而死的，还有一些人，也死了，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尚可说是对旧社会“吃人”的抗议，老舍呢，他却死在今天。他的死，更多的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呢？是悲哀，是无尽的叹息……

他开始了自责。

如果明天人们发现他自杀了，该怎样说？让人们说：“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轻松”吗？

不！他毅然转回了身。

回到房中，他取出一张大纸，用泼墨，画了一幅大大的芭蕉，在上面用浓浓的笔墨，写了一首诗：

留得窗前破叶，风光已是三秋。

潇潇一夜冷雨，白了多少人头！

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二十

王樾的诉说，在张伯驹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因为懂得，他才更能知道王樾心中的一腔悲愤。

他见过抄家。他的家，也被抄过两次。王樾的家被抄八次，其情形可想而知。八次，便是故宫那样的地方，也该抄得片片瓦翻身了呢。他明白，那些被抄走的东西上，凝聚着王樾一生的心血呵。

“那些东西，就这么抄走了？”张伯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也许问得多余。

“都抄走了。”王樾答道：“唯有那留下来的一页《聊斋》手稿，我让孩子从窗子爬了进去，找了出来，托人裱了。也巧，恰是最后一页，上面有蒲松龄的题记和印鉴。

别的，都……”他一声长叹，摇摇头说：“丛碧，我真后悔，后悔……若是像你那样，把东西献给国家，也就不会有这个事了。美术馆、博物馆、故宫这些地方，红卫兵就没去抄。唉，罪过、罪过这是我的罪过呵——”

王樾脚步散乱地走了，张伯驹的心中，那一层阴影也更浓更厚了。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了。

临终前，他神志清醒，对张伯驹夫妇的事，念念不忘。

“可惜，我们帮不了他更多。前几天，我向总理说了一下，恐怕，他太忙了，顾不上这么多。他们在北京，日子一定很艰难……”

张茜暗暗落泪。

陈毅喘息了一阵，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对张茜说：“我的……那副围棋呢？”

“在这儿。”

“拿给我。”

张茜迟疑了一下，从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了一个圆型的大理石盒子，放到了陈毅的手边。

陈毅打开盒盖，抓起了两粒晶莹的棋子。

这是他的爱物。

他唯一的奢侈品，便是这副围棋了。它跟了他已经几十年。

棋盒是整块大理石雕的，十分好看，庄重、沉厚。里面的棋子，是玉

质的，大小不尽一致，有着一一种古朴的天然。黑色的带有玉斑，白色的则略显透明。玲珑剔透，实乃围棋中的上品，令人喜爱。

这也是岁月的见证。

陈毅的目光仍在找，于是，张茜把棋盘也拿给了他。

他点了点头。

棋盘是黄杨木雕的，厚寸许，做工精细。盘分两块，用时嵌在一起。由于质地沉实，棋子落上时，铮铮有声。

“盘分两块。这一块，好比就是我们共产党；另一块，好比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只有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盘棋。”陈毅思忖着，缓缓地说。

张茜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托……力生同志，把它……带给张伯驹夫妇。”陈毅的语气异样地郑重了。

“好的。”张茜连连点头。

陈毅似乎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使命，长出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脸上，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你猜，我在想什么？”他问张茜。

张茜把围棋拿开，没说话。

“多怪，我想起了莫干山。张伯驹先生说，我那首《莫干山纪游词》，将来会成为一篇名作呢，瞧，我也是爱听人夸奖的呢。”

说罢，他便静静地念了起来：

莫干好，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风来凤尾罗拜忙，小窗排队长。

莫干好，大雾常弥天。时晴时雨浑难定，迷失咫尺间。夜来喜睡酣。

莫干好，夜景最深沉。凭栏默想透山海，静寂时有虫哀鸣，心境更平。

莫干好，雨后看堆云。片片白云如铺絮，有天无地剩空灵，数峰长短亭。

莫干好，最喜游人多。剑池飞瀑涤俗虑，塔山远景足高歌，结伴舞婆娑。

莫干好，请君冒雨游。石蹬千级试腰脚，百寻涧底望高楼，天外云自流。

莫干好，好在山河改。林泉从此属人民，明月清风不用买，中国新文采。

他念到这儿，睁开眼睛，孩子气地一笑说：“还记得莫干山么？这几天，我总是恍恍惚惚地又去了那儿。当初，我还曾对张伯驹说，有时间了，一起再到莫干山走一走，好好地写点什么。张伯驹的词确实有味道，讲究。”说着，他悠悠一叹道：“恐怕，我要自己一个人先去了。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一生爱入名山游！”

陈毅逝世后的第三天，天黑透了。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后海南沿张伯驹的院门前静静地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人，手捧着一包东西，走进了开着街门的小院。

自从院里又迁进几户人家后，这里便成了一个杂院，街门也从不关了。

张伯驹和慧素已从广播中知道了陈毅同志去世的消息，正沉浸在无限的悲哀和追思之中。

房子正中，挂着那幅“大雪压青松”。两侧，是一幅长长的挽联。

慧素伏在桌前，正和着忧伤的泪水，画着一幅《海思图》。自从得知陈毅身患癌症之后，她便开始构思、开始画了。画面取的是当年陈毅在北戴河观海时的情景。场面开阔宏远，使人望去，顿生一种民族的自豪之感。

轻轻的叩门声。

慧素开了门。

好冷的寒夜！

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陈毅的儿女亲家秦力生走了进来。

“张茜同志不能来，委托我把这个送来。这是……老总最后给你们留下的。他说，很遗憾，没能帮你们解决困难。”

秦力生打开了那个包，把那副精美的围棋轻轻地放到了桌上。

然后，他详细地转达了陈毅去世前对张茜说过的那番话。

“真难为他……还记挂着……”张伯驹的声音哽咽了。

他知道这副围棋在陈毅心目中的地位，更掂得出它所代表的含义和分量。陈毅的围棋，天下驰誉。这样一副围棋，便更具不平常的意义了。

“秦先生，”张伯驹道：“我们能不能也给陈毅……敬一幅挽联？”

秦力生点点头

张伯驹马上拿出了裁好的纸，在饭桌上，挥毫写了起来：

仗剑从云做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他定定神，换了一张纸，又开始纵笔写另一联：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七十二字，一气呵成，含了深深的爱，含了沉甸甸的情。

秦力生不住点头。

看一位书法家写字，这本身，也是一种享受。

那一边，慧素的《海思图》也最后画完了。

她把墨渃犹新的绢画小心地用白纸衬了，仔细地包好，交到了秦力生的手上，哽咽着说了一句“请带给……张茜同志……”话未说完，两行热泪便涌了出来。

二十一

1972年1月10日。京西八宝山公墓礼堂。

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即将举行。

休息室里，人们纷纷前来看望张茜，要她节哀顺变。这时，忽然有人叫了起来：“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了，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这消息在人们的心头轰然了。

天很冷，毛主席穿着一件呢料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薄毛裤，领口可见里面还套着睡衣，显见来得很匆忙。

毛主席是1月8日在签发中央送审的关于陈毅追悼会规格、悼词等文件时，才知道陈毅去世的消息的。关于规格的安排，本来只是按军队元老去世的规格进行安排的，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一律不参加。主席皱着眉头看完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张茜已经分明地老了，面容憔悴。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她穿了一

身簇新的军装，庄严而朴素。一见主席，张茜便哽咽地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主席落泪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啊，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个好人！”

陈毅的几个孩子肃立在张茜身旁，主席一一问过了他们的名字，感慨万千地说道：“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

见到西哈努克亲王也来了，毛主席便向西哈努克讲述了去年9月13日林彪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的情况，并强调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主席的情绪有些激动。自从林彪的事发生之后，他也分明地衰老了。

追悼会开过后，毛泽东在灵堂里缓缓地走了一圈，看那些送花圈人的名字，看那些白色的挽联。

张伯驹那副对联，因为长，所以分外引人注目。毛泽东的脚步在张伯驹写的对联前停了下来。

好出色的文笔！寥寥百余字，生动、准确地勾勒了陈毅的一生，用字讲究，语韵铿锵。这里面的话，正是他许久以来要说的。

他有着太多的话要说。

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于是，往事被深深搅动了。

“这个张伯驹是什么人？”毛泽东问身边的周恩来。

周恩来略一迟疑，答道：“一位民主人士，是陈毅同志生前的朋友。”

“他没向我讲过。”毛泽东的眉宇间凝聚着巨大的力，又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北京。”周恩来转身见到了张茜，走过去说：“主席问张伯驹先生呢。”

张茜走到了主席的身边。

“这幅挽联写得好！”毛泽东又赞了一句。

他极少这样夸奖人。

“他就是那位把传世第一的字，传世最古的卷轴画捐给国家的那个人。”

“噢……”毛泽东猛然记起，问道：“他的夫人，是不是叫慧素？”

毛泽东的记忆力绝佳。虽然已过了许多年，他仍然记得这个名字。解放不久，何香凝向他讲过慧素这个人。毛泽东的私人藏画中，还有一幅慧素画的山水呢。

“对，就是他们！”张茜忙说：“到现在，他们不但没工作，在北京连户口也没有呢，好惨。陈毅活着的时候，总挂牵他们的事。”

毛泽东点点头，看着周恩来说：“对这样的人，应当保护，给出路。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像张伯驹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去嘛。他们本人，便是一部历史呢。”

追悼会后，周恩来马上责成童小鹏，对张伯驹的事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人生充满了奇遇。

在那样的年代里，毛主席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于是，一切障碍都被瓦解、被击碎了。

那几天，张伯驹家天天都有人来，进进出出，脚步匆忙。邻居猜疑着，注视着，希望知道其中的秘密。

可是，这老两口太孤傲了，全没有一点儿老北京人爱串门、爱聊天的

习惯，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样的人是最遭人憎的，因为人们希望大家都一样，不能容忍哪个人特殊起来。

一转眼，他们到北京三个月了，临时户口限定的三个月期限到了。

那位让他们“走着瞧”的副主任又来了，查他们的临时户口，并郑重地告诉他们：这临时户口已经到期，要到派出所去重新办理。

慧素去了。

管户籍的民警分明是早已串通好了，慧素一去，管户口的女民警便说：“不能延期。

要延，重新开介绍信来！”

“让我们……在北京过了春节，再回去，不行么？”慧素央求着：“现在……东北很冷，我们的年纪……都大了。”

“不行！”女民警无比威严地说：“都像你们这样，北京城受得了吗？上级指示，春节期间，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知道了吗，平时还可以延期几天，春节期间，一律不行。

发现没户口的，一律遣送回去。”

“有病，也不行么？”

“都吃五谷杂粮，谁没病？”女民警真是铁石心肠，一点不肯通融。“你们可以先回去。过了春节，重新开一张介绍信，再回来。”

慧素知道再说下去也没用，只得离开了派出所。

人生的路，真是太多艰难了。

回到家，伯驹问：“怎么样？”

“不行。”

张伯驹气得鼓鼓的。“不行就不行，他们能把我抬到东北去，我不信！”他倔了起来。

正说话间，副主任和管片的民警来了。

这回是先礼后兵。

“临时户口办好了吧？”民警笑着问。

“没有。”张伯驹冷冷地答道：“去了，你们的人不给办。”

“噢。”民警点点头，为难地搓着手说：“这是制度，谁也没办法。”

“没办法就没办法。这就是办法！”

“怎么？”

“等他们来抬我走吧，我等着！”张伯驹额上青筋一跳一跳的。快八十岁的人了，到头来竟连家也不许住，他转不过这个弯来。

民警的脸色变了，软中带硬地说：“你打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比试比试谁更硬吗？我有言在先，上级规定，拒不执行的，公安机关有权交遣送站负责遣送回去。你不是不信么，好吧，那就试试看。”说完，民警带着副主任气哼哼地走了。

这一次，看来是要动真的了！

慧素坐到桌前，抚弄着那对围棋盒，真想放声痛哭一场。这些人，真是逼人太甚了。

若在过去，他们还可以找找陈毅，如今，陈毅也故去了，还能求谁呢？

春节临近，天更冷了。

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欢庆新春，斗私批修”这样的标语了。同热闹的外面相比，这里全然成了一个孤独的角落，

没人理，没人问。邻居几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又笑又跳。街门中，人进人出。串门的，送礼的，整天不断。

而张伯驹的家中，却像坟墓一般死寂。

年关近了，慧素的心事也更重了。听说，有的地方已经在开始往外地赶人了。

除夕的前一天，街道送来了一份正式的通知，要求所有没有正式户口或临时户口的外来人员在春节前离开北京。张伯驹把通知看了一半，便扯了个稀烂，丢到了门外边。

这一回，他准备干到底了。反正已经活了这么大，死了也够了。他决心已定：宁可受罪，再不受辱。

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半辈子。当年，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他曾奔走呼号，将生死置于度外。如今，北京却容不得他。再有两天就要过年了，他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过几个年呢？可是，这里的人却要像倒垃圾一样把他倒出去，连个年也不让他过。这一切，究竟是为为什么呢？

他不理解。

他也无法理解。

天黑时分，落雪了。

有雪的晚上，总是分外地安静。

他写好了“绝命书”，坐到了椅子上，回想着往事。

可惜，傅湘故去了，王樾年纪太大，也不能来。他希望能有个人谈一谈，可是，却没这样的人了。人一老，最怕的并不是死，而是孤独，一种被抛弃般的孤独。

远远的地方，传来了放鞭炮的声音。虽然只是疏落的两三声，却勾起了他深深的回忆。

他问自己：这辈子，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若是让他重新选择，他会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呢？

院子里，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细一听，听得见门外还有汽车的发动机声。

“他们真来了！”张伯驹暗暗地说。脸上，现出了一副刚毅的笑来。

慧素已经穿戴停当，东西也收拾好了。

“张伯驹同志是在这里住么？”有人敲着玻璃窗问。

“在！”是一字瓮声瓮气的回答。

门开了，三四个穿制服的干部顶着一身雪花走了进来，带进了一阵寒气。

张伯驹已经拉开了决战的姿势。从那个民警走后，他就在等着这一刻了。相比之下，面对更胜过等待。既然早晚都会发生的事情，早一点发生更好。因为，等待也是一种消耗，一种付出。

面对来人，张伯驹送上了一声悠长的冷笑。使得进来的几个人弄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回事。

慧素却看出了有什么不对，迎了过来，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中央文史馆的。”为首的一位中年人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纸来，笑着说：“如今办点事，可真麻烦。春节期间，火车上的人又多，紧赶慢赶，今天才算把全部手续办妥。本来，我们打算明天来，可又怕你们着急，所以，晚上就赶着来了。打扰了你们，很对不起。”

慧素接过了那一堆纸，刚要看，却听张伯驹一声狂喝：“慧素，请他们出去，都出去，这是我的家！”

“伯驹！”慧素叫住了他，把那叠文件递到了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方才只在生气，竟没听来人说些什么。

他低头看那些东西，只一眼，便怔住了：

聘任书

兹聘请张伯驹先生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中央文史馆

1972年2月

再下面，是两张已经办理好了的户口登记卡，以及一叠中央文史馆的情况介绍材料。

“你们……”张伯驹艰难地扬起了头：“会怪我有点……老糊涂了么？我以为……是派出所那些人来了呢……”

正说话间，院里又响起了沉重而杂沓的脚步声。一个声音指引着说：

“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两个，都没走。”

门口，出现了一伙气势汹汹的人，有警察，也有穿便服的。

一个人走上前来，冲着文史馆的几个人毫无礼貌地打量了一番，鼻腔一哼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中央文史馆的。”

“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么？”

文史馆的中年人皱了皱眉，说道：“他们是好人。”

“你这么肯定？”

“当然。”

“好吧，那就一块儿走一趟！”说着，他从裤袋里掏出了两副锃亮的手铐来。

那位中年人这时才明白方才张伯驹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看来，今天晚上，他们来得太及时了，否则，两位老人又要吃好多苦呢。

他转过身，对一个小个子的中年人笑了笑，说道：“陈处长，你来解释一下吧。”

陈处长穿着风衣，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方才一直没说话。这时，他走到了那个民警面前，口吻强硬地说：“谁批准你们这么胡来的？”

“胡来？”那个民警叫了起来：“你是干什么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陈处长掏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递了过去，同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为张伯驹先生落实政策，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要不要跟我们去中办核实一下？”

那个民警一见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先自软了，又听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为张伯驹落实政策，知道这下惹祸了，忙双手递回工作证，连连说道：“误会了，误会了，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你们出去吧！”陈处长摆了摆手。后来的一帮人闻声，忙不迭地一齐走了。

“这……是真的？”张伯驹望着陈处长，泪珠在眼睛里打转了。

“是的，是真的，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过了年，您就可以到中央文史馆去上班了。”说着，他又转身看了看慧素道：“我们考虑，张老岁数大了，您暂时就不要出去工作了，照顾好张老，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方才那位中年人也走了过来，说道：“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们不要客气，组织上会想办法解决的。”

“没……没有。”慧素鼻翼翕动，感激的泪水早已忍不住，奔涌了出来。生活中的新一页，随着春天的到来，一同开始了。

陈毅与小妹

汤雄

陈毅元帅共有兄弟姐妹 5 人，他排行老二。他的胞妹陈重坤，是在他一手培养下，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道路的。陈重坤现在寓居苏州市。这里叙述的是陈毅与他小妹一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就叫陈重坤吧”

1992 年初秋。阔别故乡三年多。21 岁的陈毅怀着怅惘的心情回到了成都。

1929 年春，陈毅和大哥陈孟熙在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双双以官费留学的名义于 6 月 1 日离开成都，踏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征程。然而，在法国资本主义这个“罪恶的渊蔽”中，陈毅个人的美好愿望梦幻般地破灭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失望了。由于他义无反顾地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们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著名的二·二八运动，他与留法勤工俭学的 104 名学生一起被“里昂官厅”的武装警察拘捕，并被“遣送”回国。

成都上河心，那里有陈毅的家。

1910 年（宣统二年）春夏间，为了谋生，为了给陈孟熙、陈毅、陈季让、陈秋月 4 个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陈毅的祖父陈荣盛经与陈昌仁（陈毅的大伯）和陈昌礼（陈毅的父亲）商议，将故乡乐至县复兴村张安井村的 40 亩田产卖掉后，又从成都上河心的那个名叫“林四顽子”的地主那里租用了 200 来亩地和几间房子，然后举家迁到了成都居住。

就在陈毅留法的这两年中，陈家已败落不堪：陈毅的二伯冻饿而死，家产变卖罄尽。

全家在成都无法立足谋生，先后回了老家张安井村，租种人家 10 来亩地为生。

当陈毅一路打听问讯来到陈家祠堂门外时，他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凄凉悲哀感，一阵辛酸涌上心头，他的两眸潮湿了。如果这时的陈毅是出洋留学衣锦荣归还罢了，他偏偏又是被“押解归国”，而且连个职业也没有，这岂不更叫乡人看不起吗？！忽然，一声清脆的婴儿的啼哭声从祠堂里传了出来。“孩子？我家哪来的孩子？”他情不自禁地跨进了门内。

昏暗的祠堂内，两鬓微霜的妈妈怀抱着一个襁褓神情憔悴地坐在小竹椅上。

“秋江（陈毅的小名），是秋江呀，我的儿呀——”妈妈喜出望外地站起身，扑向她常在梦中相见的二儿子。

“妈妈，这是……”陈毅顾不得向妈妈嘘寒问暖，忙伸出双手，接过了

妈妈怀中的襁褓。

“她是你的么妹了。”妈妈苦笑道。

“么妹？我又有了一个么妹了。”陈毅把襁褓紧紧抱在了怀中。

襁褓里的么妹哭闹了一阵，现在已经睡着了，长长的睫毛上，还带着晶亮晶亮的泪珠呢。圆圆的小脸蛋，圆圆的小鼻子，还有一张与哥哥长得一样的宽宽正正的大嘴巴，一副淘气样。陈毅越看越喜爱，情不自禁俯下身，在妹妹光滑白嫩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

做二哥的忽然想起了什么：“妈，么妹子起个什么名字？”“唉，哪来这心思呀。”妈妈凄然一笑，“大家都脚不沾地忙着糊嘴度日呢，哪有这闲心去给她起名字。”

“秋江，你有肚才，你就给么妹起个大名吧。”“好。”陈毅略一思忖，便脱口而出，“对，就叫陈重坤。”“什么？你说叫陈什么来着？听着像个男孩子的名字嘛。”

“陈重坤。”陈毅满意地向妈妈解释道，“坤，坤仪地球也，《易经》中坤卦的大象是代表地与 yue 的符号；重，她是我们陈家第二个女孩……”

从此，命运的绳索将这对兄妹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邂逅动芳心

1950年5月。这时的陈毅已不是30年前那个单枪匹马、手无寸铁的书生，而是堂堂的新中国的上海市市长了。

组织上决定把年迈的陈毅父母和陈重坤接送到上海去。陈毅的大哥陈孟熙也定要跟随父母一起去上海。他自从中法大学毕业后又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在武汉与胞弟陈毅分手后，曾任国民党少将、西康禁烟专员，临解放是四川乐山师管区副司令，后来举行了起义。政府也同意了他的要求。

军分区司令王诚汉作出了护送陈老父母安全抵达重庆的决定。军分区侦察作战参谋王少艾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带着一个武装排和三辆军用大卡车出发了。将三辆大卡车用油布篷严严实实地遮掩了起来，每辆车顶上布置了机关枪。自己身先士卒乘在第一辆上，陈家一家安排在中间一辆上。最后一辆派副排长押阵。

根据当地土匪、敌特的活动规律，他作出了迟行早宿的前进方案，也就是说每天上午9点多钟才启程，下午3点多钟就收兵驻扎下来。于是，本来只要一天的行程，却整整用了3天的时间才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就在这次不平常的旅途中，王少艾结识了陈重坤。说实话，这一路行程中，他由于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战备状态下，所以，甚至连和陈重坤好好说上几句话的时间也没有。

但是他知道这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姑娘是当年四川省立女子后期师范修业的学生子，还没婚配。

但是，你无意，人家却有心了。

陈重坤是个与一般女子不一样的姑娘，对于未来的终身大事，她自有她的理想和标准。所以，尽管这十来年里，前往陈家托媒求亲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但陈重坤就是不肯轻易把手中的彩球抛出去。这样一来，眼看快要30岁了，她还是待字闺中。然而，当这个年轻英俊、机智勇敢的作战参谋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却为之怦然心动了。

王少艾把陈家一家毫毛未损地送到了重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要回到遂宁部队去了。临行前，他向陈家来告别。这时，陈妈妈独具慧眼，已

从内心暗暗喜欢上了这个机灵勇敢的小伙子。于是，老人家有意试探一下王少艾，道：“伢子，我儿子在上海当大官，离你老家江苏很近，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可是，王少艾摇头一笑道：“大娘，这可不行，我跟你们这一去，要想在你们四川剿匪立功的计划可就要落空了。”

王少艾这几句话，再次拨动了一边的陈重坤的心弦。说实话，妈妈这邀请，对于有些人来说，不啻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眼前这个忠勇双全的江南小伙子却根本没这样想，反而还一心想着在战斗中争取立功的事，真有志气呀！这样的人，不正是自己理想中追求的白马王子吗？！于是，望着刚认识又要分手的王少艾，陈重坤心中蓦然升起一种浓浓的爱慕之情，真有点舍不得他离开自己的感觉。顿时，她似乎有不少话儿要向面前这个王少艾倾吐……当她那双火热的眸子与王少艾的视线相碰的瞬间，他俩都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

王少艾首先从陈重坤那双火热的眸子里，感到了一种只有情投意合之中的恋人才有的依恋。不过，他很快冷静了下来，对于这位当今声名赫赫的上海市长的亲妹妹，说实话，他当时确实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他很快收回了自己这一瞬间的感情的波动，向陈家老少毕恭毕敬地敬了一个军礼，就转身踏上了归途。

在哥哥的身边

陈家一家在重庆休息了几天，受到邓小平、刘伯承夫妇的接见和招待，半个月后，顺利到达了上海。

久别重逢的亲人相见，说不尽甜酸苦辣与亲热，这不在话下。待一切都稳定下来后，陈重坤这才实施她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

“爸、妈，遂宁的那个作战参谋一路上为护送我们平安到达重庆真是太辛苦了。真不知该怎样表达一下谢意呢。”“那就给人家写封信去呗。在信中表达一下我们对她的谢意。”老父亲随口说道。岂料，这下正中陈重坤的下怀，她抑制住心头的喜悦，当即自告奋勇地说道：“对，对，写封信去。我就写。”这封信写得很含蓄，信中既表达了他们全家对王少艾的感谢之情，又提示了今后通信的地点，同时委婉地向对方暗示了自己的一片爱慕之情。陈重坤的眼光没错，王少艾非但读懂了这封含蓄藏意的“感谢信”，还当即亲笔给陈重坤回了一封也同样含蓄的信。就此开始，鸿雁传书，爱情的种子在两个革命青年心中生根开花了。二哥二嫂对生活的态度使陈重坤的思想有了触动。

有时他俩回家晚了，为了不再麻烦工作人员，他们从不另外烧饭，总是叫人从厨房里弄点酸泡菜、下一碗挂面充充饥。张茜被分配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后，还想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尽管当时还怀着姍姍，还是报考了地处江湾的俄语学习班。陈毅有专车，她也从不坐，宁可腆着个大肚子每天挤着公共汽车上下班。

在衣着穿戴上，他们也同样不讲究。陈毅有件旧皮茄克，冬天经常穿在身；张茜则经常穿件灰色棉袄。天热时，他们更是一天到晚总是穿一身旧军装。这些衣裳还是他们从解放区带来的呢。

对照二哥二嫂，陈重坤心中越来越不安。尽管家境贫困，但由于她是父母最小的女儿，过分的溺爱，使她长这么大了连一块手帕也不会洗。再加上四川乡下过去有种习俗：有钱有势家的闺女都不出嫁，一辈子留在娘家享

清福。所以，目睹二哥二嫂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小妹开始坐立不安起来。特别是她通过阅读了二嫂让她看的一些书刊，知道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后，思想上的触动更大了。但她又顾虑重重，既想参加劳动，又害怕参加劳动。反过来看看大家都在忙忙碌碌，自己却闲得无聊，更是时常郁郁寡欢、沉默不语。陈毅见了，总无可奈何地对小妹摇头苦笑着说道：“弱女子，可怜。”

那天，原四野卫生部长崔义田和上海卫生局的薛和来到陈毅家。

陈毅把小妹叫到他们跟前，向崔、薛两人介绍说：“这是我家的小妹，你们看，弱女子多可怜呀。今天，我想托两位为她在上海找一个工作，好吗？”

薛和当即说：“行呀。恰好今秋卫生部要在制造局路（今上海卫生学校）办个卫生人员训练所，招收初、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的学生呢。你家小妹不妨前去一试。”

“那敢情是好事。”陈毅笑了，又转向陈重坤道：“不吃梨子不知梨子的滋味，你就准备一下，去考它一考嘛！”

这一次考试中，陈重坤总平均分数刚好达到及格线，被录取了。

就在这时，王少艾也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作为祖国“最可爱的人”被组织推荐到南京军事学院情报系三期进修学习。眼看一切都渐渐稳定了下来，陈重坤这才决定把自己与王少艾之间的这件大事告诉父母听，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

请二哥一锤定音

那天，她涨红脸，支支吾吾了半天，这才把心中的那个秘密向父母亲说了出来。当母亲的一听倒没话说，只是一个劲地直夸王少艾，说这个江南伢子模样好，心地也好，很中意。岂料老爷子却不同意。老爷子认为王少艾一个大尉，与他当市长的二儿子相比，实在是门不当、户不对。

陈重坤急了，她自己并不喜欢攀高亲，双方旗鼓相当也就很好了。被小女儿这么一说，老爷子的口气渐渐地软了下来。陈重坤见状心中窃喜。岂料当陈重坤得意中向老爷子出示王少艾不久前寄来的那封信后，老爷子居然突然翻脸，说什么也不同意女儿与王少艾这门亲事了。

原来，这个清末的落第秀才从这封信中发现了一个破绽。王少艾在信中把赔偿的偿字写错了，写成了“赏”字。这对本来就有点看不起王少艾官小位低的老爷子来说，无疑像是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看看，一封信也错别字连篇，这不是一个草包又是什么？让我么妹去嫁给他，我坚决不同意！”一眼认准了王少艾的陈重坤心中怎肯服？她在暗暗流了一阵伤心泪后，决定去找二哥。

在他们兄弟姐妹 5 人中，老爷子谁也不服，只信一个二哥。只有二哥说的话，老爷子才能言听计从。但是，二哥会不会看中王少艾呢？二哥呀二哥，如今就看你这一锤定音了。陈重坤很想找二哥好好谈一谈，可是，二哥他太忙太忙了，一个刚从旧社会里脱胎而出的新上海，百废待兴，有多少事在等着陈毅去做呀！反投机、反封锁、反轰炸……哪一天，二哥不是披着晨曦出门、顶着星星回家？

这一天陈重坤终于能和二哥单独坐在一起了。她再也忍不住，把自己与王少艾的事向二哥都说了出来。“是嘛？”陈毅快活地笑了。说实话，小妹都已是快满 30 岁的人了，她的终身大事做哥哥的怎会不放在心上？“那好呀，我早就想喝一杯我家么妹的喜酒了，早就想抱一个我么妹生下的外甥

了……”

“二哥，看你！”陈重坤又羞又恼，生气了，“人家和你说正经的呢。你说，这个王少艾到底怎么样？”“唔。”陈毅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这可是件大事呀，我可不敢做那乔太守。这样吧，小妹你能不能给二哥几天时间，让我好好思考思考呀？”

那有什么不行的！陈重坤笑着点了点头。

后来，陈重坤才知道她上了二哥的“当”了！陈毅说是“思考思考”，背地里命令张茜亲自出马，专门致函南京军事学院的钟期光副主任（原新四军政治处主任，陈毅的亲密战友），暗中对王少艾进行了调查。钟期光副主任很快就查阅了王少艾的档案，并实事求是地从中摘录了一些，用特急密件的形式送交给陈毅。

在掌握了王少艾的这些情况后，陈毅主动找上了么妹。“么妹，王少艾的事，你到底拿定主意了没有？”陈毅一见小妹就劈头问道，陈重坤嗝也没打：“我早就考虑定了。”

“你既然已经考虑好了，那我们当然尊重你的意见。这里有份东西你看一看，是不是与以前他和你说的一样。”说到这里，陈毅把那份材料放到么妹手中。陈毅正色道：“么妹，主意你自己拿，不过，二哥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关于我家的事你可要向少艾同志讲清楚，讲得越清楚越彻底越好。”

陈重坤郑重地点了点头。她知道二哥要她向王少艾“讲清楚”的是什麼，因为陈毅曾多次告诫兄妹：凡事要独立自主，切不可凭着二哥是共产党里的大官而生出任何依赖思想，陈家门里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在陈毅那里沾半点光。

有情人终成眷属

就在这年年底的一天，钟期光副主任忽然找到王少艾，对他说：“王少艾同志，上海陈毅市长叫你去一次。”王少艾一听是陈毅市长有请，尽管钟主任没说有什么事，但他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于是，当天他就动身去了上海。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王少艾和陈重坤双双来到陈毅家门前。这时，王少艾的心一阵急跳，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整了整军风纪。他知道自己这个未来的二舅子是十分讲究一个军人的仪表仪容的，他不想在初次见面时就给人家留下一个邋遢的印象。

陈毅早就恭候在客厅里了，正聚精会神地看一张当天的《解放日报》。“陈市长，王少艾前来报到。”王少艾向陈毅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哦，王少艾同志，你好。”陈毅上前握了握王少艾的手，又把这个未来的妹夫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这才把王少艾按在椅子上坐下。

这时，王少艾的心“扑通、扑通”跳个欢，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紧张感。见王少艾这样，陈毅笑了：“王少艾，少艾。唔，这个名字很好听，可就是这个艾字用得不好，期期艾艾的艾，不好。男子汉，期期艾艾会有什么出息？依我看，不如改了它，改一个岩字怎么样？岩，岩石的岩，男子汉就要像高山上的岩石那样坚硬才是嘛。”

陈毅这一番风趣轻松的话，顿时把王少艾心中的紧张感冲淡了，他不由得轻轻地吁了口气，笑了。不过，王少艾当时还以为这是陈毅的一句戏言而已，没想到陈毅却从此一直这样称呼他了。

按四川方言，“艾”与“岩”，仅是音同字不同，陈毅这么一改，含义

就截然相反了。王少艾从内心钦佩二哥。

“听说你脾气好大哎。”忽然，陈毅话锋一转，把嗓门也提高了不少，“斗争性也特别强。是嘛？”“这……”王少艾被陈毅的突然袭击弄得不知说什么好，不由满脸尴尬，搔头又摸耳。陈毅也许感到自己的话太唐突了一点，便又笑道：“不过，当兵的是得有点脾气的。有时候，我的脾气也不小。”这时，张茜从楼上下来了，她看到王少艾，开口就说：“要谈就谈真个（指王少艾与陈重坤的恋爱）。”

这时，王少艾沉不住气了，笑道：“我们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人了嘛。”

陈重坤生怕这个血气方刚的家伙嘴不让人，把事情弄糟了，于是，机灵地马上吩咐工作人员把早饭摆上来，打断了大家的话题。吃过早饭，陈重坤就和王少艾一起来到不远处的襄阳公园。在襄阳公园里，他们立下了百年秦晋的誓言。

由于陈毅公开表态同意么妹与那个“才只有大尉那么一丁点官”的王少艾恋爱，所以，陈昌礼老爷子就是对这个小女婿有一千一百个不同意，也只好默认了。

1955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俩在南京军事学院举行了婚礼。

陈毅送了他们两瓶酒，张茜送给小妹一件丝棉袄。一个堂堂的上海市市长送给小妹的结婚纪念品就这么简单。

一份写了30年的入党申请书

在二哥的影响与熏陶下，陈重坤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越来越强。所以，早在1951年，陈重坤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53年7月1日，陈重坤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当时，她见自己多年的追求就要变为现实了，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高兴。

岂料，节外生枝，平地起风波！当时，陈重坤的侄女陈德珍也在积极争取入党，但是，组织上对她进行考察时，发现解放前陈德珍曾参加过地方上的封建迷信组织“一贯道”，所以，对她的积极要求迟迟没有同意。现在，陈德珍见姑母居然入了党，感到委屈和不平，火爆火躁地找到党组织，指责道：“为什么我姑母能入党，我就不能入党？”党组织这时才不得不把她为什么不能入党的原因如实告诉了陈德珍。岂料，陈德珍一听，更加不服气了，委屈地说道：“那么，我姑母不也参加过‘一贯道’吗？她为什么就可以入党呢？”

这下，可算把陈重坤给“出卖”了！

说实话，陈重坤十来岁的时候，确实盲目地跟随着大人们加入过“一贯道”。但那时她还根本不懂事呀，就连成人们也不知道这“一贯道”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只以为它是一种宣扬封建迷信的民间团体。要不是前两天上海城里刚刚开办了一个专门揭露“一贯道”反动属性的展览会，说实话，他们至今还不知“一贯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党组织听陈德珍这么一说，不由吃了一惊，他们马上把陈重坤找来，一问，果然真有这么一回事。这下问题严重了，党组织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不得不作出停止陈重坤候补期的决定。

但，陈重坤毕竟是当今一市之长的小妹呀，这事可要先请示一下陈毅市长。于是，这情况很快反映到了陈毅那里。陈毅一听，不由勃然大怒，道：“还什么停止候补呀？开除党籍！给我马上开除她的党籍！”这时，陈重坤

好恨好怨哪！她恨的是自己年幼无知，错走一步，居然稀里糊涂地加入了这种反动道会组织，太冤枉了；怨的是身为党的领导的二哥，居然对自己的亲妹妹也那么毫不留情面。

尽管这样，陈重坤对党的信念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坚定了。她一次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后来调到南京工作、调到苏州医学院工作，她都没有停止过她的崇高而又坚定的追求。然而，她一次次失败了。党组织的大门再没为她打开过。这30年里，她向党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不下近百份，叠起来怕有尺把高了呢！

1972年1月7日，陈毅同志因病不幸逝世，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幺妹陈重坤。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的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陈毅的一家及其亲属。当周总理把陈重坤介绍给毛主席时，毛泽东握着陈重坤的手第一句话就问：“你是共产党员吗？”陈重坤只得又难过、又羞愧地摇摇头，说道：“不是，正在努力争取。”这一“努力争取”就又争取了11年。直到1983年，陈重坤都快退休了，她所在的苏州医学院党组织才批准了她的这一要求。她所苦苦追求了30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二哥要去北京了

1955年5月9日。陈重坤与王少艾结婚后刚返回上海。

这天傍晚，陈毅和张茜把她叫到他们房中。

“小妹，明天，我们就要去北京工作了。我们经商量，决定让你留在上海，你……”

“不……”陈毅的话还没说完，陈重坤就红了眼圈，“我要和二哥二嫂一起去北京。”

关于二哥调任北京工作的消息，陈重坤早就有所风闻了。早在去年6月26日，毛主席就与陈毅打招呼了：“希望今冬明春与震林同来中央工作。”陈毅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同年9月又被任命为国家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尽管小妹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如今她还是感到太突然、太快了。

“娃子的话！我是去北京工作，爸妈年纪大了，我是不得不一起带去。你好好的也跟去干什么？”陈毅有些恼火了。

小妹。”这时，张茜走到陈重坤身边，轻轻搂住小妹的肩膀，把她送到她的房间里，劝慰开导道，“小妹，你要支持你二哥呢。你二哥一生廉洁奉公，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为名，不为利，无私无畏，所以在群众中才有崇高的威信。但难道就这样算了么？不行。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和革命的利益服务，要一直到他停止呼吸为止，那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公仆。今后，我们亲友中如果有些事情，不要去干扰他。你也要多对亲友做一些解释工作，这样才算是对他的最大的支持。这几年里，你单位对你的工作反映还是不错的，但还要多加磨练，要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少艾是个解放军，是一个共产党员，思想身体各方面的素质都很好，你要多向他学习。我去北京也是组织决定的，是带着工作关系去的，不是靠丈夫。我身体很不好，可我还得努力工作，不能就靠你二哥呀！”

张茜语重心长一番话，终于渐渐疏通了陈重坤的思想疙瘩，她点点头，道：“请二哥二嫂放心，我不跟你们去北京了。我一定不忘你们的教导和关心，今后一定听从组织安排。”

第二天上午，陈重坤含泪送别了父母与二哥一家。

1957年，在组织的关心下，陈重坤调到南京工人医院检验科工作。分隔两地的夫妻，终于相聚在一起了。但是，好景不长，没多久，王少艾军院毕业了，由组织上分配到驻安徽蚌埠60军179师司令部任侦察科长。为此，夫妻俩又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陈毅看了小妹的信大发脾气

陈重坤刚调到南京时，全国正开展令人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她先找到省卫生厅报到，盛立厅长接待了她。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组织上暂时不能马上安排陈重坤的工作单位。当有人知道陈重坤就是当今国家副总理陈毅的妹妹时，都感到十分惊讶，有人提议说：“你不妨叫你哥哥写封信到军区总医院，让他们收下你。”

但是，陈重坤记下了二嫂的话，摇摇头说：“我二哥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我不能用他的名义去找工作。”

就这样，陈重坤大约足足等了二三个月，才由省卫生厅安排在南京工人医院（即现在的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室工作。

当时，职工宿舍很紧张，陈重坤只能被安排在集体宿舍里。王少艾也是住的集体宿舍。于是，尽管夫妻俩调到了一个城市了，但仍是事实上的分居两地。

这一分居一晃就是一年多。后来，王少艾从军事学院毕业，分派到安徽去工作了，于是，房子不房子的事就更不要紧了。

陈重坤没房的事不知怎的让军事学院副主任钟期光知道了。于是，在钟主任与凌奔两人的努力下，才将陈重坤安排到军事学院管辖下的天目路19号住了下来，这样，陈重坤总算有了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家。天目路19号是一个小院，院里有两处房子：一处是比较大的二层楼房，一处是仅约20平方米的小平房。钟期光考虑到陈重坤家人口少，就把她安排在了小平房内。房子虽小，但陈重坤很满足。这个院内有着好多大大小小的树木，阳光和空气都很好。不多久，那个二层楼房里住进了南京军区装甲兵肖司令，于是，小院里这才热闹了起来。

肖司令是个平易近人的首长，当他知道陈重坤是陈毅副总理的小妹后，对陈重坤更是予以了照顾。每次当陈重坤下班回到家时，只要肖司令在小院里散步，他总亲自上前为陈重坤开门。有时候肖司令一家坐车外出，他们也常请陈重坤坐他们的车一起走。肖司令这么客气，时间一长，陈重坤感到很不好意思，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后来，肖司令搬走了，小院里又只留下陈重坤一家了。陈重坤总以为这下可不用再不好意思了，没想到不久，又有一个处长搬进了这个小院里来。这下，陈重坤思想上就又有波动。她想：这个小院里搬来搬去总都是首长，且又都是那么客气，叫她实在过意不去。再说，日子长了，牙齿与舌头也有个磕磕碰碰的时候呢，万一与首长们闹了点小矛盾，这在二哥面前又怎么交代呀？

思来想去，陈重坤就背着少艾，向远在北京的二哥陈毅写了一封信，要求二哥出面向军事学院他的亲密好友钟期光主任说说，是不是把这座小院干脆让给她一家居住算了。

再不，就干脆再次麻烦钟期光主任，另外给她家安排一个住处。陈重坤知道二哥与钟期光主任非是一般的关系，早在新四军时，他俩就是一个军长、一个政治处主任了，长期的枪林弹雨中，两人结下了生死之交。由陈毅出面向钟主任说一声，这事八九不离十的能解决。

岂料，就这么一封兄妹之间的家常信，竟使得陈毅大发雷霆，甚至将小妹这封信来了个大曝光！

“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

信发出没多久，南京军区来了两个同志，找到陈重坤，向她了解情况。直到这时，陈重坤才知道二哥居然把她的这封信转交给了南京军区的首长，才知道二哥为此大发雷霆，并在给南京军区的领导的信中写下了“此风不可长，要求南京军区向陈重坤进行再教育”之类的话。

说实话，当时陈重坤心中很委屈，感到二哥这样做太缺乏兄妹情义了。她含着眼泪向来人作了解释后，那两个同志倒也不责备她，反而劝慰她说：“陈重坤同志，你二哥的工作很忙，以后你有什么事，只管向我们谈，能解决当尽量予以解决。”他们还说，“组织上暂时实在拿不出房子，你说一个门进出不方便，那我们给你围个竹篱笆，在旁边开一个门，这样好不好？”但是，陈重坤没答应。

一年后的那个仲春里，陈毅和张茜因公出差到南京，便把小妹叫了去，让小妹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还留小妹住了一夜。就在这个难忘的夜晚里，陈重坤这才如梦方醒，明白了二哥当时向她发这么大的火的原因。一年前，正是党内开展对饶漱石的“伸手”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毛主席为此还在与陈毅的谈话时特意提到了“伸手岂止高饶”的话。毛主席就因为陈老总从不向组织上伸手而如此信任他。陈毅从不向党向人民“伸手”的故事，在党中央是有口皆碑的，他调动工作，从不带“亲信”；党分配他工作，他也从不讨价还价；任命他做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他还推辞，结果被饶漱石“伸手”抢了去。但是，尽管党和毛主席对陈毅的功绩作了肯定，陈毅却还是觉得应该警惕，特别是自己现在“出头翻身”的时候。从毛主席这句“伸手岂止高饶”的话来看，党内斗争的风浪今后还有更大的起伏呢！

二哥高瞻远瞩一番话，使小妹幡然梦醒，羞愧莫及。就在这天晚上，陈毅即兴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感事书怀》4首诗。在这4首诗中，到处可见陈毅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句子：“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后车善择途，前车一再覆。”“心情承见问，春来冬初，克奏肤功。向大泽深山，擒伏蛇龙。回溯廿年纠葛，知早有伏迹藏踪。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幸得长期培育，每愧过失多。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特别是第4首诗，标题就是《手莫伸》，其辞涵义更为显豁，可以说完全是针对毛泽东“伸手岂止高饶”的回答和信誓，其政治态度十分明朗。陈重坤当时就是站在二哥旁边，亲眼看着二哥创作这4首诗，并亲耳听着二哥对她的谆谆教诲的。陈重坤在二哥处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陈毅就叫小汽车把小妹送回单位按时上班。临出门时，张茜向陈毅提出要一起去实地看看小妹所住的房子。陈毅想了想，没答应，他对张茜说：“你不能去，看了你总要说话的，你一说话就会惹起很多麻烦的。再说给邻居们看了又让人家怎么个想法呢？不去为好。”就这样，陈重坤在那座仅2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整整住了14个年头，直到后来陈重坤与王少艾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双双到江苏连云港市新浦农场工作为止。

“父母就是死了，我也不能回去参加追悼会”

1960年，陈毅让妹夫少艾代表他回了一次老家，处理一起家事。年事已高的陈毅父母，自随陈毅进京住进中南海后，长期散漫惯的人，感到进出便，就提出要回故乡安度晚年的要求。陈毅请秘书张镜送父母回到成都，

又给父母租了间居民房子住了下来。

再花钱买了些厨房用具、床椅桌凳等家庭用品，又让姐姐陈秋月住在一起给予照料。

陈毅在安排这些事时，没惊动任何人，连当地政府也不知道。后来，直到周总理和贺龙有事来到成都，总理问起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贺司令员也不知道。后来，是周总理他们派人四下打听才寻到两位老人的住所。周总理来到老人住所一看，认为那里简陋潮湿，就下了命令，把陈毅父母搬进东城根街半节巷5号军区的房子去住。

那年，只因四川成都父母家里出了一点家事，老爷子亲自写信要陈毅回去看看他们。

但陈毅哪来这时间？所以他就让王少艾代表他回去一次。在王少艾临行时，陈毅关照他说：“少艾，你看到父母，就对他们讲，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想见儿子，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看望他们。这当然都是安慰安慰他们的话了，实际上我不能随便回去看父母。就是死了也不能回去参加追悼会的。你想，我回去要给组织上增加多少麻烦？我去了，李井泉要陪同。他陪在那里送葬，这算啥子葬礼啊！叫你代表我回去就是这个道理……”

第一次对妹夫高喉大嗓发脾气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烈火在一夜之间席卷了大江南北。北京发生的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深深地震撼了远在南京的陈重坤夫妇。他们还来不及从混沌中醒来，一场“响应毛主席号召，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运动，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了陈重坤的面前。与此同时，南京军区也在江苏沿海成立了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这时的陈重坤不再是以前那个陈重坤了，由于陈毅在党中央的销声匿迹，她在世俗的人们眼中更是地位低微。于是，夫妻俩决定打报告申请到农村去，试着远离那个喧嚣的石头城。很快，申请报告批准下来了，陈重坤被分配在苏北连云港新浦农场卫生所工作，少艾分配在南京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任团长，巧的是夫妻俩工作的地点几乎就在一个地方。然而，夫妇俩人在连云港，心却时时在北京，二哥陈毅的情况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受到冲击？有没有被贴大字报与大标语？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谣传也像瘟疫似的在蔓延。尽管有关“揭发批判”陈毅的传单也是满天飞，但值得陈重坤夫妇欣慰的是这些文字中，没有一件是涉及陈家兄妹及亲友营私舞弊的内容。直到这时，他们这才真正理解陈毅过去为什么对亲友兄妹那么严格要求了。不然，他岂不是又陡增多少莫须有的罪名？！

这时，毛泽东正在北京一批批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王少艾所在部队也去过几批，就是没有人通知他也去北京。一个已被“打倒在地”的国务院副总理的亲属，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原来就“斗争性强”的王少艾“老脾气”复发了，他找到上级，据理力争，甚至不惜摆出老资格来：“人家师里的副科长也可以去北京，难道我这个原是军里的侦察处长就没有资格去北京了吗？”

王少艾终于作为最后一批代表去了北京。临上北京的前夜，陈重坤比王少艾还要激动，她知道二哥平时血压高，又爱说话，他的血压总是在240/160。她最担心的是二哥的身体，她要少艾一定提醒二哥平时少说话，特别对“文革”中的一些事，当讲少讲，不当讲则不要讲，甚至有些事可以以

“一笑了之”搪塞过去。

一年没见，陈毅明显地老了、瘦了，神情很憔悴。见到一年没见的妹夫来看望他们，也没露出多少笑容，平时那些幽默风趣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王少艾向二哥问过好，就忙着把妻子临行前的叮嘱——向陈毅和盘托了出来。“二哥，你平时血压高，可要多保重呀。重坤说了，让你少说话。不该说的别说，该说的也少说两句……”“唔，我知道了。”陈毅点点头，脸上露出了笑容。

“二哥，有些事你听着也就听着了，就当它不是一回事，一笑了之算了。”

“唔。我知道了。”

该问候的、该提醒的都说过了，这时，陈毅问话了。“少艾，你们南京军区都打倒谁了？”“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这三个人。”陈毅顿了顿，呼出口粗气，提高声音道：“打不倒！”

王少艾见二哥在这种时候还是这样不服气，不由心中替陈毅着急了，于是他就劝慰道：“二哥，重坤在我临出来前还一再让我对你说，要你少讲话，向不讲话的同志学习，还要向林副统帅学习，他毛选学得好，用得活，跟得紧，如能这样，我们也沾光……”

“我知道！”岂料，王少艾的话还没说完，陈毅就冲着妹夫狠狠一瞪眼，石破天惊似的一声吼。王少艾愣是吓了一跳。说实话，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二哥这样对他横眉竖眼、高喉大嗓的说话呢。

断了近4年的音讯终于又联系上了

从1967年到1970年，整整三四年里，陈重坤夫妇不知向北京写了多少信，要与被“打倒”中的二哥联系，可是，每一封发出的信都像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急中生智，他们向正在解放军某部服役的陈毅的小女儿投书问讯，请姗姗把信转交陈毅夫妇。

终于，1970年底，一封下面落款“北京张寄”的来信飞到了江苏省连云港新浦生产建设兵团陈重坤的手里。她怀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拆开信，一目十行地看了起来。

信果然是张茜亲笔写来的：

少艾、重坤：

……

现在简单谈谈我们这几年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参加了工作组，执行资反路线犯了错误，1967年初，受到批判。68年冬，参加外办（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学习班，通过开展革命大批判、斗私批修、解放干部、清理阶段队伍、整党各个阶段，我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1969年国庆节后，我已准备随外办人员去宁夏省银川平罗五七干校，但是当时中央号召疏散城市人口，加强战备，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老同志都做了具体安排，你二哥被安排在石家庄。我也遵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跟他一道行动。到了石家庄，我在一个制药厂蹲点学习，你二哥是在石家庄车辆厂蹲点，我们是各干各的。在石家庄整整呆了一年零一天，今年11月21日，我们重新回到了北京。这次之所以返京，是因为你二哥血压高，眼睛生白内障，要求住院治疗，获中央批准。因而回北京后，你二哥就进了301医院，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治疗，现在血压已经能控制在正常状态。今天已经出院。

我们还住在老地方。……

在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是过去的一班老人。只有刘妈一个在1967年

的9月，看见你二哥挨批斗，我们家庭的处境不妙，她自己提出去上海投靠她的干女儿胡梦兰。刘妈走后，我没能另外找人，家务劳动一切自理，在石家庄居住期间，当地组织上配备有女服务员，我仍然坚持自己洗衣服。现在回到北京，我还动手烧饭。总之，刘妈走后三年多时间，我自己搞家务劳动已习以为常。这几年，我倒长胖了，当然胖不一定是好事，可是这一点总是表明我在困难中没有垮下去，也是值得告慰的。……

1970年只剩下几天了，即祝你们新年健康！顺致你二哥的问候。

张茜 1970年12月22日

不等看完二嫂的来信，陈重坤就高兴地笑出了声。这时，她真希望王少艾早一点下班回家，也好让他分享这不尽的欢乐。

噩耗——陈毅患了绝病——癌症

1971年3月中旬，张茜的来信就像一个晴天霹雳——陈毅患上了绝病——癌症！

少艾、重坤：

你们最近寄来的一封信已收到。去年底，我给你们去信一封并附照片一张未知收到否？在那封信中，我讲到仲弘（陈毅原名）去年10月下旬，自石家庄返京就医住院月余后出院等情况。谁也没有料到过年以后，1月16日，骤然出现了一个大变化：仲弘再次住院，而且就在当天动了手术。其实也是上次住院被医生忽视的问题爆发了出来，使人感到突然罢了。从他上次出院之日，他就不断地闹头晕、牙痛、肚子痛、腹泻……到了1月16日的早晨，我看他气色不好，就下决心送他去301（医院），要求让他住院，以便观察病情。到了医院，经过外科主任检查，摸到他腹部右侧有一个很大的硬块，按上去痛区很明显，由此诊断是盲肠炎，须立即开刀。

院领导研究后，一面作手术准备，一面打报告，请中央审批。下午5点钟，该报告已送到周总理那里。总理立即派他的保健医生和我去医院，并批准了医院的手术计划，仲弘也就被送进手术室。开始是割盲肠的预定方案，认为是小手术，绝无危险，哪知打开患处一看，发现那个硬块原来是胀得鼓鼓的一个“大硬包”，而造成这种肠梗阻的原因，则是升级肠腺癌……术后一个月内，情况是令人忧虑的，由于医院加强护理，周总理亲切关怀，仲弘自己意志坚定的力量，一个个难关总算闯过来了，现在刀口已经愈合，心脏病已经平复。……你二哥听了医生的介绍，泰然自若，他说，癌症也没有什么要紧，何况已经拿掉了。要是再长出来，再开刀，有什么可怕的。医生护士都说他满不在乎，很乐观。刚开过刀，他的体重跌到了70公斤（穿着棉袄时磅的），现在体重又长上去了，不穿衣服过秤，已是足足74公斤。这20多天中恢复很快。目前情况好转，我才有平静的心情写信告诉你们。……

张茜

没等读完二嫂的来信，陈重坤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晴天霹雳哪！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把这天大的灾难降落在二哥的身上，难道你还认为这场不公平的运动把他折磨的还不够吗？！

王少艾却要比陈重坤来得冷静，他从二嫂的信中读出了潜在的另一层思考：问题何以一下子这么严重？这么突然？301医院何以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医疗事故？那里的医生可都是专门为中央级干部治病的，可以说都是医术很高明的，但为什么连这样已经很明显的腹中的一个硬块也检查不出来，从而居然会误诊？

陈毅住院治疗的内幕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少艾的这一思考是准确的。

那是因为当时 301 医院内科高干病房里住进了正权倾朝野的黄永胜！1970 年 10 月与解放军 301 医院联系，医院回电话说：6 病室没有床位，等准备好床位，再通知。其实，南楼 6 病室有 5 组空病房，只因当时黄永胜正在住院，他听说陈毅要来住院，气哼哼地说了声：他来吧，他来我就走！听到这个叶群的心腹人物的话，医院负责人哪还敢再收留陈老总？为此，直到黄永胜出院，医院方面才向陈毅寄来了通知书。

陈老总在 6 病室住了没有几天，又被搬到 5 病室。因为陈老总住院的第二天，李作鹏也住进了医院，而且也住在 6 病室！起先，李作鹏倒没什么反应。当天晚上，陈毅在走廊里散步，迎面碰上了前来看望李作鹏的邱会作、吴法宪。于是，第二天陈毅就被搬离了 6 病室。

然而，更严重的是在黄、李等一伙人的横蛮干涉下，陈毅的病情延误了！当时陈毅住进医院是作为一般高血压治的。在抄录的陈毅病历上，第一页就这么写道：

陈毅，男，70 岁，70.10.26 住院。

主诉：头痛、头昏、高血压 10 余年，近两月加重。近两年多来体重下降 20 多公斤。

要求住院治疗期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年逾古稀，体重骤降，这本是患有肿瘤等严重疾病的重要体证，理应及时组织会诊，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然而，陈毅住院后，医护人员被“敲警钟”：他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思想上要划清界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所以，整整 56 天过去了，陈毅病历上除了经医生的病程记录和科、部主任的一般性查房记录外，没有一次各科会诊的记录。相反，黄永胜因胃痛住院 18 天，医院某负责人亲自出面为他组织大小会诊 16 次，其中光请著名专家会诊就达 7 次之多。这恐怕就是所谓“医疗为政治服务”的最好注释！

医生奉命向张茜说：“陈毅身体检查不出什么，可以出院。”1970 年 12 月 22 日，陈毅出院了。当然，留在医院病历上的白纸黑字上却注明：病人自己要求出院。

1971 年 1 月 16 日下午 5 时许，周恩来接到 301 医院的报告：陈毅的阑尾炎亚急性发作，需要立即做切除阑尾的手术。周恩来批准了，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陪张茜一起前往医院。当天晚上 6 时 15 分，手术开始了。刚过几分钟，手术室里突然慌乱起来。

原来，腹腔打开后，医生们才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曲外的结肠癌、并已有局部淋巴结转移，侵及附近肝脏。

医院个别负责人担心周总理查问，写了一份不足百字的“检查”，承认重视不够，发生差错，“检查”送请邱会作过目。邱会作冷冷一笑，说：“陈老总手术发现癌是好事，你们有什么错误？！陈老总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吗？！”说完，他在“检查”上批示：“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直到陈毅逝世，医院负责人也没有向中央、向周恩来交出一个字的检查。

且说王少艾夫妇收读张茜那封令人肝肠寸断的来信后，心焦如焚、彻夜难眠。他们恨不能马上插翅飞向北京，飞到二哥的身边。陈重坤病急乱投医，像傻了似的一改以往足不出户的习惯，四出走门串户，寻求治疗癌症的

民间偏方，还求亲托友搞来了当时市面上不多见的云南白药寄往北京……在4月中旬，经王少艾向有关领导几经争取，终于取得了一个月的假期。

于是，陈重坤这才好不容易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

叶剑英送来的两只芒果

1971年4月上旬，陈重坤单身一人赴京探望二哥。

按理说小妹到京了，也就是到家了，张茜应该领她去中南海才是（当时，陈毅家住在中南海怀仁堂西面“青云堂”），可是，在那个非常的年月里，连自己的小妹到家了也不能随随便便地进入家门。

“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小妹你不能跟我回家。”张茜愁眉苦脸地不得不把实话告诉小妹。“是嘛？”陈重坤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

“唉——”张茜叹了口气，“别说你了，这两年里，就连小侬兄妹回家探亲，都要报领导批准，办理留宿手续后方可进来呢。”“那，我可怎么办？”陈重坤急了。她知道北京301医院不是一般医院，平时轻易不让外人探视，更别说留家属住宿了。张茜一咬牙：“管它，我们先去和门卫商量商量，也许能行呢。”说到这里，张茜就领着小妹来到了中南海门前，警卫班的战士们冒着被处分的危险，破例同意小妹住进中南海。

陈重坤来不及把板凳坐热，就与二嫂直接去了医院，去探望那朝思暮想的二哥。多年不见，二哥老了，银白色的头发已悄悄爬满了他的头顶，虽说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治疗，他还是那么胖乎乎的，但小妹明显地看出二哥的神色是那么憔悴、那么不安。兄妹相见，陈毅格外高兴。陈重坤更是悲喜交集，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要不是二哥二嫂一个劲催促她按时归队别误期的话，她真想永远与二哥在一起。在北京的一个月中，陈重坤只要一有机会来到二哥身边，她就紧紧粘在二哥身边不再离开了。特别是当医生要给陈毅作检查时，她更是一步不落地跟在二哥的左右。二哥不让她跟着，甚至向她发脾气，她也无所谓。因为她从医20多年，多少懂一点医学上的事，她不放心二哥的病情，她要在二哥旁边亲眼看一看、听一听才放心。

在中南海的时候，陈重坤就尽力帮二嫂分担些家务。她知道二哥喜欢穿手工缝制的衣服。于是，她就与二嫂一起动手，用旧衣服为二哥改制了一套棉衣裤，缝制了一件绸睡衣和几件内衣内裤。

一个星期天，陈毅向医院请假回到了家里休息。这天晚饭前，叶剑英元帅让人给陈毅送来了两只芒果，还附了一首给陈毅的诗词。陈毅戴上眼镜一看，不由高兴地哈哈笑了。

这天是小妹进京以来二哥最高兴的一天，吃过晚饭，陈毅说：“我吃苹果，芒果给重坤吃。”陈重坤坚持要大家一起吃。可是二哥二嫂就是不吃。陈毅故作生气地对陈重坤说：“看你！让你吃你就吃了呗。这芒果我们以后还会有得吃的嘛。”

当时，陈重坤是那么开心地吃下了两只芒果。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二哥和二嫂从此再也没有吃到芒果的机会了！

病榻上的陈毅说他想当个教师

在陈重坤临走的前两天，张茜又把陈毅从医院接回家住了两宿，让他们兄妹俩聚会的时间多一些，多说些心里话。

也许是病中有闲，也许是为凶险的后事作个交代，平时很少牵动儿女情长的陈毅在这个晚上却与小妹说了好多好多的家常话。那天晚上陈毅与陈

重坤的谈话，陈重坤终身难忘。

“小妹，还记得母亲的死因吗？”陈毅问。

“记得。”陈重坤点点头。

“我对不起她老人家呀！”陈毅深深叹了口气，“在她老人家生病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看她。医生说是中风，后来检查是子宫癌呢。”

一听二哥提及那个“癌”字，小妹慌了，连忙岔开话题：“母亲还是年岁大了。84岁去世的，所谓的瓜熟蒂落……”

“不。”岂料陈毅不依不饶，“真的是癌症，下身出了许多鲜血才检查出来的。父亲在青少年时埋头读书，一辈子不管事，一切都是由母亲操劳，也是年岁大了，听说还有点痴呆症。父亲活到87岁。他们两人也算高寿了。现在他们不在了，儿女们也放心了……”

这一晚也许是陈毅生前话最多的一个晚上，他说完了父母的事，又把话题转到了妻子儿女们的身上来了：“……你二嫂体弱多病，她廉洁奉公，对党忠心耿耿、一丝不苟，学习上很下功夫，能写文章。毛笔字也写得不错。她照顾我还抚养四个孩子，真操心，算得上是贤妻良母了。几个孩子的情况也还可以，昊苏、丹淮两个大学毕业，小羊、珊珊没得到上大学的机会。”陈重坤知道二哥一直为小羊和珊珊没有得到上大学的机会而遗憾，便安慰陈毅道：“不过不要紧，我想今后上大学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以后，他们兄妹俩会去争取上大学的。从实践中锻炼比直线上升好。”陈毅点点头，说：“几个小孩从小就好学上进，也还可以。我没有时间去管他们，但他们一个个能自觉，减轻父母为他们的操心，这也算不容易了。”

接着，陈毅又把话题转到了小妹与妹夫的身上：“你与少艾在基层工作，处境比我们好。我想将来当一个教师，工作中有充分的时间再学习。”陈重坤听了伤心。

分手的时候终于到了。那天，陈毅望着正默默整理行装的小妹，突然提议道：“重坤，我想和你一起拍个照呢！”

听到这话，陈重坤不由一怔。说实话，她平生还从没和二哥一起合过影呢！自从陈毅投身革命后，他一直不同意与自己亲人合影（除却年老的父母与妻儿们），他生怕兄弟姐妹们为此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荣誉感，而丧失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应有的感觉。现在听到二哥主动提出要和自己合影，陈重坤的心中是说不出的高兴与激动。她马上换上了一件她最好的毛涤两用衫，动情地依偎到了二哥的身边。“嚓、嚓”，快门闪动，陈重坤与二哥二嫂一起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纪念。

“这个半导体，给你们。你拿去……”陈毅颤抖着双手，把那只他用了20多年的日本产的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到小妹手里。“不，我不要……”陈重坤知道这是二哥心爱的东西，平时，二哥就是用它收听国家大事与世界风云的，这也是二哥目前家中最值钱的东西。

“拿去，一是做个纪念；二是让少艾带在身边，让他随时可以收听中央的声音……”陈重坤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二哥的双手与那只收音机一起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小羊回来了

6月底，一封带着二哥全家欢乐的家信来到了陈重坤与王少艾面前。仍是二嫂张茜那手漂亮的蝇头小楷，仍是满满的5张信纸：

“少艾、重坤：

首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小羊回家探亲来了……”

刚看到这里，陈重坤就忍不住放下信纸，高声把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少艾叫了起来，让他一起来分享这突然来的喜悦。

小羊是陈毅和张茜的第三个儿子，学名叫陈小鲁，生于解放战争。当时，小鲁没有奶吃，张茜只好自己养只羊，每天挤奶给他吃，所以小鲁有了个小羊的小名。1968年春天，仿佛为了证明“二月逆流”果真有其事，好像为了说明张贴反对中央文革大字报的“联动”组织当真有后台，社会上突然大传特传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联动的大头目，能使双枪，并“携带炸药进中南海，妄图谋杀中央文革领导”的谣言。江青为此居然亲自派人监视陈小鲁的一举一动，并把一份关于陈小鲁的所谓揭发材料，放到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周总理把陈小鲁找去，亲自向小鲁了解了一些情况。小鲁据实告诉总理说：这些都是谣言。接着，总理又把陈毅请去，开门见山地说：“陈老总，我了解小羊，他是个好孩子。可外面谣言太多，我看会影响你。我考虑了很多，想让他离开北京，你看怎么样？”

陈毅坦然地点点头，道：“总理，我听你的。我把小羊交给你，到哪里去都可以。”于是，周总理就亲自作了安排，委托陈锡联把小鲁带到东北，安置在辽西盘锦一个部队军垦农场里。在陈毅动第一次手术时，张茜曾为没法通知陈小鲁而难受。如今，“失踪”长达3年的陈小鲁忽然回到了家里，回到了父母的身边，面对个头长高了、人成熟了、又好端端回到自己身边的小羊，这叫为母亲的怎不高兴呢？怎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好消息而首先告诉小妹她们呢？！

少艾、重坤夫妇俩读完信，自是说不出的高兴。

离开北戴河，搬出中南海

从6月到10月之间，张茜的每封来信都给陈重坤夫妇带来了好消息，向她们传达了陈毅身体状况逐步走向好转的情况。

那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陈毅夫妇和聂荣臻元帅一家被安排到北戴河进行休养。在北戴河的那个夏天，张茜认为“我们是过得最热闹、最幸福的了”。9月2日（农历七月十三日），是陈毅的生日，珊珊与昊苏都专程来到北戴河，一家4口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在这个小小的家庭式的庆贺活动中，张茜他们邀请聂帅夫妇一起参加。

在北戴河，陈毅继续作化学治疗。陈毅对药物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胃口不受影响，吃东西也津津有味。但是从血象上看还是有反应的，主要是白血球和血小板降低。当血小板降低到8万以下时，医生就决定停止化疗了。

9月9日，陈毅结束了在北戴河的休养，回到了北京。不知为什么，人刚回到北京，上面就下了命令，要陈毅一家搬出中南海。军令如山倒，张茜顾不得洗去一路旅途带来的疲劳，即着手于搬家的事了。

9月11日，陈毅去301医院作全面检查，医生怀疑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医生决定：从9月17日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放射治疗。但是，就在这时候，“9·13”林彪事件爆发了！

9月15日，陈毅正和几位老帅在中央军委办公室开会，消息传来，群情振奋。张茜在国庆节前听到文件传达后，更是百感交集，忍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眼泪。不过，这些核心机密，张茜在给小妹他们的信中只字没提，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

这样，陈毅就又不能安心地养病治病了，他把整个身心又投入了对林彪一伙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去了。在党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陈毅仿佛忘记了病痛，忘记了时间，两次作了3万余言的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时期，林彪的历史真面目作了系统全面的揭发，又抱病在医院中修改了170页发言记录稿。为此，陈毅几乎耗尽自己全部的精力和体力。第二次发言一讲完，殷红的鲜血就从他的鼻腔里涌了出来。经过这次竭尽全力的搏斗，陈毅躺倒了，从此再没有下过床……

张茜在11月初发出急件，说陈毅再次住进医院，手术后，效果一般，精神和身体都比以前差了。陈重坤夫妇从张茜的来信中读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向领导几经争取，夫妇俩终于得以双双启程，一路风尘仆仆、追星赶月般地来到北京，来到日坛医院二哥的病榻前。

将近半年没见，陈毅明显消瘦了，神情憔悴，且极怕说话，不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张茜领着小妹与妹夫来到陈毅床前，低声说道：“仲弘，重坤与少艾来看你了。”

陈毅疲倦地睁开眼，只说了句：“你们不是说工作很忙吗？”王少艾说：“工作再忙，来看你二哥也是有时间的。”

陈毅微微一笑，便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

到京后，陈重坤夫妇就每天来到日坛医院看望二哥。可是，陈毅见了总是感到不安，总是说：“去，去，休息休息去。”一天，在医生们会诊时，一位正趴在显微镜下工作的主治医师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哎呀！是毒菌呀！你们大家都来看看。”

陈毅几乎整日陷入了昏迷之中。但是，他的那颗纯真的心还在工作中，还在战场上！

一天，陈毅告诉陈重坤说：“小妹，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我正在游泳。在池中，我碰到几位朋友，他们叫我快快起来，参加联合国去。”陈重坤一听，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流：都病成这样了，二哥还想着国家大事……

人生最苦生离死别

1972年1月4日，陈毅体温略微下降，神志恢复清醒，他认出了守在病床边的妻子和4个孩子，嘴唇蠕动着。女儿珊珊把耳朵贴近爸爸唇边，终于听清楚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这是陈毅留给妻子儿女的最后的唯一的遗言。

1972年1月6日16时20分，在陈毅病危之际，叶剑英元帅再一次匆匆赶来医院。他默立在陈毅的病榻前，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俯在陈毅耳边说道：“陈老总，毛主席和党中央要我来看你，要你安心养病，会好的。”说着，他又大声地说道，“毛主席为你平反了，他说，现在再也不要讲二月逆流了……”

可陈毅木然睁着眼睛，脸上毫无表情。无情的病魔使他的神志一会儿清楚，一会儿麻木，他已不能用语言表达了。珊珊伏在陈毅的耳边，轻声说道：“爸爸，刚才叶帅的话你如果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奇迹发生了，只见陈毅当真闭了闭眼睛。

于是，病房里回响起了由珊珊清晰缓慢转述的声音：“毛主席说，现在再也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当时是‘5·16’，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打击一大片，包括你（指周恩来总理）在内。当时那个情况，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

清楚了。”

陈毅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又奇迹般地眨了几眨眼睛。毛主席关于为陈毅平反的指示，使在场所有人都激动不已，含着泪水的笑容，荡漾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当天深夜 11 时 55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军委副主席陈毅同志永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哭声揪人心肺地响了起来。

稍顷，张茜拿起电话筒，第一个把这噩耗告诉了周总理。她在电话中泣不成声：“总理……陈、陈毅同志与、与我们永别了……”

总理那面沉默了好久，才传来了沙哑的声音：“真是……这样逝世了……”天还没亮透，周恩来就赶到了医院。他见到张茜，已是老泪纵横，哽咽道：“癌症，癌症……难道医生一点也没有办法了吗？”

张茜迎上前，刚说了声“总理您来了”，就晕了过去。好一会儿，她才渐渐苏醒过来，她努力克制着自己，过了一会儿才向总理表示谢意，她说：“有劳总理对陈毅同志一片深情。”

陈重坤和王少艾也含泪来到总理面前。他们刚叫了声总理，总理就认出了在 20 多年前只见过一面的王少艾，他握住陈重坤夫妇的手，说道：“少艾也来了。”

当陈重坤得知要对二哥的遗体进行解剖时，她一时想不通，受不了了，哭着表示不同意。张茜含泪向陈重坤解释道：“小妹，这是党中央的规定，也是你二哥生前的愿望。”

高级干部死后，一要为科学作贡献，解剖；二要火化，移风易俗，与封建迷信作斗争。

这是你二哥最后一次为党为人民工作了，你要理解呀……”

1972 年 1 月 10 日下午 3 时，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在追悼会举行前半小时，毛主席来到了会场上！

毛主席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

八宝山休息室里，毛主席接见了陈毅一家及其亲属。陈重坤是亲属，可以得到毛主席的接见；而少艾是亲戚，则眼看着毛主席而又不能上前。

这是陈重坤平生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所以，她内心非常激动。当她接到通知走进休息室时，便看见毛主席已身着米黄色的风衣，和几位同志巍然坐在那里了。毛主席的手臂上已戴上了黑纱。

张茜领头走进休息室，率众来到毛主席的面前。她先向毛主席鞠了一躬，恭敬地说：“您老人家也来了，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清泪两行握住了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重、沉痛：“我是来悼念陈毅同志的嘛。陈毅是一个好同志。”

接着，张茜向毛主席一一介绍子女：这是小侗、这是小丹……当介绍到小羊时，周总理插话说：“他就是生下来没有奶吃，吃羊奶长大的，叫山羊胡子。”当张茜介绍到小珊时，周总理又补充道：“这是珊珊，一个姗姗来迟的女孩。”

孩子们一一上前与毛主席握手。这时，毛主席对孩子们说：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陈重坤是最后一个上前与毛主席握手的。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陈毅同志最小的一个妹妹。”

陈毅同志参加革命时，她还没有生呢。”

毛主席点点头，问陈重坤：“你是共产党员吗？”

陈重坤抑制着激动的心情答道：“不是。正在努力争取。”

这时，张茜对毛主席说：“您与陈毅同志做的诗词，她现在还好好地珍藏着。”

毛主席略带微笑说道：“陈毅同志的诗不大合平仄。”

张茜说：“他琢磨不够。”

毛主席说：“他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人呀！”

追悼会开始了。张茜搀扶着毛主席走在前面，进了会场。西哈努克亲王、周总理与其他同志也相继步入了会场。

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同志遗体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骤然形成高潮。

追悼会开始放哀乐，周总理致悼词。

张茜送毛主席上了汽车。其他同志一个个绕场一周与陈毅遗体告别。散会后，张茜与陈重坤等一起含着伤心的眼泪，送陈毅的遗体去火化……陈重坤回到家中，更入静了，她还毫无睡意。她端详着墙上挂着的二哥的遗照，望着二哥那慈祥而庄严的容颜。

悲从中来，泪如泉涌。她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二哥，我亲爱的二哥，永别了！

永别了！

刘伯承与陈毅的旷世之谊

甘耀稷

刘伯承元帅生于 1892 年 12 月 4 日，陈毅元帅生于 1901 年 8 月 26 日。刘帅比陈帅大 9 岁，但他们却是最亲密的同志、战友，共同经历了中国革命斗争最艰难的岁月，从而结下了终生不渝的深厚革命情谊。

刘伯承和陈毅第一次见面，是在 1926 年 11 月，地点是重庆。

川军首领杨森脚踩两只船

1926 年，国民革命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10 月，革命军攻克武汉。

由于革命军节节取胜，原来依附北洋政府的四川军阀们也想倒戈投靠革命，以图取得国民政府承认，委以军权，保注自己的军队、地盘。但他们大都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进行政治投机，驻万县的杨森就是这种人物之一。他当时任北洋政府“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又刚被吴佩孚委任为四川省省长，挂着这些头衔，却又到处找关系，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人”，促请国民政府派人去改造他的部队。杨森的秘书喻正衡，就是奉此使命到了北京。

1925 年夏的一天，喻正衡遇到了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陈毅。陈毅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从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毕业，担任着中共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并经组织批准，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委。

这个特别市党部，是国共合作的缩影，其成员很有特点，国民党方面有吴稚晖、顾孟余，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张国焘、陈毅。

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又兼国民党北京政委会负责人，是陈毅的直接上级。陈毅向李大钊汇报了喻正衡来京的目的。李大钊认为这是抓军队的极好时机，即指示陈毅深入了解，并与喻建立联系。不久，李大钊便正式布置陈毅回四川进行兵运工作。

1925年8月，陈毅带着李大钊、李石曾（国民党知名人士）分别致杨森的亲笔信，在喻正衡陪同下，到了四川万县杨森驻地。杨森在四年前，就曾礼请刚从法国回来的陈毅到他军部担任秘书，陈毅婉辞未就，去了北京，这次见到陈毅带着二李的介绍信前来，接待更是格外殷勤。他首先表明参加国民革命意向，标榜自己是开明派，甚至说，如革命需要，可发川军10万到两湖支援北伐。并欢迎陈毅到他军中参赞军务，可代表他到各部队走动，自由出入军部各处及杨森宅第。第二天，杨森又介绍“第三国际”派来的代表、川中名将朱德与陈毅见了面。随后，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要陈毅秘密会见一位党内同志，一见面，又是朱德。从此，这两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开始了在杨森部队的合作，表面上，却看不出同是共产党派来的人物。

不久，朱、陈策动杨森，反击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罪行，向英舰开火，迫使英舰负伤逃遁。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江上第一次反帝斗争的胜利，但在吴佩孚严压下，杨森不敢继续坚持，斗争以虎头蛇尾告终。

时值北伐军攻克武汉，吴佩孚向杨森告急，在这紧急关头，杨森彻底暴露出他投机革命的本来面目，竟然发兵“援鄂”，以牵制北伐军，并“礼送”朱德、陈毅离部。

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委（即四川省委）接上关系，分配他负责青年团的工作。

从杨森反复无常变化这一事件，使党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武装，将一事无成。党中央决定组织武装，派刘伯承回四川搞军运工作。

刘伯承的神话

1926年10月下旬，在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上，根据国民党中执委吴玉章建议，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四川负责全川军事工作。刘伯承已于1928年5月，由杨安公、吴玉章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公开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在国民党名义掩护下，11月中旬，杨安公、朱德、刘伯承，又在重庆刘伯承家中，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安公、朱德、刘伯承组成，杨安公任书记。

1926年12月初，重庆军委决定组织泸（州）顺（庆）驻军起义。

在一次党团联席会上，陈毅得知了正在策划的起义行动，刘伯承担任起义总指挥。

陈毅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刘伯承。他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相互仰慕已久，陈毅早就知道名震四川的刘伯承。在蔡锷将军领导下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和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中，青年将领刘伯承以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善出奇兵著称，使与之为敌的军阀们畏之若虎，闻风丧胆。在与袁军丰都一战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从右太阳穴穿入，透右眼而出，他当场昏倒在血泊中，经抢救始脱离危险。正遭北洋政府通缉的刘伯承，后来潜至一

家德国私人诊所动手术治眼，为了保护脑子，只能施局部麻醉。3 个多小时内，挖去赘肉时，修了 70 余刀，刘伯承汗如雨下，忍痛默念刀数，一声也未呻吟，事后德国医生赞叹不已，称刘为“军神”。当陈毅看到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出现在面前时，激动地紧紧和他握手，心中为有这样的战友而甚感骄傲。

陈毅当时才 25 岁。但 4 年前他在法国领导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们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出卖铁路权的爱国斗争，以致同蔡和森等被押送回国的事情，早已闻名全川、全国。回国后，22 岁即任重庆《新蜀报》主笔，经常撰文抨击时弊，鼓动反抗军阀暴政，又被杨森下令“即日离川”驱逐出境之事，也是很有名的。尔后在北京领导学生运动，这次又是李大钊亲自派来四川工作等情节，朱德都——向刘伯承作过介绍，刘伯承也十分钦佩这位风华正茂的党内年轻同志。

两人相见谈得十分投契，对时局形势分析亦尽相同，都深感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对沪顺起义充满信心。

12 月初，泸州、顺庆先后发动起义，占领了泸州的 3 个旅长，贪恋泸州大量税收，不愿向顺庆转移。陈毅曾去泸州，在万吹楼分别找各旅领导人劝说，但他仍不听，致使沪顺两地均兵力分散，受敌威胁。

中共重庆军委又急派刘伯承前往坐镇。刘伯承此时已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及国民革命军暂编第 15 军军长之职，到泸州后始稳注了局势，并开始了军政人员培训和部队建设。

此时合川中共地下党要求派人去合川驻军工作。合川驻军正是沪顺起义争取的重点对象，党就派陈毅前往，担任 28 军 3 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对部队进行改造，为部队向泸州集中作准备。

刘伯承在泸州整顿军务、政务两个多月，使混乱的泸州面貌一新。3 月 18 日，还公开纪念“巴黎公社”成立 65 周年，举行了群众大会，革命气氛浓厚，但泸州却成了插向四川军阀咽喉上的一把尖刀，他们看到这种“赤化”的蔓延，万分恐惧，担心有朝一日全川“变天”。

起义失败刘伯承奔向新征程

1926 年大革命的洪流中出现了暗流。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感到四川共产党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一旦泸顺地区成了气候，四川就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3 月 23 日，他密令刘湘“限两个月内消灭川境（革命）力量。”

于是，3 月 31 日，刘湘制造了震惊全国的“3·31”惨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刘伯承、陈毅均参加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坚持 5 个多月之后遂告失败。

随后，刘伯承被刘湘悬赏 5 万元巨款追缉，他通过了层层关卡，九死一生，终于脱险，经西安于 1927 年 7 月中旬到达武汉，向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汇报了泸顺起义经过，并讨论了善后事宜。

此时党中央已在策划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选定刘伯承当自己的参谋长一同前往举事，策划中国革命史上轰轰烈烈的“八一”南昌起义。

陈毅逃出魔掌追赶起义军

“3·31”惨案发生后，合川 28 军 3 师代理师长王学姜阴谋捕杀陈毅。陈毅机警地察觉了王学姜的毒计，在友人帮助下，星夜撤离合川，逃出魔掌。他到了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的重庆城，得知党组织已遭彻底破坏，杨 an 公也

被惨杀，陈毅决心赴武汉。在新任旅长、他的同学、旧友郭勋祺护送下，一个晓色初露的清晨，装扮成富商，身穿西装革履的陈毅，搭乘一艘日本商轮，离开杀机四伏的重庆去了武汉。

陈毅到达武汉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分配他到由原黄埔军校改组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委书记，公开身份为校部的准尉文书。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陈毅还在武汉。汪精卫宣布“分共”后，陈毅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军校党员应变。汪精卫不想保留学校，将军校编成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因形势急骤变化，“八一”起义的事不可能事先告诉陈毅。8月1日，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2日起程，2000多人，分乘大客船、小火轮、拖船顺江而下。8月4日，行至九江，即被张发奎的2方面军部队缴了械。因为党组织是秘密的，陈毅及教导团的正、副团长（也是党员）均无法控制部队。

事已至此，陈毅于当晚，召集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开会，分析研究形势，商量对策。

看来南昌方面传闻举行的暴动已经成功，大家研究决定了党员的几个去向：一是连夜分散出发到南昌找叶、贺部队。一是回家乡搞农民运动。没暴露的党员，可继续留张发奎部队隐蔽活动。大约有200多人愿意留下，组织3个支部。他们随张发奎到了广州，以后成了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

陈毅在军校虽是秘密活动，但因接触的人很多，实际也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再也不能留了。他就和特务连连长、党员肖劲一起，连夜离开九江往南昌而去。一夜就走了40里地，沿途曾经盘查。待8月6日赶到南昌，起义军已离去。这时，张发奎的部队进了城，正在抓杀共产党，几个接头的地方也不敢再去联系，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起义军往抚州方向去了。陈毅带肖劲又去追部队，一直到了临川，才赶上起义军，见到了周恩来、刘伯承。

刘伯承力荐陈毅任要职

在这艰难的时刻，大家重新见面，非常高兴。刘伯承对陈毅冒险追赶起义军的行动，倍加称赞。陈毅向周、刘报告了军校情况及对学生的部署，周、刘对陈的处置均感合适。

周恩来和刘伯承商议对陈毅的工作安排。在这关键时刻，刘伯承极力促成的陈毅掌军的安排，可以说影响了陈毅往后在革命征途上的发展。周恩来当时对陈毅的了解，印象深的是留法勤工俭学时冲锋在前，口才犀利，敢于斗争，而刘伯承对陈毅的了解，则在沪顺起义过程中，陈毅关于党必须掌握武装的一系列思考，使他感到他们两人的认识非常接近，所以此时，刘伯承提议由陈毅直接去掌握一支部队。最后议定：陈毅去25师73团担任指导员（相当于团政委）。

周恩来还风趣地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不要嫌小。”

陈毅却很高兴地回答：“什么小不小，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就行！”使他特别高兴的，这次去的不是一般部队，而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战绩辉煌的英雄部队73团。

1923年就成立的这个团，其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4方面独立团。是我党最早创建、由周恩来亲手组织的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叶挺从苏联回来就担任这个团的团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打汀泗桥，攻克武昌城之战尤为著名，有“铁军铁团”之称。现有2000多官兵。在这危难时刻，党赋予陈毅担任这个团的党代表之职，他怎能不高兴！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一部份南昌起义军及后来又发展的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地区砦市，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兼10师师长，毛泽东任军党代表兼11师师长，陈毅任第12师师长。

1927年11月，刘伯承由党中央派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8月到了上海，立即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长。1932年，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及红军总参谋长。而此时，陈毅则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江西省军区总指挥兼政委。

他们同为党的高级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陈毅长诗电贺刘伯承50寿辰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刘伯承随中央红军踏上征程，陈毅因重伤未愈，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从此两位战友一别十年，直到1944年2月，才在延安再次见面。

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他们虽然分别，在祖国的北方和南方进行抗日战争，除从中央文电中了解彼此情况外，相隔迢迢，无从聚首，但系念之情未断。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举行50诞辰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士气。得知此讯，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从遥远的东南方，用电报发来一首充满敬仰、关切、热情洋溢的贺诗，题曰《祝刘伯承将军50寿辰》。诗文如下：

将军老益壮，戎马三十年。

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

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斗争更坚决，冬青耐岁寒。

君在黄河北，我在淮泗南。

军前专征伐，敌后拯黎元。

举杯祝远道，康强慎食眠。

诗中，陈毅称颂我党我军杰出军事家刘伯承，为当代的孙子、吴起。以伤残之躯，为拯救人民于水火。而忠心耿耿在敌后抗日前线，操劳军务。全诗精萃而富有感情，若非深刻理解刘伯承，而且友谊真挚的战友，是写不出这样的诗来的。

1944年他们在延安聚会后，一起在党中央学习、工作，相处机会更多了。毛主席还常和他们研究部队建设。

1944年6月，毛主席起草了一份《关于部队整训的指示》，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三位在前线亲自带兵打仗、独当一面的统帅提出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了文件后，又写信给他们：

陈、刘、聂三位同志：

此件根据你们意见已补充了，虽长3千字，但较充实些。唯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当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在延安期间，毛主席常邀陈毅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名字经常见诸报端，而刘伯承是秘密来到延安的，有些大的活动未曾通知刘参加，陈毅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顺带反映了此事。毛主席复信中，当即表示，有的场合应请

刘伯承出席，如有时我没想到，就由你通知。

陈毅真可说是随时都记挂着战友。

在党的“七大”上，他们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与26日即就任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我军一批高级将领，同乘一架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延安到达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凝机场，然后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两位战友又统率大军，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战争，在中原、华东两个紧邻的战场上并肩作战。

从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电报、人员往来频繁，相互交流经验，部队紧密配合作战，使中原、华东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完成了挺进中原的任务

到了1947年7月，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同时此举也是为了从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实行中央突破，吸引敌人大批主力部队南下，以粉碎其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之部署。

在执行党中央这战略任务的行动中，中野、华野配合更为密切。军委部署刘邓大军，陈粟野战军一部及陈赓兵团，三军成品字形南下，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时，就是在陈毅亲自率领华野5个纵队及11纵的有力掩护下进入大别山的。

在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时，陈毅所率部队也在豫皖苏展开了建立根据地的活动，有力地牵制敌人配合了大别山的斗争。经过八个多月来的艰苦奋斗，我军终于在大别山站住脚，重建了革命根据地。

刘邓请调陈毅协统中原大军

我军在中原实行战略跃进后，解放了2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并建立了鄂豫、皖西、豫皖苏、豫陕鄂、桐柏、江汉等六个军区。此时中原局辖区很大，情况复杂，要巩固根据地，要打仗，又是两大野战军配合作战，任务十分繁重。

刘伯承和对陈毅也十分熟悉了解的邓小平，联名于1948年4月21日致电党中央，请调陈毅来中原工作，建议陈毅来后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副司令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或军区、野战军第二政委，或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并仍兼华野司令员、政委不变。

毛主席阅后，复电刘邓，中央将会商中原机构组织问题。

粟裕得知这一情况后，向毛主席力陈：“华东离不开陈军长”。

到5月5日，刘邓第二次电催中央，请调陈毅。并建议陈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野司令员。

至5月9日，中共中央终于采纳了刘邓意见，调整了华北、中原两解放区辖区后，改组了中原局等机构，以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政委。陈毅任第二书记。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任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

刘伯承、陈毅两位亲密的老战友又一起共事了，当然他们的担子很重，刘邓陈将负起率领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的光荣艰巨任务。

陈毅于 1948 年 5 月 30 日，偕同调任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离开濮阳前往中原就职，他还负有党中央委托他，向中原军政干部传达中央十二月会精神的任务。

出发前，陈毅对准备工作考虑得很周到。他从电报中得知，刘邓部队在远离后方千里的新区，坚持大别山斗争，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当严冬到来之际，十万将士还薄衾单衣，刘邓都要亲手缝制棉衣御寒，别的方面就可想而知了。陈毅从濮阳到豫西中原军区驻地宝丰，行程逾千里，长途风尘仆仆，路上也不太清静，还要提防敌人袭扰，更多的东西是无法携带的，他就嘱咐保健医生翟光栋，带几箱最好的西药和医疗器材，给中原的首长们用，以维护他们的健康。

刘邓非常重视陈毅、邓子恢的到来，一行人刚下太行山，刘邓就派陈赓到晋城迎接。

当时路上不安宁时有土顽活动，为了陈邓的安全，陈赓首先命令纵队副司令，率两个旅的部队，从洛阳的龙门到宝丰，将沿途的土匪进行了一次“清扫”，他自己亲自带警卫连，把陈毅接过黄河，迎进洛阳。各纵队领导，也都从宝丰赶到洛阳迎候，会齐一起南下。

陈毅于 1948 年 6 月 14 日下午，到了河南宝丰县西北，商酒务地区皂角树村，中原军区驻地。

陈毅到达后，和刘邓一起，住在村边小院旁。后勤部门专门给他腾了一间宽敞的房子，离作战科十几步，方便工作。

陈毅到来之前，刘邓就在机关介绍了陈毅的斗争历史，号召大家向陈总学习。中野的同志对新四军军长陈毅的英名，早已如雷贯耳，如今要朝夕相处，都十分高兴。

陈毅到达的第 4 天，就用了整整 3 天时间，向中原局、中野机关和附近驻军县、团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十二月会议以来，党中央、毛主席一系列的指示及会议精神。讲话一开始，他就非常谦虚的说：“我来这边参加工作，我们大家同在刘邓领导下工作。”而刘伯承向大家介绍时，则称陈毅是“军委派来的代表”。的确，陈毅是党中央授命传达中央指示的，所以他说：“中央给我的任务，要我代表党中央向中原全体同志问好！”

陈毅在谈到党中央会议及毛主席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报告的背景时，说：毛主席亲自讲：“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才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胜利。”陈毅的传达，使中野广大干部战士，对刘邓领导的在大别山进行的十分艰苦的斗争，在全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大大地鼓舞了斗志。

陈毅与刘邓融洽相处

陈毅到中原后，见刘邓不用秘书，就叫自己的秘书去中原军区秘书科工作了。每天就和刘邓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作战科办公。

刘邓也没有保健医生，陈毅的医生翟光栋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医生。陈毅去以前，中野的医疗条件很差，刘伯承看病都常吃中药。陈毅去后，就叫翟光栋看病时，将带去的好药给刘邓等首长服用，而他自己生病时，却常去找中野的卫生部长用针灸治疗。

在起草给中央或军委的电报时，他们都是相互谦虚传改。如需三人署名时，陈毅起草的电稿署的都是“刘邓陈”，而邓小平起草的电稿就是署的“刘陈邓”，至今在档案馆内，还能看到老一辈革命家这种深具谦虚美德的电报原稿手迹。

陈毅和刘邓相处十分融洽，亲密。他们住在紧邻，三人都有早起习惯，邓小平起得最早，天一亮就起床，身体也特别好，即使冬天也洗冷水澡。刘伯承每晚临睡前，放一杯盐开水在床头，早上一起床就喝掉这杯冷的盐开水。第一件事就是问警卫员，今天天气如何？刮什么风？云往哪个方向走？大军统帅时刻关心着与战事关系密切的天气变化。

他在起床后打一趟拳，然后就端一个小板凳，坐到树林边读俄文，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陈毅早起打拳后，就散步思考问题，一言不发。秘书、警卫员都知道这时候别去打扰他，不然是要挨ke的。

早饭后，他们一起到作战室，或各自办理当天的繁忙军政事宜。晚饭后一起散步，这时气氛就较轻松了，谈天说地，内容十分广泛，政治、军事、文学、历史，直到干部思想、士兵生活，敌军情况，有时还谈到家乡风物（他们三人都是四川人）当年留法、留苏的回忆及轶闻掌故等。谈话中常常夹着四川常用的歇后语，生动、形象，妙趣横生。

在生活上他们也是互相关心。有一次，炊事员做了一碗鸡丝面给刘伯承送去。这在当时艰苦环境中是很难吃到的。他就问：“邓政委、陈司令员有没有？”炊事员说都送了，他才肯吃。

陈毅在中野虽然工作很紧张，但心情十分愉快，不像在华野，有个饶漱石在身边，老是嫉恨他，千方百计盘算他。虽然饶漱石的许多阴谋诡计未能得逞，常常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当时，却使胸襟坦荡，性格豪爽的陈毅很不愉快。所以到中野后，他与刘邓相处就心情格外舒畅。滂沱大雨挡不住刘伯承的承诺

陈毅一向钦佩刘伯承对部队对自己均要求十分严格的作风。为了培养大批急需的党政财经干部，中原局成立了中原大学，由陈毅兼任校长。举行开学典礼那天，陈毅请刘伯承去讲话，刘伯承欣然答应准时前往。中原大学校址，离野司驻地还有几十里地，陈毅先走了，谁知走后下起了倾盆大雨。陈毅在大会开始前到处走动，与学员们聊天。校务部门的同志见雨越下越大，就对陈毅说：“雨越下越大，恐怕刘司令员不会来了，是否先开会？”陈毅一听，摇头说：“不行！不行！一定要等，刘司令员这个人说到做到，一定会来的！”果然，刘伯承在滂沱大雨中，坐车到来。那时坐的都是缴获的美式小吉普车，挡不住风雨的。刘伯承已是浑身湿透。陈毅迎上去说：“这么大的雨还来。”刘伯承说：“说来就要来的。”陈毅要刘伯承去换衣服，不要讲话了。他确实耽心刘伯承淋了雨生病。刘伯承连声说：“开会！开会！”衣服都顾不上换，就向会场走去。会议开始，陈毅以此事为开场白，说：“刘司令员这一行动，就是对我们全体同志一次遵守纪律的最好教育！”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掌声。

陈毅对两大野战军的团结十分重视，身兼华野司令员、政委，他对华野的干部，甚至很高级的领导，也是要求很严的。豫东战役之后，华野负责人以“军事观察家”名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论该役胜利。文章对中野部队在战役进行中，大力配合作战，在南线牵制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在西线

牵制郑州敌人的作用未具体提到，显然是忽视中野在全战役中起的重要作用。实际情况是，当时为了保证华野豫东作战的胜利，刘邓陈曾亲自组织前进指挥所，率领中野 4 个纵队在南线作战，部队为此付出过相当大的牺牲，这些都是陈毅亲自经历了解的，而华野领导也是知道的。所以陈毅看过这篇文章后很生气，当然，他对从这件事反映出来的问题想得更深些。

另一件事，是有一天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到中野营以上干部会作报告，介绍打洛阳的战斗经验，虽然报告总的讲得较好，但对炮火的作用说得有些过份。以至陈士榘讲完后，天都黑了，刘伯承还叫大家不要走，接着讲了话，叫大家不要有光想依靠大炮作战的心理，强调过去战争中甩手榴弹也战胜了敌人的事实，部队应根据现有装备条件，发挥我军长处，勇敢机智地战胜敌人。

陈毅从这两件事想到许多问题，他认为事情的发生，其根源还在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政治修养，如果不及时尖锐指出，任其发展下去，不但对这些同志本人的成长不利，而且会影响两大野战军的团结，那就会对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恶果。想到这些，陈毅再也无法平静了，他于 7 月 24 日，给华野代司令员、政委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发去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并报中央。电文措词十分严厉，指出：“无论个人的骄傲与部队的自大作风，均属政治问题，即是弱的表现”；要他们“在雨季整训中，注意上述问题的检讨。”

粟裕、陈士榘，很快于 7 月 28 日，复电“陈军长，并报军委”，表示“完全接受批评并进行了检讨”并向刘邓及兄弟部队表示歉意。陈士榘也表示，那天讲话后就觉得有不妥之处，“希多方加以指示”，并对步炮协同问题作了解释。

虽然从井岗山时期起，陈毅就是粟裕、陈士榘的老上级，但对当时华野这么高级的领导人提出如此坦率严厉的批评，也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胸襟坦荡，对战友、同志和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原则立场。

淮海大决战三常委轮流值班

淮海战役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是总前委常委，邓小平是书记。他们住在宿县西北约 40 公里处一个叫小李家的村子里。村子也的确小，只有二、三十户人家。邓小平、陈毅，为了照顾年大体弱的刘伯承，将他安置在一个单房间里住，邓陈则在此屋的外间，安上两张行军床，对面而卧，为了不影响休息，这里的一部电话机拉了很长的线，谁讲话就到外面去讲。作战室在同一小院的另外几间屋里，总前委的三位领导，就在这里指挥敌我双方兵力逾百万的，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淮海大决战！

在这空前规模的大战役中，工作异乎寻常的紧张，以往战斗中，刘陈邓在作战部署下达后都略事休息，一般由李达参谋长掌握进展，有特殊情况再请示他们，但淮海战役非同小可，他们决定，一昼夜 24 小时中，一定要保持有一位首长亲自掌握全局，由三人轮流值班。邓小平、陈毅，一直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和照顾刘伯承。刘伯承考虑到这一点，就先发制人，抢先提出，三人一视同仁，昼夜值班，“平等待遇”。但邓、陈坚决反对，以二对一的多数票，否决了刘伯承参加值夜班的动议，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才同意保留一条：遇着特殊情况时，可以在夜里把刘伯承叫起来一起商议。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自己身体好，应尽量多值夜班。陈毅当然也不同意，一定要二人“分享”值夜班之权利，即使如此，刘伯承在关键时刻还是不睡，

直接给各纵队司令员打电话，了解战况，布置任务，有时用四川话叫大家“要过坳！”而邓小平经常是整夜不睡连续工作。陈毅总是催他“该休息休息，轮到我了！”邓小平才回去闭一会眼睛又来了。所以三位常委“轮流值班”却常常是大家都在。他们是那样的辛劳，以致一段时间过去后，刘伯承的眼镜都快挂不住要往下掉，陈毅不用减肥也成了瘦子，而一向很注重军容的邓小平，竟连修脸的功夫都没有，留起了胡子。这些都那么真实地记录在淮海战役五位总前委成员合影上，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直令人感慨万千。

决战时刻，陈毅甘愿啃骨头

在淮海战役进行过程中，每逢研究重大军事行动时，陈毅总是先发言，讲完后就说：“我的意见讲完了，请主帅（指刘伯承）最后决定！”

刘伯承总是谦虚地说：“大家商量，大家商量。”在场的同志也笑。

陈毅却严肃地说：“莫笑！下决心只有主帅，不能大家下。司令员是你，我是副司令！”

当然，一些重大决定，往往还是刘邓陈三人共商定下的。

身兼华野司令员、政委的陈毅，十分体谅中野部队从大别山出来后，部队人员、装备不太充实的实际情况，经常向中央建议，让华野多出部队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除牵制部队外，华野有三个纵队在参谋长陈士榘带领下，直接参加了总攻黄维兵团的战斗。

在南线，光消耗，无缴获，最艰苦的阻击任务，就是华野第6纵队担任的。这个纵队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许多同志是陈毅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时的老骨干。淮海战役中陈毅常常直接掌握这个纵队，给纵队领导打电话、写信，严令他们准备伤亡过半，保证中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胜利，华野6纵坚决执行了陈毅的命令，付出很大代价，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陈毅命令华野一个汽车团，昼夜不停地向中野这边送弹药，一次几十车，对中野作战是有力的支援。

总攻黄维兵团部时，陈毅命令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将主要炮兵全部拉过来支援。陈锐霆接受任务后，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大白天带了个骑兵班，驰马亲至中野领受任务。华野特纵的参战，对全歼黄维兵团起了重要作用。

在打扫战场时，华野个别部队，为争战利品和中野部队发生争吵，问题闹到统帅部来了。陈毅闻知此事，接过电话筒，对该部指挥员说：“你听着！这次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包括你们已经拿到手的，立即全部交给中野部队！你没有看到兄弟部队的困难吗！”

谁违犯这一条，要给以严厉的处分！”他接着又说：“不光你的武器结他们，战斗结束后，把你们也交给中野！分什么彼此？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嘛！”

陈锐霆在打扫战场时，担任华野战地司令，他遵照陈毅的专门指示，把缴获黄维的全部美械装备，都给了中野。

陈毅和刘伯承的友谊，和邓小平的友谊，及对中野部队的友谊，是共产党内真正无私的，崇高、感人的战斗友谊。

当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2野战军进军西南时，急需大批军政干部。特别是熟悉故土的四川籍干部。第3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就给3野部队下达了一条指示：“只要是四川人，愿意去四川的，都可以到2野去！”

他还帮助2野组建了特种兵纵队和西南服务团，并支援了许多人员、

物资，全力支持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的行动。

刘伯承组建军院，陈毅鼎力相援

1950年，刘伯承奉毛主席函令，筹建陆军大学。刘伯承欣然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2野司令员职务，积极组建全军最高学府。后因考虑还有培训海、空军任务，改名军事学院。刘伯承于1950年11月就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军事院校址设在南京。

成立大会那天，出现了十分隆重动人的场面。华东军区暨第3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陈毅在一面鲜艳的军旗面前宣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举行成立授旗阅兵式。我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光荣的‘八一’旗帜，授予刘院长伯承同志和军事学院全体同志……”

陈毅讲话后，刘伯承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面前，双手捧起军旗下角，吻了一下，从陈毅手里接过军旗，庄严讲话：“我接受了我们军事学院的战斗旗帜之后，让我在您面前，向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提出保证：我们全院人员将永远保持这面尊严而富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传统的旗帜，作为我们军人的英勇与荣誉的象征……”

这一时刻，刘伯承、陈毅两位战友都十分激动，泪花在他们眼里转动。从1926年起，他们就舍生忘死为党创立武装，经过了“八一”起义，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踏遍千山万水，付出了多少战友的鲜血和生命，我们的党领导人民终于打下了江山，有了一支经历过无数次血与火考验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的创立、成长、发展，每一个历程都有着他们二人的心血啊！今天，我们的军队又将向更现代化的正规军建设发展，军事学院的成立，培养大批军队高级干部，就是这新的里程的起点，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

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后，和亲密战友陈毅同住南京城，心情特别高兴，他希望陈毅能和他一起办好军事学院，共同为我党我军培养高级军政领导出力。因此多次动员陈毅出任军事学院政委，但陈毅实在太忙，他不但统率华东广大地区部队保卫内地和海防，还兼任着上海市长，无法再到军院任职。他向刘伯承表示，军事学院的一切工作，他将全力支持。后来也果然这样做了。在人力、物资各方面都给军院帮助。军区的各种活动，都通知军院参加。军院的学员常到军区听陈毅的政治报告，军区干部也常到军院听刘伯承的军事报告。

军事学院成立后政委一直空着，刘伯承在等待陈毅，直到1951年2月，陈毅来不成了，中央军委才宣布刘伯承兼任军事学院政委。

陈毅赠录音机帮刘伯承“补角”

陈毅和以往一样，随时从各方面关心着刘伯承。有一次，陈毅在上海专门买了一台从法国进口的钢丝录音机送给刘伯承学俄语。刘伯承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从没间断过俄语学习，战争年代那么紧张繁忙，他还每天清晨读俄语，抓紧一切空隙，翻译苏联军事理论书籍，下发部队，供指挥员学习现代化战争。他的俄文，文法水平较深，但发音不太好，军事学院成立后，还请了俄文教员教读，继续教研。陈毅对刘伯承的一切都非常了解，所以特地送了一台进口录音机供刘学习用，在当时，这种钢丝录音机已经算是最好的工具了。录音带的前面，陈毅还讲了一段话，鼓励老战友，其中一句有风趣的是：“这台录音机，可以帮助你这个‘三角板’学好俄语。”意思是，俄文

水平如一个四方块，而刘就缺发音、会话“一个角”。刘伯承的秘书李佳珍专程到上海取回录音机，还给刘伯承录下了苏联专家讲授的《联共（布）党史》课的结束语部份，供刘学习语音。

在南京时，陈毅知道刘伯承还是除了工作学习不爱文娱活动的老习惯，就想设法让他休息。常常劝刘伯承说：“你眼睛不好，年纪也大了，不要这么拼命，出去玩玩可以延续生命，为党多干些年。”经常邀他到江南名城作短期旅游，苏州、无锡、镇江都去玩过。刘伯承笑着对秘书说：“陈老总总是钓鱼的，每次来钓我都上钩，把我钓走，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军事学院重大活动，陈毅也参加。1951年夏天，刘伯承领导军院在安徽凤阳县临淮关，组织了一次江河进攻战斗实兵演习，陈毅和他一起审定了演习作战方案，并参加了演习的全过程。

到了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克服思想和工作中缺点的“反教条主义”，搞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刘伯承元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领导的南京军事学院，被说成自成立以来就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刘伯承同志逝世后，写过一篇《悼伯承》的文章。其中提到：“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一只左眼、视力也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

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但在1958年那次林彪跳得最积极的军委扩大会上，却要正在外地生病的刘伯承赴京出席会议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刘伯承不得不到北京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他在来京的火车上一夜未能成眠，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主席曾关注地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查，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今年已8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而和刘伯承感情深厚，对党内斗争有丰富经验的陈毅，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却敢于“开顶风船”，他亲自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极力安慰战友，要他宽心治病，不要把自己搞垮了。刘伯承谈到一定要虚心接受批评，还要写检查。陈毅对这次会议的开法本来就有意见，看到刘伯承都这个样子了还要写检查，更来火，说道：“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在有人想趁此时机，对刘帅落井下石的境况下，老战友道出如此深情的肺腑之言，多么令人感动啊！

但严于责己的刘伯承，还是坚持要出席大会发言作检查。

7月10日这天，怀仁堂会场的气氛十分严肃沉重，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主席台。当刘伯承元帅由两人搀扶着，刚刚出现在主席台深处时，全场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持续达半分钟之久，这不像是将要听一个“有错误”的人作检讨，倒像是欢迎胜利归来的英雄。许多人

一面鼓掌一面淌着滚滚热泪。这动人的场面，表达了在场的将军们，对戎马数十年，舍生忘死，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战疆场的刘伯承元帅的无限敬爱与崇敬，也是对这次会议错误倾向的无言抗议。在主席台上的陈毅，更为老战友如此深受同志们的敬爱而激动欣慰。

当意志坚强的刘伯承，发出与他虚弱的身体毫不相称的宏亮声音宣读发言稿时，人们早已谅解了一切，发言结束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欢送敬爱的刘伯承元帅离开会场。许多年后，当人们谈到此番情景时，仍感慨不已。

刘伯承想拉住战友热情的双手

十年动乱期间，陈毅受到许多折磨，他仍然一如既往，坚强地挺住，不停地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斗争。刘伯承后来已双目失明，陈毅对战友的健康很关心、惋惜，但看到四周险恶的环境，有时反而安慰老战友说：“你这样也好，眼不见心不烦！”这听起来似戏谑的话多么沉痛啊！

1969年，林彪以“战略疏散”为名，将在京的朱德、董必武、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统统赶离北京。陈毅被下放到石家庄一个工厂里锻炼，厂里条件有限，陈毅经常腹痛查不出病因。后经总理批准回京治病时病痛加剧，送进301医院当阑尾炎开刀，打开腹腔后，才发现是直肠癌，而且已经转移。治疗过程中又受到林彪集团干扰，延误，致使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的陈毅元帅，终于在1972年11月4日离开了人世。

他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林彪出逃摔死后，中央召集的一次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

那次会上，陈毅义愤填膺地对林彪在红军初创时期的真实面目，作了全面的揭发，将多年来被篡改的党史、军史作了权威的更正。为了保存这一珍贵史料，会后请陈毅校定讲话记录。陈毅病重无法阅稿，竟用了一个上午重新口述录音，长时间讲话，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谈完后，一股鲜血从鼻腔流出，这是英雄陈毅，竭尽生命之力所做的最后一次冲击，自此卧床不起，直到逝世。他临终前，给亲人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重病在身、双脚浮肿，久已不出门的毛泽东主席，决然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比陈毅大9岁的刘伯承，没有想到战友竟先自己而去。

刘帅已双目失明，他一定要去向陈毅的遗体告别。开到灵堂外的汽车刚刚停下，刘伯承一出车门，就老泪纵横，大声呼唤：“陈老总，你在哪里，陈老总你在哪里？”

由两个人搀扶着，他颤巍巍地向前走，两手伸向前面，就像往常一样想要去拉陈毅热情的双手。

可是静静地仰卧着的陈毅，已再也听不见战友的声音，再也不能用爽朗的笑声来迎接亲密的战友了。

刘伯承来到陈毅遗体旁，流着眼泪，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几次抚摸陈毅的身体，向几十年来，在雷鸣电闪，枪林弹雨中，同生共死，知心、知己的战友，作最后的道别。从他那双已失明的眼睛中，流淌着的痛苦的眼泪，代替了深沉的千言万语。

在场的陈帅的亲人、战友、部属，为这从未见过的动人场面，流泪、

饮泣，有的人忍不住放声恸哭起来。

这悲壮的最后一幕，展现了比山高、比海深的两位中国元帅的生死情谊，它必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灵中。

“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盛海伦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

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

但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要迫害老同志，特别要迫害陈毅，张春桥十分起劲，他一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重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张春桥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各区县局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都挤满了人。张春桥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

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想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

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 1953 年至 1966 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1969 年 3 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王洪文拎到北京去。

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闹剧开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头部两边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

等到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徐景贤便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但是，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徐景贤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

这时，王洪文把小册子接过去，对陈毅说：“今天，我们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接过小册子说：“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会议主持人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洪文，接着，代表们一个个发言，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足足两个多小时，这场闹剧才暂告结束。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他们还是想体会一下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狂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

代表们讲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们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多少有些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当了九年的上海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判。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自从上了井冈山，四十多年来，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已不耐烦，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和徐景贤咬耳朵，决定由徐景贤捡起当年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发生争论这件党史、军史有定评的陈芝麻、烂谷子，攻击陈毅所谓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当时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对党史、军史毫无所知，听了徐景贤拿出这样的“材料”来煽动，只有一个劲起哄的份儿。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无言地坐在座位上，显然，刚才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是的，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做过结论。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1968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竟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的青年后生面前。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王洪文眼看代表们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就趁势收篷，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们等了十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

他字斟句酌地对他们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等再整陈毅的阴谋没有得逞。

由于毛泽东的安排，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24日举行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陈毅出访途中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

宫达非

1965年9月14日到9月2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应邀访问了西亚非洲六国。

外交部的同志们，不管是当面或是背后，对陈毅同志都不称他外长，也不称他副总理，而是称他“陈总”或是称他“老总”。

陈总当时毕竟是60多岁了，在外事场合你总是看到他谈笑风生洒脱自如，一切问题不论是国内国外的，都胸有成竹对答如流，这固然由于他平时博览好学、贯通中西，但是对陈总的“台下功”，只有他的秘书杜易和他的妻子张茜知道得最清楚。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准备。如果出国访问，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的泪水是复杂的，是长期征战中生死与共别情离意的难以自禁？还是对老总花甲之年他洲异国风尘远别的挂念？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到周总理办公室去，要求总理减少陈总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有一次我们向总理请示工作，总理把这件事对宦乡和我讲了，要我们在国外对陈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

启程前一天，陪同陈总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周总理打破常规亲自作了动员讲话。他除了说明此行任务外，还很有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如何关心陈总健康的事简谈了一遍，总理最后以同情加勉励的口气说，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怎么在外交战线上，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总理又说，这也难免，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他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又说，这个思想工作，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

陈总讲话除说明此行任务的重要性之外，还很风趣地说，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张茜为我瞎操心。说罢，哈哈大笑，逗得大家心情一松，会意地报以同情。

1965年9月14日，专机离国西飞。

空中小姐送上各种饮料和小吃，接着又送上一道大菜是葱烧海参。为

活跃机舱中沉闷的气氛，陈总举杯大声说，请大家干一杯，我们现在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在天空中喝茅台，吃海鲜，神仙也未必真能够有这样的逍遥游吧。

陈总把话题一转说，我把出访工作总结了五个大字，“飞、跑、吃、喝、说”。出国访问，日程紧排，下了飞机上汽车，下了汽车又会谈，会谈完了又是宴会，宴会完了又是参观，马不停蹄，真是太紧张了。他把“飞跑吃喝说”风趣地解说一番，又开玩笑地说，请各位同志兄弟回国后在总理面前替我说个人情，不要再叫我当这个外交部长了，我辞职后，在北京开一个四川饭馆子，那时我请诸位吃地道的四川菜。陈总这一番话使气氛活跃起来了。

饭后，陈总邀我同他下围棋，我说不会下，他看了我一阵子，大声说：“你这个宫达非，连围棋都不会下啊，文化水平太低了。”我把他的秘书杜易拉了过来，两人对弈起来。后来我问杜易，他说刚来做秘书时也不会下棋，老总最初让他十来个子弟教边下，后来不让子弟也可对付一阵子，但总是输的时候多。老总平时除去工作，读书、写诗、下围棋便是他的娱乐了。

9月17日0时，科纳克里机场灯火通明，杜尔总统亲自到机场为中国外长送行，即使对友好国家这也是一种少有的特殊荣誉。杜尔总统陪同陈总检阅仪仗队之后，在舷梯旁拥抱、握手、告别。我们这些陪同人员登机就座之后，都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要飞往亚洲了，然后就可以返回祖国了。慢慢地随着飞机轰鸣的节奏，同志们都进入梦乡了，老总也真的需要闭闭眼睛休息一下了，只有机组的全体同志，在紧张地聚精会神地工作。

经过长达7小时的飞行，专机在飞近阿尔及尔机场前半小时，空中小姐把大家叫醒了，送上饮料，要大家恢复精神做下飞机的准备。往机窗外看，只见厚厚的云层，把飞机紧紧地包住。天地茫茫，难分上下，凭我们经常乘飞机习惯的感觉来判断，专机已在向下降落，可是忽然又爬高升起，第一次降落失败了。专机在天空转了几圈，又进行第二次降落，又不成功。正当专机着陆不成向上升高时，突然一架飞机轰隆长啸，在我们的左侧方向擦翼而过。我的心情本来已经很紧张了，看到这一情况，更吓得有些惊慌难抑。

我们都知道飞机失事，大都是在下降时发生的。这时我双手的汗水，不觉渗然而出，但是坐在陈总旁边，仍然极力装作镇静。这时，只见机长张瑞霭同志走到陈总面前报告说，专机已降落了两次，离地面80米都难看到跑道，备降机场也是大雾迷漫，拒绝接收，请示陈总如何处理。这时有几个同志也走过来，同样也有些紧张，站在陈总周围，等待他能出什么好主意了。只见他慢吞吞若无其事的样子，看了看机长，然后说，“一切都由机长做主，我现在也是你的兵，听你指挥，如何安全着陆，你机长自然有办法，不必来问我嘛。”机长听完陈总的话，急忙返回驾驶舱去。陈总环视一下周围的同志说，你们哪个敢来与我下棋？没人前来，只有杜易拿着棋盘走过去。陈总又大声说，让小姐拿早餐来吃嘛。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缓和大家的紧张心情的。

宋朝大文学家苏洵论为将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而今天则是飞机将坠于地面泰然无事。我暗想自己，已经惊慌得手出冷汗，在陈总——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面前，我是多么渺小。这时，专机已转回头去平稳地向南方沙漠中飞去。约50分钟，在一个沙漠中的小机场平安地降落着陆了，不仅汽油已尽而且跑道也已到了尽头。原来专机抵阿首都前一个小时，机长观察地面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十分简陋的小机场，这个地方叫拉格瓦特。

同志们下了飞机，额手称庆，有如获重生之感。

地方长官听到这一消息，急忙赶到机场来迎接，他见到陈总说：“我接到报告说，加纳来了一位元帅。我知道加纳并没有元帅，一定是前几天来我国访问的中国元帅又回来了，果然我说对了，他们把 CHINA 说成了 CHANA。”这位地方长官非常热情，把我们接到宾馆后，杀牛宰羊，丰盛款待，不住地说：“中国元帅自天而降是真主的恩赐。”陈总风趣地对大家说，陪同我出国访问，到处都有真主保佑，不然的话你们能在这沙漠绿洲里，享受这样美酒、羔羊的高级宴席吗？也要感谢机组的同志们，把我们送到这被称之为沙漠天堂的“伊甸园”来，你们应该立功受奖。

下午 2 时，阿政府派专机由礼宾司长陪同曾涛大使前来迎接陈总，空军又派机运来汽油，专机下午 4 时，安抵阿尔及尔。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终于平安度过。回头一想灾难与安全的分界，也就在毫忽之间。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陈毅当年回故乡

胡兴模

1959年11月，正是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办得热火的时候，陈毅同志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阔别36年的家乡四川乐至县视察。

劳动桥

陈毅同志的家在一个古老的小镇，小镇紧依着一条小河。人们为了能够过河，在小镇东端的河滩上，竖起了一排“跳墩”。可是，每当洪水季节，或者“跳墩”有倒塌，人们往来就非常困难。1923年春天，陈毅同志留法勤工俭学返乡，一次，他见一个小学生过“跳墩”时不小心摔到河里，便奋不顾身跳下河去救起那小孩。为此，陈毅同志曾向当时的地方政府提出修桥的建议。镇上的几个头面人物也动了心，发起募捐，筹集了一些银子。谁知后来，这笔款项全肥了少数人的私囊。对此，陈毅同志十分愤慨。

陈毅同志这次回乡，公社修起了公路，又正值一座横跨小河的石桥建成。家乡人民为了表达对陈毅同志的敬仰和爱戴，纷纷建议把这座石桥取名“将军桥”或“元帅桥”。

陈毅同志知道此事后，便马上反对说：“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党纪更不容许。”

我陈毅也算不了老几嘛！”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建这座石桥，是过去几十年没办到的事，今天由你们建起了。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啊！那就是，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是劳动的双手创造了世界，改造了世界。我们还要用劳动的双手去建设共产主义哩！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好不好？”乡亲们听罢，噙着热泪，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今天，凡去参观陈毅旧居的人们，多要去劳动桥观光和留影。这座普通的石桥，已成为人们学习陈毅同志不居功、不骄傲、谦虚谨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活教材。

《乡情吟》

陈毅同志的家乡地处川北，是一个土质瘦薄、石骨嶙峋的丘陵地区。他回乡时，正碰上大刮“三高五风”。因为浮夸，这个落后的小县竟成了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面红旗。因此，当时去乐至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离县城五华里的仙鹤公社境内，有一个较大的石骨山坡，叫碉堡坡（当时称为高产“卫星坡”）。坡高四五百米，坡上多是晒席般大小的石骨斜土地。可是，这里却修了一条约两公里长的盘山机耕道，拖拉机可以直开到山顶。这拖拉机上山的“壮举”，便成了建设山区的“表率”，凡来乐至参观的，都要到此学习。陈毅同志此番回乡，县里领导当然要请他去观光。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暖暖的太阳在鳞鳞云片间缓缓穿行，带着寒气的北风刮着。

公路两旁，红旗招展，锣鼓声不绝于耳。一排排赤着臂膀的青年正在深翻土地，一队队送肥的姑娘挑着沉重的担子在穿行。啊，这就是高产地里的“大兵团作战”。陈毅同志看着这一切，沉思着，苦笑着，不时地摇摇头。

陈毅同志来到“卫星坡”下，他不叫小车开上山去，走下车来，拄着黑漆拐杖，健步攀登。随行的人们，也纷纷下了车。

陈毅同志问：“这个坡，过去种什么？”

一个干部回答：“原来可耕地少，种小麦、包谷，产量很低。”

“现在呢？”

“现在靠公社的力量，荒坡换新颜。今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501斤，这高产地区已过千斤关了。”

陈毅同志幽默地叹道：“啊，不简单啊不简单，荒坡过了千斤关。”

来到山上，陈毅同志时而眺望远方，时而瞧着近处，很少说话。人们以为他要作诗，正在构思。有人便凑趣地提议说：“陈老总，你多年不回乡，家乡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妨吟首诗，述述乡情吧！”

提起作诗，陈毅同志的诗兴可真来了。他笑了笑，点点头，爽快地说：“嘿！你们的兴致倒不错。要我作诗，可以的。但我们得先算一道数学题。”接着，他严肃地说：“高产地区占不到整个公社土地的五分之一吧！你们把全部人力、物力集中在高产地区搞‘大兵团作战’。荒掉了五分之四的土地，这真能增产吗？假如一亩产500斤，五亩就该产2500斤。一亩高产地区能产2500斤吗？你们为了争红旗，就只有吹牛、说谎。是不是？”陈毅同志越说越激动，停了停，继续说道：“同志们，这样搞法要不得啊！危险啊！常言说，吹牛不犯死罪，可是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吹牛，那是要害死人的。”他用拐杖指着脚下的坡地说：“这个坡，要是建成桑园就好了，因地制宜嘛！”

“何需花那么大的力气修公路。”

人们听着陈老总的谈话都沉默了。过了一会，陈毅同志大声笑了起来，说道：“你们不是要我作诗吗？好，我就来谄上几句，赠给诸君。”随即，便一句一句朗诵起来：

今日话乡情，情真意更诚。

好大喜功事，万代招骂名。

在场的人听了，有的惊叹，有的称好，有的愕然。

陈毅同志的这首《乡情吟》，表达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诚挚心情，实事求是的精神风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可惜，由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首诗未能为广大群众所知晓。

永世珍藏的钱封

陈毅同志有一位同龄表弟，叫唐联升。他家至今珍藏着一个红纸钱封。30多年了，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要动用那纸封里的20元钱，这是因为，它牵系着一件难忘的往事。

唐联升同陈毅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很要好，但是，自从陈毅同志于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以后，二人就很少联系了。1959年11月，陈毅同志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按照家乡风俗，给各家亲友都准备了一份用红纸封着的糖果费。几天过去，他和老家的几十位亲友见了面，唯独没见到表弟唐联升，只听说唐联升外出未归。

陈毅同志离开乐至到达成都后，又向弟弟陈季让（当时任乐至县副县长）提起没有见到表弟唐联升的事，陈季让这才把实情告诉他：“唐联升不仅在家没外出，还被人看守着哩！他是个地主分子，干部们研究，不能让他跟你副总理见面。”

陈毅同志听了非常生气。“唉，真没想到，你们硬是‘左’得出奇。我可以同帝国主义分子见面，可以同战争贩子见面，却不可以同一个地主分子见面，而且他还是我表弟！再说，我做了多年统战工作，如果连亲友的统战工作都做不好，还能做好全国、全世界的统战工作？”他停了停，又说：“其实，我们提出改造地主分子，也绝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只是强迫他们干笨重的体力劳动，主要是改造思想。他们当中有文化知识的，有一技之长的，要大胆使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如果他们为人民做出贡献，人民是会欢迎他们的。”

和弟弟分别时，陈毅同志诚挚地说：“叫唐联升来北京，我在北京见他。”并叫他把那个未送出去的红纸钱封转交给唐联升。不久，唐联升接到了陈毅同志赠送的钱封和上北京的邀请，使他受到莫大的鼓舞。从此，这个红纸钱封便成了唐联升家的传家宝，也成了当地干部学习陈毅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份珍贵的教材。

点戏

陈毅同志一行回到成都，省里领导知道陈毅同志喜爱川剧，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川剧晚会。

陈毅同志得知非常高兴，说：“我30多年没回故里了，可乡音未改，乡情倍增，能看到家乡戏是我的眼福啊！我早年在乡，就是个川戏迷哩！”

省里一位领导就热忱地请陈毅同志“点戏”。他笑道：“客听主安排吧！我对川剧界的情况了解不多。阵容情况、演出情况知道得更少。戏要没‘点’好，就出难题了。

给演员自由，他们自有拿手好戏的。”

晚饭后，陈毅同志一行早早去了锦江剧场。演员们对陈毅同志十分崇敬，有的一年前出国演出在京期间还去他家作过客，他们是老朋友了。大家蜂拥而至，同他亲切地摆起“龙门阵”来。

猛然间，剧院负责人跑来向陈毅同志索取“戏单”了。陈毅同志推辞一阵后，便从怀中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来。顿时，大家欣喜地注视着，都想知道陈老总“点”的是什么戏。

剧院负责人很风趣，他接过“戏单”并不急着打开，神秘地笑了笑，言道：“陈老总，我想猜猜，你‘点’的戏，很可能在我们准备的节目之中

呢！”

陈毅同志听了大吃一惊，忙问：“那你说说，我‘点’的是哪两折戏？”

“你家姑奶奶的戏呗！《秋江》，还有《思凡》。”剧院负责人胸有成竹地大声说着，随即打开纸叠一看，不出所料，陈毅同志“点”的正是这两折戏！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陈毅同志惊愕了。这位运筹帷幄多年的元帅，今天被川剧界的朋友给“算”着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写“戏单”时旁无一人啊！

原来，这事还得从10年前说起。那是1949年12月，陈毅同志参与指挥的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的一个晚上，陈毅同志在前沿阵地观看战地文工团的演出。

节目有京戏、黄梅戏、秧歌剧和歌舞。陈毅同志看后感叹道：“今晚的演出很好，但总觉不过瘾。要有一出川剧就好了。”

文工团的同志问他：“陈老总，你喜欢川剧中的哪些剧目？”

他笑着说：“川剧中的优秀剧目很多。不过，我倒特别喜欢我家姑奶奶的戏呢！”

“你家姑奶奶的戏，是什么戏？”在场的人都惊奇地问。

陈毅同志放声大笑道：“就是《陈姑赶潘》，也叫《秋江》。所谓陈姑，顾名思义，当然是我们陈家的姑奶奶罗！”他感慨地说，“这折戏写的是一个尼姑渴望自由，渴望解放的事。剧中人不多，一老一少，有说有笑，有唱有舞，趣味横生。川剧中另一出戏《思凡》也很好，也写的是一个尼姑向往自由的事。在封建社会里她们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今天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正是为了实现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愿望，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呢！也正是为了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的彻底解放啊！”

谁知，陈毅同志当年的这番即兴谈话，竟传到了川剧界。那天，剧院负责人就是按照这桩铁闻，特地安排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竞华、周企何等来担任演出《秋江》和《思凡》的。

陈毅的最后一次家宴

铁竹伟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京西宾馆西门警戒线是细细的一条白杠，却像南天门，隔开了两重天。

各省造反派把大字标语刷满宾馆对面的墙壁、马路、房顶。

整个白天，到宾馆四周示威的队伍接踵而至。上海的走了，福建的来了；安徽的走了，江苏的来了。

笔者曾经访问过当年参加了这次工作会议的陈丕显、江渭清、李荷华、张劲夫、姬鹏飞、李雪峰等老同志。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江渭清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

“八月份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会场里的气氛还比较融洽，毛主席坐在台上讲话，台下坐着的同志也时常插话，场内有时还漾起一阵笑声。

“到十月工作会议，这种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

志，已被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当作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心情压抑的程度更是难以名状！

“正在这里，接到陈总秘书的通知：陈总今晚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我竟像孩子盼过年似地盼起天黑来了，看得出，一同去的陈丕显夫妇、叶飞、李葆华、魏文伯、谭启龙等同志，都有同样迫切的心情。吃饭是小事，能到老首长面前谈谈心，出出气才是真的。整个会议期间，虽说与陈老总天天都见面，碍着人多眼杂，只有碰面点点头的机会呀！”

天近傍晚，两辆拉严窗帘的“大红旗”开出了京西宾馆，出门不远，便避开宽敞的大道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狭窄的僻静的小胡同里东拐西弯，时而停车躲让自行车，时而缓慢艰难地转急弯，足足绕了半个钟头，汽车方才切入府右街，呼啸驶入中南海西门。

这时，司机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陈毅站在院门口，带着深沉凝重的微笑，与每一位客人握手。张茜拉着谢志诚（陈丕显的夫人）的手，一边往里让，一边歉意地说：“老总请你们来，也没提前打招呼，匆忙中，只备了几样家常菜，请大家多原谅哟！”

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未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临时决定。

施师傅今天中午才知道请客之事，但因都是熟客，口味喜好他有数，只半天工夫，他便像变魔术一样，煎、炒、烹、炸、摆上一桌菜。桌子正中放着两瓶茅台，一瓶长白山红葡萄酒。

大伙亲切随便地鱼贯入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上一杯，最后把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向众位说：“今天我们喝茅台，都敞开酒量喝个痛快！”能喝的开怀畅饮，不行的也品尝几口。我也不敬酒，剩下来的，请大师傅喝光。干！”

没有吃菜，也没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顿了顿又说：“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满座为之一惊。

张茜猛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突然像狂暴的雄狮，冲着张茜怒吼了一句。

大家又一次受到震动：当着客人的面，陈毅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横蛮。如果性情倔强的女主人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会不欢而散。根据以往经验，这完全可能。

也怪，张茜意外的平静，她只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转而笑着招呼大家：“别停筷子，多吃菜呀！空腹喝酒会伤身体的！”说着，拿着酒瓶为每一位客人斟酒，然后又给身边的丈夫加了半杯，温存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嗯。”陈毅顺从地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得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张茜个性强，她“管教”陈毅时的厉害劲儿，在座的有几位是亲眼目睹过的。当时曾觉得她太不给面子，可是今天突然觉得那才是张茜，而眼前这位逆来顺受的女人则显得陌生。

一次，会议开完，已近中午，周恩来总理掏钱，留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派人打电话，把张茜、薛明也请来作客。周恩来还特地买来一瓶茅台酒。酒过数巡，脸色红润、汗珠满面的陈毅，突然以极度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包括羞红脸的张茜，也无可奈何地笑了！

后来，每逢周恩来向身边同志讲到这段故事，总忍不住放声大笑。

张茜给身边的谢志诚夹了块白块鸡，又夹块，似乎想往陈丕显碟里送，略一思索，放在陈毅碗里。转而夹起一块酱鸭送到陈丕显面前，关切地问：“陈书记的身体怎么样？”

“是呀，”陈毅接过话题，对陈丕显说：你命很长啊！得这个病还在！”

陈丕显1966年初鼻腔突然出血，检查后确诊是鼻咽癌。因为治疗及时、得法，如今已渐好转。与他相同病症的另位副军长、由外国专家治疗，病情很快恶化，半年就病逝了。

“最近还好。”陈丕显微笑着回答“多亏周总理派去了北京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

他完全依据我的病情变化，镭放射治疗时专门为我开‘小灶’，否则，10个陈丕显也完了！吴院长对我说，如若癌症病人能及时得到‘小灶’治疗，而不是完全依据书本吃‘大灶’，绝大多数患者都是有可能治愈的。前两天，我去吴院长家看望，唉，老人就因为他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都不准他看了。”

恐怕在座的书记中，只有陈丕显一人还能自由地在北京大街上走走。因为上半年，直至会议之前，他都在养病，有幸避免了“资反路线”的“错误”。上海目前正集中攻击曹荻秋、魏文伯。魏文伯坐在席间喝着闷酒，看得出日子不好过。

“阿丕！”陈毅突然以责备的口吻说，“你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常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你问她！”陈丕显向夫人一指。

“老总，叶群亲自打的电话，正巧是我接的。”谢志诚说，“叶群在电话里说：‘陈书记能不能来开会？中央怕他跟不上呀，能不能来呀？可以带医生、护士来京，再说，北京也有名医。’哎，说是商量，比下命令还严肃，老陈能不来吗？”

“哼！”陈毅脸上堆起怒容。

“是呀，”陈丕显接着说，“昨天，江青请我去吃饭，她说呀，看样子魏文伯不行了，造反派对曹荻秋也不满意，我希望你出来。我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助曹荻秋，他还是主管工作，我做些调查研究。’江青火了：‘你何必躲在幕后？！大胆出来干嘛！’

我和春桥作你的顾问’。我说，‘哎哟，你们两位作顾问太大了，我主要还是身体吃不消’。谈话不欢而散。谁想出门就碰上戚本禹，他主动上门来拉拉我的手说：‘身体怎么样？’我还是说吃不消。戚本禹两眼一瞪，凶声恶气地说：‘那不行！第一书记都要杀上第一线！’”

“陈老总！”江渭清憋不住了，“我从运动开始到今天，始终没想通过，我对这场运动确实有抵触！”

“我记得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你向主席提过：再不能搞这样大的运动了（指大跃进），我们受不起折腾了！”

“当时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对，今后要慎重。现在怎么又……唉！搞大运动，一窝蜂，根本不能实事求是嘛！都是先有框框，先有结论：‘走资派’！扣上顶高帽子再找材料。”

“不算战争年代，我在江苏工作 17 年了。17 年间，我就撤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他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的粮食他不要，全县饿死 4 万人。现在可好！从省到地市委，到县委，‘洪洞县里没有一个人好’了，我保不了他们，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了！这样搞法，怎么行嘛！叫我怎么理解，怎么得力嘛！”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江渭清眼圈潮润，声音也有些嘶哑了。为了镇定情绪，他往嘴里塞了支烟，发颤的手，划一根火柴，断了；再划一根，又断了；划到第三根，才把烟点燃。

陈毅早已注意到，一向爽朗潇洒的叶飞今天几乎没开口。陈毅心里一阵痛楚，这是一员虎将啊！黄桥决战，他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建立了特殊功勋；解放以后，他在福建担任第一书记，为争取祖国早日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今天竟被轮番批斗，而且是中央文革直接授意的！“罪状”是叶飞本人是华侨；国外反动报纸对他有“邀请前往自由世界，共操反共大业”的文章。真是岂有此理！

李葆华还是中学生时，陈毅去他父亲李大钊那里请示工作时就认识了他。60 年代初期，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到饿死人最多的安徽省担任第一书记。他走遍了安徽农村，及时大胆地采取了“三自一包”的措施，基本安定了全省的局面，至今皖北农村还有“李青天”的尊称。现在却被造反派视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难道非要老百姓都去逃荒、要饭、等国家救济，这才是社会主义？！

为人耿直正派的江华是被用担架抬上飞机，来北京开会的。他重病在身，原本魁梧的身体，如今骨瘦如柴。就这样，造反派依然在病房里批斗他。是总理催促他立即返沪住院，并以办公厅正式文件通知造反派，不准干扰江华的治疗。然而，造反派能令行禁止吗？陈毅十分担心。

还有曹荻秋、魏文伯、谭启龙，他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老党员了，怎么能统统往死里整呢？

陈毅思前想后，百感交集。见大家也无心吃饭，便端起酒杯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

这些道理并不深奥，在座的诸位也都会说。但是，话从陈毅嘴里说出，就像当年听到他的战斗命令一样，一种坚定的、必胜的、甚至是神圣的信念油然而生。大家屏住气，认真聆听老首长的临别赠言。

陈毅顿住了，他看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词句。忽然，他抬起头，深邃的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彩，以浑厚的四川乡音说道：“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

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

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说最后一句话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字字斩钉截铁。

大家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尽管在座诸位对“文革”都有一肚子怨气，尽管他们对“文革”小组里那几个刀笔文人异常反感，尽管他们认为运动这样搞下去不行，但是，还没有一个怀疑到副统帅的居心！他此时红得发紫，已是毛主席身边唯一的副主席，不言而喻的“可靠的”接班人呐！

可是，陈毅不点名骂的正是他，这又是不容置疑的。

陈毅不再深谈。他虽然已经看透时局，看穿了一些人的嘴脸，但仍没忘记党的纪律；他有预感，与在座老部下今后恐怕相见无缘了，不愿眼看着他们糊涂上当，故而设下家宴，点到为止。实实在在地只是点到为止，不再多言！一则不能言，再则也无须多言！

他相信这些历经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兵，会在今后的风风雨雨中明白他所指的一切！

陈毅拉开椅子，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举起。

陈毅深情地环视着这些曾经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的老部下，亲爱的好战友，他充满感情地说：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元帅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

大家挨个与陈毅碰过杯；一仰头，吞下了这杯烈酒。不管对元帅的指点是否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话是都铭记心中了。

恐怕领会最透彻的是叶飞。

当专机从北京起飞，依次降落在济南、合肥、南京机场时，他一反往日握手话别的习惯，像一位真正的华侨一样，以紧紧的拥抱为每一个老战友送行，并且在每个人耳边只留下三个字：

“永别了！”

“最后一次”，不幸而言中！

1966年10月中旬，参加过陈毅家宴的叶飞、陈丕显、李葆华、曹荻秋等人，下飞机之后便身陷囹圄，直到陈毅逝世，他们仍在监禁之中。他们只能望着报纸上带有黑框的陈毅遗像，望着元帅遗像上那安详、镇定、亲切、自信的笑容，老泪横流，泣不成声；只能在幽暗冰冷的牢房里，默默回忆老首长的临别赠言，回忆着诀别时悲壮的一幕！

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罗英才

1967年2月，北京中南海庆云堂四号院。陈毅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大红请帖，上书“恭请陈毅副总理出席批判驻外使领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等字样，落款是“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

在那动不动就“打倒”、“砸烂”的年月，“勒令”一位领导人出席这类批判会是司空见惯的，而使用如此恭敬的措词，则实属少见。

陈毅的秘书石国宝（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局长）拿着这张大红请帖却犯了难。

陈毅确实很忙，除了分管国务院外事口和外交部的工作，“文革”开始后中央指定他分管西北地区，日程每天排得满满的。1月2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检查”获得通过，成为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他自己知道，“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看见党的传统被破坏，党组织陷于瘫痪，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军队受冲击，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他常常禁不住要讲。

石国宝对这些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很有顾虑。说是批判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到时候谁知道会生出什么新花样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如实向陈毅报告了此事。

陈毅对这些归国留学生显然已有了解，对他们的举动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说到时是否出席他们召开的批判会，只是要秘书通知“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所有负责人来一次，他要同他们谈一次话。于是，安排了2月16日晚上这次重要的接见活动。

笔者就此访问了乔晓阳（当年受陈毅接见的归国留学生代表之一，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乔晓阳感情激动地回顾了这段经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由国家高教部派往古巴留学的，就读于古巴哈瓦那大学。1967年2月初，国内通知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随着这一潮流回到北京，今年21岁。回国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北航教室铺着稻草、被褥的地铺上，竟夜翻看同学送来的红卫兵小报，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时回国的留学生约500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华、北医、北航等高等院校，后集中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局（专家已撤离，空房很多）。

留学生中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进而组成了“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协调各战斗队的活动和统一行动。这是当时刚归国的留学生中一个松散的组织。

联络站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北京召开批判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其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已过，留学生们为了表明跟上“革命”的步伐，决定要补上这一课。

在讨论邀请陈毅出席批判大会的方式问题时却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同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依惯例通知他或勒令他出席；一种意见是，陈毅是人民景仰的元帅和老革命家，应用大红请帖向他发出邀请。

讨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压倒多数，被通过。我当时是举双手赞成

用大红请帖邀请陈毅的。

恰在此时，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访问中国。陈毅以主要精力投入外事工作。

2月15日，陈毅出席为欢迎毛里塔尼亚贵宾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随后与周恩来一起陪同这些贵宾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2月16日是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陈毅出席中国和毛里塔尼亚关于贸易、经济、文化等协定的签订仪式，并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就在这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老革命家为一方，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为另一方，爆发了一场剧烈斗争。从“文革”一开始，双方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待老干部的态度和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多次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天下午的怀仁堂碰头会，是双方斗争的高潮。会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不要党的领导、打击迫害老干部的可耻行为，指出“你们的目的是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当他气愤已极，拿起文件包，穿衣欲走之际，陈毅叫住他，激情地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并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李先念痛心、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

这次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重要会议，长时间秘而不宣。那天下午，陈毅的警卫秘书宫恒征陪着陈毅从庆云堂四号院家里步行到怀仁堂，散会后又一起步行回家。他见陈毅浓眉微蹙，怒气未消，试探着问了一声：“老总，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陈毅似乎在想心事，所答非所问地嘟噜一句：“快走，吃了晚饭还要赶到机场为外宾送行！”

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宫恒征说：“老总，送外宾回来怕很晚了，接见留学生的就改个期吧？”

“谁说改期？”陈毅说得斩钉截铁，“看着娃娃们犯错误，我陈毅睡得着觉吗？！”

2月16日晚上，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现国务院第四会议室）灯光如同白昼。20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作为500多名归国留学生的代表，围坐在罩着白台布的长条桌周围，等候陈毅的接见。长条桌边的小条桌旁坐了“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派来的三个人，桌上纸笔俱备，似负有速记任务。

主持人告诉大家：陈毅副总理因有外事活动，请大家稍候。同时发给每人一张小卡片，填写各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等情况。

9时许，陈毅在警卫秘书宫恒征陪同下步入会议室，边脱大衣边致歉说：“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随即在长条桌的一头坐下来，拿起一张张小卡片念着，和大家一一认识。

“哟，已经过9点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清了清嗓子说：我讲起话来，往往长得吓人，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过，我这个人也有个好处，讲民主。在座哪位瞌睡来了，就放心大胆地睡。哪位要行方便，会议室边上有卫生间，来去自由。我不会给他扣帽子、打棍子的！

肃静的会议室里有了轻微的笑声。

陈毅问了一下留学生们在国外的学习生活情况。被问到的人一一作了

回答。讲话随即转入正题：

同学们，你们从国外回来刚刚十来天，对国内情况不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一回事，究竟怎么个搞法，也弄不清楚。你们首当其冲应该做的事情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多调查研究。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年轻人不要光满足于轰轰烈烈。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要踏踏实实，不要轰轰烈烈。你们一回国就要开批判驻外使领馆资反路线这样的大会，不是满足于轰轰烈烈吗？可要谨慎从事呀！……

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干部问题。前一段是为革命小将说话的，现在要为干部说话了。《红旗》杂志马上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做《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中要引用毛主席《学习和时局》中提出的对于人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纠正对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我讲这些话，有些人不爱听，可这是真理。……

宫恒征用手碰碰陈毅，示意他把好嘴上的关，别“走火”。陈毅全然不为所动，继续说道：

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打倒、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前几天，先念同志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一问都戴过高帽子，大家相视而笑。这不是瞎胡闹吗？……

陈毅越讲越激动、越愤怒，语气越严肃：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宫恒征又向他递眼色，他置之不理，照样往下说：

现在把刘少奇的 100 条罪状贴到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 81 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看到一张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江西老俵，怎么是兄弟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呀！……

陈毅怒不可遏，从座位上站起，转到靠椅后面，双手撑着椅背，怒目圆睁，目光直射天花板。少顷，忽然发出雷霆般的怒吼：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

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话音戛然而止。整个会议室像突然凝固了，连外交部造反派埋头速记的人也僵坐着一动不动。陈毅对全场扫视了一眼，仍旧回到座位上，用两根指头敲敲脑袋说：

现在你们这里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头脑发热。说中国

是世界革命中心，自己以为了不起，好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

我们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同章文晋大使闹矛盾，继而发展到支持使馆的造反派造大使的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他怎么回去工作，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

话音未落，在旁速记的一个外交部的造反派倏地起立分辩：“陈老总，关于对×××同志的看法，我们和你有分歧！”

“你算了吧！”陈毅不容分说地猛一挥手，“我对他比你们了解，他是华东的干部，这个人历史上就投机！”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他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语气中不无责备的意味：

对于干部的缺点错误，可以揭发，可以批评，但反对乱斗，反对胡来。你们在座的这么多干部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现在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你们不心疼哪？！在座的还有工农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工农大众辛辛苦苦打天下，现在他们无辜地被冤枉，受委屈，你们也无动于衷罗？！……

陈毅还讲了历史，讲他在红军初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曾一度使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但实践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比自己高明，便心悦诚服地向毛主席作检讨，陪礼道歉，仍旧把毛主席请回前委领导岗位。还讲了中央苏区打 AB 团时捕风捉影、刑讯逼供的惨痛教训，冤死了很多人。他自己也被怀疑为 AB 团长，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得靠着边边走，差一点杀了头。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

毛主席很快回信支持他，不但使他幸免于难，还向他委以重任，把当时的军费和自己的手稿托他保管。他要大家牢记这些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伯恩斯坦、考茨基来修正他，有列宁、斯大林，就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来修正他，我们有毛主席，就没有人来修正他呀？……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

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话！

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毛主席就最能受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10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陈毅滔滔不绝地一气讲了七个小时。

散会时，已是2月17日凌晨4时许。留学生们似乎都有一种沉重的使命感，当他们离开中南海时，一个个神色庄重而严肃。

在长达七个小时的接见中，神经最紧张的要数警卫秘书宫恒征。他随时准备给陈毅某种暗示，提醒他别因说“过头话”而惹来麻烦，直到接见结束才松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承认，一开始就小视了这些留学生，以为他们肯定“左”得出奇，不知会找多少麻烦。

其实这些留学生是很守规矩的。他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接见。学生们显然被陈老总的讲话深深打动，气氛融洽，神情专注，整整七个小时没有一个人随便走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留学生代表们对陈毅的讲话，除个别人外，反响很好。乔晓阳说，听了陈老总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前些日子百思不解的事，此时豁然开朗。“文化大革命”会错吗？他以前想也不敢想。现在懂得了要学会用脑筋想问题，要不断提高分析判断能力。他觉得自己更加贴近陈老总了。他从陈老总的傲然正气，看到了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

通过接见增进了两代人之间的了解，加深了感情。出于爱护和保护陈毅的需要，留学生代表们相约不把陈毅讲话的内容向不可靠的人泄露。这些讲话的尖锐程度，随便摘取几段都可以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子弹，是林彪、“四人帮”迫害者一辈革命家所求之不得的。

但林彪、“四人帮”罗列的所谓“二月逆流”的“罪证”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不仅如此，现在流行的几种“文革史”、“文革资料”中，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事实说明，这些归国留学生代表们严守秘密的努力是有效的，也有力地说明了人心的向背。

陈毅讲了许多老干部想讲而没有讲的话，受到老干部的真心欢迎。有的留学生把陈毅的谈话向一些老干部悄悄作了转述。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原来失去生活勇气的，听了陈毅的讲话后重新振作起来，看见了希望之光。

陈毅关怀陆小曼

胡先锐

陆小曼（1903—1965）是徐志摩的遗孀，不但光彩照人，品貌超群，而且能歌善舞，书画俱精。胡适夸赞她：到北京不见小曼，等于没到北京。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遇难，他和陆小曼没有子嗣。解放后陆小曼单身一人十分孤寂，蜚居上海斗室，过着由奢入俭的未亡人贫困生活。

1950年秋，上海市举办第一届书画展，街道居委会鼓励陆小曼送几幅作品去试试，竟被选中两幅。开幕之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应邀参观，陈毅在陆小曼作品前驻足凝视良久，连称好画。再一看作者是陆小曼，他对陪同人员说：“此人当年有‘南有唐瑛、北有陆小曼’之称。”随后又告诉张茜：“过去我在上海中法大学读书时，多次听徐志摩老师讲课，依辈分

而论，这陆小曼还是我师母呢！”

事隔不久，陆小曼被吸收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并领到一张华东医院免费就诊卡。1956年上海画院成立，陆小曼被该院聘为画师。她的工资由参事室发放，使她晚年生活无虞。1965年陆小曼病逝，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陈毅关怀陆小曼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新闻媒介传到海外，成为美谈。胡适感慨地说：“有人说共产党无人情味，我不敢苟同，陈毅这人，人情味就很浓。”

陈毅与赖月明的战地姻缘

刘水耕

北京，1988年9月25日下午。

久卧病榻，已经丧失正常说话能力的前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接见了一位阔别数十年的老朋友。

“大姐……”这位来自赣南的农村妇女趋近床前，哽咽起来。

蔡畅挣扎着伸出双手，颤抖着，颤抖着。布满青筋、骨节突露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位与蔡畅相对而泣的她，就是陈毅早年的妻子——赖月明。

1989年初春，我们来到赣南拜访了这位74岁高龄的老人——当年的石城县委妇女部长赖月明。

此时，从外表看，她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昔日战火硝烟在她脸上刻镂的皱褶，蒙上了一层泥土尘埃。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她恬静地笑着，徐徐地把我们带入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

和陈毅第一次见面

1914年旧历7月，我出生在兴国白石村，乳名赖三娇。

我父亲赖来义是个私塾先生，靠教书勉强维持家庭生活。14岁那年，父亲把我卖给杰村圩一户姓谢的做童养媳。

第二年春天，红军开进了杰村圩。在村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红军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区妇女改善委员会。我终于脱离谢家，报名参加了区妇女改善委员会，后来担任改善委员会主任，那年我刚满17岁，更名赖月明。

我无忧无虑，没日没夜地泡在工作里。1932年4月，少共中央来通知，送我去瑞金师范学习培训。后又将我分配到少共江西省委。当时，少共省委驻扎在宁都北门的一条小街上。书记张绩之找我谈话，要我在少共省委儿童局工作。

不久，粤北南雄水口大捷，中央红军主力要垮了“围剿”的粤敌20个团。配合主力作战的江西红军回到宁都作短暂的休整。少共省委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慰问演出。

文艺队演出了不少节目，最后，由我与少共省委宣传部长李美群压尾，对唱兴国山歌，

我这个人没有哪般过人之处，对歌儿却天生有副好嗓子。起初，不敢抬头，也不敢放大嗓门。唱了几个，听得下边掌声呼啦啦山响，我的胆子便

壮了，扬起胸壳，脸孔红扑扑地发烧，台下前排的观众中有个宽脸膛的首长几次站起来，边拍掌边瞅着我，待掌声稀落，他便扭头扯着四川口音朝战士们喊：“喂，同志哥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嘛？！——”

战士们齐刷刷地直脖子叫：“好——”

“要得要得！再来一个——”那位首长蛮爽快地冲我招手。他身边的张绩之一个劲儿打手势。

我得了鼓励，十分高兴，一首接一首兴致勃勃地唱下去。

那晚，演出直到下半夜才停止，下了台，我问张绩之，那个逗趣儿喊话的首长是谁。

张书记说那是陈毅司令员呀。

我吓了一跳，吐着舌头暗暗庆幸，好家伙！好在未得罪这尊黑面菩萨。

这就是我和陈毅的第一次见面。

蔡畅作媒

第二日我便与陈毅直接交道了。

那是早饭过后，我和李美群拿着自制的板子拼拢两张饭桌打台球，过了一会，外面走进一伙人，当头的就是陈毅总指挥。

李美群叫了声陈司令员。陈毅便走了过来，在我身边抱着臂儿看了会，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打得不错嘛，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不理我呀？哈，我晓得了，江西老 biao 不好惹，江西嘛，山多水多田螺多，田螺妹子也多，山歌更多！……”

“四川佬，你什么意思？我是田螺妹子，你是什么？”我停了球，瞪着眼跟他赌气。

陈毅一愣接着嘴一咧哈哈笑了。他要过李美群的板子说：“小鬼头，莫发火嘛！来来，我们两个对对！目标——发球！——”

“哼！”我翘起嘴唇，啪的就是一个球过去。

陈毅连忙把球对过来，打了二盘，我都输了，我红着脸：“啪”地撂下板子，打着兴国土语说道：“不打啦，打这种鸭蛋儿算不得本事。”

一伙人都笑了。陈毅还捏着板儿愣在那儿，张绩之笑着过去把他拽入自己的办公室。

我和李美群躲到一边跳绳子玩，在窗下能听到屋子里的说话声。

张绩之笑着说：“陈指挥，你看看，这个赖月明不错么，你孤单单一个郎子，要不要我去说说，招个嫂子暖暖脚好不好？……”

“我说同志哥，岔了岔了，革命没有成功，打什么老婆的主意...”陈毅这么道。

“哎，不能这般说。说说我吧，也是革命里头找着个屋里人，我眼看就要做爸爸了，还不是一样的干革命！”张绩之反驳道。

“老张的话对，陈司令员，我看你的确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这是少共省委组织部长钟浩培的声音。

“哈哈！我说同志哥们你们可是推老牛下坎，是不是嘴馋想打我的地主？既然有这个意思，那好，你们去跟那个小鬼头说说……”

我气得跺脚，嘴里“呸”地一声。李美群掩嘴偷偷笑着，拿手在脸上比划着羞我。

我来了性子，抓起地上一块土坯，“砰——”往窗户里扔去。

我又气又急，扭头便跑，冲进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门，一头倒在

床上，嘴里叽哩咕噜地骂了一阵，躲了好一阵子。“扑嗤”一声，我笑了起来，心想人家只不过是取乐子罢了，生这个闲气又何苦？

不曾想，说客真的寻上门来了。

打头的是张绩之，后是钟浩培等人，他们轮番向我进攻。我真有些气疯了，叉着腰大叫：“莫捏着弯弯捣鬼啦，我不会嫁给他的。他是总指挥，我是个小鬼，平民百姓一个，嫁个当大官的，只有作婢为奴的份。……”

“月明，你个死脑壳，土里土气！总指挥看上了你，你就允了吧。我们可晓得哩，总指挥是个知冷知热的郎君，要是我，嫁着这么一个，心肝哥哥，还不知是哪辈子修下的福份呢。”李美群逮个空子，搂着我的肩头，贴着我的耳根劝导我。

这样一来，我好端端的心绪被搅乱，昏昏颠颠寻思开了：也许，大伙儿的话是有道理的，树大分杈女大出嫁，陈总指挥那聪明的人瞧上了我，把话挑明了，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呢？

真正使我改变态度，并且应允与陈毅结婚的，是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蔡畅来作媒。那时，我打心眼里敬重蔡畅大姐；大姐也很关心我，每逢开会她总喜欢拉我坐她身边。我非常钦佩大姐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所以，蔡畅大姐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蔡畅大姐对我说，“月明，你不要对他的阶级成份耿耿于怀，出身不由己的。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党组织绝对信任他，他既然拜托了我们，依我看，你就听大姐的，跟他结一对革命的夫妻吧。”

1932年旧历9月重阳佳节，我与陈毅正式结婚。

结婚前一天，他和几位红军干部乐呵呵地来看我，大家要他请客，陈毅嚷叫起来：“请客是应该，要我出钱拿不出来。问赖月明有钱没有。”结果，是我去向亲戚借了20块银元。在宁都南门街一个广东人开的小饭馆摆了八、九桌饭菜。

当晚，我和陈毅宿在省委院内。夜很深了，我们才上床。陈毅边脱鞋袜边道：“人常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大幸事也。月明呀，想不到我陈毅颠荡大半辈子，今晚真正做起了新郎官。”

他的话音刚落，我哇地哭了。

“月明，你这是怎么啦？”他贴近我问。

“我还小哩，才十八岁多一点，还是个黄花妹子哟……”我伏在被窝里抖着身子哭泣。

很久，我听陈毅叹了口气说：“那好，你休息吧，我回军区去睡。”说完，他果然下床往外走。

我扑上去抱住他：“不能走，陈毅哥哥！”“月明，我的妻！”陈毅说着跟角挂着激动的泪花。

第二日，陈毅便上前线去了。他给我留下一床毯子，一件棕色羊毛衫，临走，还摘下一块方盘金表硬是戴在我手上，说那是他留学时的一个朋友送的。

相逢竟是别离时

我们做了三个年头的夫妻，扳指头算日子，真正在一起不足几个月。

我们结婚之后的第二年。党组织选送我和张绩之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我回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将我分配到石城担任妇女部长。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队伍损失惨重，根据地被敌人

挤牙膏般一点点挤掉了。后来，接到上级指示，石城县委解散，我又回到了中央所在地瑞金。

中央办事处设在东街口的一个大祠堂内。毛泽覃和梁北台一前一后地走出来。我不认得梁北台，但跟毛泽覃相熟，因为他过去常找陈毅商量事情。这时，毛泽覃看见我忙站住了，说他们刚去看望了陈毅，陈毅的样子不好看，心情也不好，要我见着他不必吃惊。

“陈毅出了什么事？”我听出对方话中能毛泽覃为难地摆手，扯扯梁北台的袖子赶紧走开。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进去。

一名卫兵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我掀开竹编门帘，看见不大的房内摆着一张床，夏布蚊帐撩开，陈毅歪坐在床上。从床上床垂下一根绑带，把他一条裹满纱布的腿吊了起来，他的一条腿垫着书，正在认真批阅文件。

“陈毅，你……”我叫道。

陈毅“唔”了一声，登时抬起头，两道粗眉上下抖动，手儿一颤，铅笔尖咔嚓断了。

他惊喜地叫起来：“月明，是你！回来啦，好啊！唷，这可不好，你一定赶夜路了，你看雾把衣服都打湿了。快脱下来，换套干的，不要着凉了。”我走近了几步，一头伏在他身上，泪水滚了出来。

他的喉咙咕啾一声，说不出话来，伸出手掌在我背上抚弄着，过了许久才说“不要哭嘛，伤就伤着了，留点疤算什么？马克思不讲情面，次次不收我呐。嘿嘿，信不信呢？好好，听着，腿是上个月在兴国老营盘河边让白狗子打着的，如果告诉你，一定会哭鼻子的，怎么能够好好工作？！月明呵你在石城地方工作，我在前线打仗，夫妻彼此都思念嘛，陈毅也是人呐……”

我止住哭，低头要瞧他的伤口，他不同意。我只好坐着望着他。他也看着我。过了会，我吁了口气，把身子挨着他，扯下他一颗快掉的扣子，掏出针线钉上。

这样我，便守在陈毅身边整整呆了十天。

这段日子，陈毅虽然负了伤，却对我格外好。他不止一次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叫伙夫搞好送进来，逼着我当面吃掉。我觉察他有异样，问他又不回答。有几个中央首长来看他，和他商量问题，他都借机把我支开。

纸里包不住火。第七日我便清楚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从石城赶回瑞金，好不容易跟丈夫见了面，竟也是与他分离的时候。

他告诉我，敌人越来越近，红军主力马上就要撤退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组织上决定动员一批红军家属和一些伤病员留居地方坚持革命斗争。作为留下的红军家属，我便是其中一员。

他的话未完，我便搂着他失声痛哭。因为那时，战斗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不堪设想的结局像磨盘一般压在革命者的心上。这时，我深知战争的残酷性，这分离意味着什么。

我想起来就哭。几天中几次哭昏过去，又由迷糊中再次哭醒。

陈毅也哭了，陪着我流泪。我苦苦哀求他请求组织把我留在部队，我生是红军人，死也做个红军鬼。说着说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去。

“起来，月明同志，快起来！”陈毅气得喊了起来：“不行，说什么也不行的。你不能跟着我，更不能拖累组织。月明同志，你的老家在兴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回老家去，坚持革命斗争。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

是要无条件听从组织决定的。红军离开后，反动派一定会血洗苏区。你要坚持下去，在白色恐怖中以共产党人的信念去工作，去撒播革命火种，唤醒广大群众进入斗争行列。”

“不，不啊！陈毅，我的老天！”我绝望地喊了起来，疯一般抓起他床头的手枪。

陈毅眼疾手快地按住我的手。

“陈毅，就算我革命到底，被反动派捉住也是个死字，让那帮畜生们强暴侮辱，不如今日一死，求个清自身躯。陈毅，你蛮狠心嘛，让我死吧，让我早点闭眼，‘一了百了’。”我哭着，转过身扑通跪下：“陈毅，你开枪呀！陈毅，你一枪崩了我嘛……”

“赖月明，听着，你是党员，你是我陈毅的老婆。要不要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你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陈毅死死地握住枪柄，额上的青筋暴跳：“警卫员，进来！把她拉起来。”

第十日，我被迫离开了陈毅。我，赖月明，今生今世，直至躺在棺材里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34年10月20日——我离开陈毅的最后一刻，他是这么说的：“记住，坚强地活下去！要相信，不管怎样，组织会找你的，一定会找你的。月明，我也会找你的。”

人生苦酒

悲剧性的主人公赖月明怎么也无法预料，陈毅活着，并且在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在赣南，指挥留下的红军队伍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那是在1937年，国共两党宣告合作之后，历经艰辛的陈毅奉命带领游击队离开根据地油山，在南方组建新四军，抗击南下的日本侵略者。

离开油山的时候，陈毅先后数次派人往兴国寻访心爱的妻子赖月明，当地群众都声称赖月明在兴国县城跳井自杀了。

陈毅不无伤感地对游击队负责人杨尚奎、危秀英说：“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再次寻找赖月明，无论如何，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然而，派去寻找赖月明的人，都失望而归。

原来赖月明并没有死，说她跳井自杀了，是她那做伪保长的父亲有意布下的迷魂阵。

离开陈毅后，江西处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赖月明失掉了组织关系。为了躲避反革命分子的屠杀，她四处流浪，行乞度日。后被父亲领人捉住，卖给了一个鞋匠，第二年鞋匠客死他乡。几年后，她又再次出嫁，嫁给了一个回乡务农的伤残红军战士，生下一女二男。1959年赖月明从报纸上看到陈毅接见外宾的照片，才得知陈毅还活着。她想上北京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和子女拦住。咫尺天涯不能相见。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再次品尝了人生的苦酒。

1972年报纸公布了陈毅逝世的消息，赖月明悲痛欲绝，燃香遥悼。她真正生不能与陈毅聚首，死亦难以灵堂相祭。

为陈毅殉情的肖菊英

王昊 朱耿

陈毅元帅有首诗写道：“泉台幽幽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谁说而今人何在，依稀门角见玉姿。”这首诗是陈毅哀悼亡妻肖菊英的。

肖菊英是江西信丰人，1930年初夏陈毅任红二十二军军长，并兼任在信丰县城办的红军干部学校校长。肖菊英就是由县高小毕业后进红军干校学习，然后被分配在红二十二军司令部担任秘书。

一天，月亮刚刚爬上树梢，微亮的月光照着街头来来往往的人们。陈毅穿着一套便服，和钱益民、肖菊英在街头散步。他们穿过大街，走到一家美味餐馆门前，钱益民一手拉住陈毅，另一手拉住肖菊英，跨进餐馆门槛。老板见军长光临，忙笑脸相迎，立即叫伙计炒了几道好菜送上。陈毅与肖菊英面对面相坐在八仙桌旁，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肖菊英；而肖菊英敏感地注视着军长陈毅的含情神态，羞涩地低下了头。钱益民看着这微妙的传情，心里一阵喜悦，立刻借故离开了餐桌。

原来，这是军政治委员邱益三精心安排的。它终于引发了陈毅和肖菊英隐藏在内心的爱情火花的碰撞。

此刻，平时热忱豪爽、勇敢自信的军长在一个纤弱的姑娘面前，却显得十分腼腆。

他竭力掩饰内心深处的渴望，一言不发，只是不断地用筷子把菜送到肖菊英的碗里。

10月下旬，陈毅率红二十二军到达泰和县城，他和肖菊英就在这里举行了婚礼。

肖菊英这个年轻的山城姑娘，不仅“玉姿”，还是陈毅的“中年”之“友”。当年的“毕业生”，数理化差点劲，语文造诣还是高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有点水平的。经过战争离乱，肖菊英的墨迹已经荡然无存。但是，陈毅诗曰：“检点遗篇几首诗”，肖菊英是有“遗篇”，有“几首诗”的。纯情的诗，纯情的爱，陈毅能不“几回读罢几回痴”呢？

1931年，由于肃反扩大化，波及到当时的陈毅。虽然陈毅是坚强的，可是那时候的肖菊英毕竟太年轻了。当时的赣西南特委驻在兴国县城刘氏宗祠大院，一天陈毅接到了通知，要他到吉安开会，他预计此行凶多吉少。肖菊英日夜担忧，好像准备永诀般地把陈毅送给她一支派克钢笔托人带给她的哥哥。

早晨，天空阴沉沉的，一片浓云压了下来，空中飘着霏霏细雨。陈毅披着一件破旧棉袄，漫步在大院里。大院里有口水井，他走到井边，一只脚跨在井台上，眯着眼睛朝北面凝视着远方。细心的肖菊英前几天已经发现陈毅面容焦虑，好像要发生什么不祥的大事。所以，这天肖菊英一大早便起床，跟在陈毅后面。她轻轻地走到陈毅身边，低声说：“棉袄湿啦，进屋去吧。”陈毅深情地对肖菊英说：“此行吉安，凶多吉少，若有意外，你还年轻，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能离开革命队伍喽！”肖菊英痛苦地依偎在陈毅的怀里，低声说：“我等你平安回来。”

离别时，陈毅又叮嘱肖菊英：“三天人不回，必有信；信不见，就难免出了事喽！”说完，他就跃上马背，带着两个警卫员向北奔去。

三昼夜过去了。肖菊英望眼欲穿等着陈毅归来。晚上，她久久站在窗前遥望北方。

深夜，她隐隐听到急促奔跑的马蹄声，便飞快冲出大门，但没有看到

陈毅从马背上纵身跳下，肖菊英作了自己的抉择……

陈毅原本能如期归来，未料途中遭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只好与警卫员绕道步行返回兴国城。等到陈毅回来时，肖菊英已经丧生在那口深井之中了！陈毅总算赶上了她的葬礼。葬礼之后，深夜冥思，“检点遗篇几首诗”，思绪万千，陈毅写下悼亡的纯情诗篇。

郭沫若与陈毅的诗交

冯锡刚

郭沫若以《女神》为中国现代新诗奠基而声名大振时，陈毅则是出洋勤工俭学的无名学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陈毅开始写白话诗，给他影响最大的文学家，是鲁迅和郭沫若。1925年2月，陈毅在《我们的生活》一文中论及鲁郭：“白话文体在文学方面的运用亦六七年了，中间只有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可以称是艺术上的东西。……郭沫若的诗，我以为他的气宇要比其他的诗翁大一点。”话说得绝对了些，但能从文坛百家中独推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洵为卓识。他对郭诗从“气宇”上着眼，正是把握了时代精神。后来，陈毅成为职业革命家并走上军事斗争的道路，诗歌创作从未中辍。

三十年代中期，郭沫若流亡日本作学术研究时，陈毅在赣南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写出了最负盛名的《梅岭三章》。后来郭沫若读到这篇足以传世的绝唱，推崇备至：“陈老总的一辈子，只有在他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时候，才写出了这样的诗。这是真正用鲜血、用生命写出来的诗！诗如其人。这几首诗，就够陈老总永垂不朽的了！”

彼此心仪已久，待得面识则是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1954年陈毅由上海奉调中央出任主管文教科的常务副总理，与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在京都，论政衡文，鉴赏书画，切磋诗艺，过从甚密。1955年5月，陈毅陪同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获得巨大成功退抵北京，接读郭沫若赋赠七律一首：

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 / 凯歌淮海中原定，敷扬文教外患民。 / 赢得光荣归党国，坐镇吴淞为人民。 / 修篁最爱莫干好，数曲新词猿鸟亲。

诗人不愧为大家，在所有关于陈毅的诗作中，这是流传最广泛的佳作，一句“数曲新词猿鸟亲”写尽了郭沫若读陈毅诗词的感受。

陈毅很想回赠一诗以表达多年来的情意，“每每因不能成篇而罢”。相隔两年的五月间，陈毅在京城玉泉山养病期间读到郭沫若《五一节天安门之夜》，“觉得是首好诗。

喜从中来，欣然命笔奉和”。这是一首长达170余行的白话诗《赠郭沫若同志》，兹录首尾两节。

我早年读过你的诗集《星空》、《天上的街市》那首诗曾引起我的同情。现在读你的新作《五一节天安门之夜》，引起我的回忆，我的对比，我的共鸣！

沫若同志，你，人民的诗人。你三十年前写的《凤凰涅槃》，预先歌颂了新中国的诞生。今后三十年还需要你歌唱不停，歌唱我们开辟更大的旅程，歌唱我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歌唱我们自己就是命运之神！

这是革命家对诗人的诚挚祝愿和由衷期冀。

1964年3月，陈毅陪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四国回到北京，郭沫若为这次“中国外交史和世界外交史上少见的”盛举获得成功而欢欣鼓舞。应陈毅之请，郭沫若书写了长3.5米，宽70厘米的大幅联语：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这既是诗人的崇高赞誉，也是革命家的自我奋勉。

沈尹默赠陈毅的书法长卷

申宕

在上海市档案馆浩若烟海的馆藏之中，蕴藏着许多弥足珍贵的名家字画，其中一幅宽0.27米，长达5米的沈尹默赠陈毅诗词长卷，尤其引人注目。

沈尹默，号秋明，浙江吴兴人，1883年6月生于陕西汉阳。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13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并与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倡导新文学运动。沈尹默擅长写作古体诗词，作品精雅秀逸，为当时诗坛所推重。

沈尹默自幼学习书法，用笔古劲秀逸，深得二王神韵，颇具晋唐法度，堪称一代大家。

上海解放不久，正值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之时，陈毅市长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轻车简从，登门拜访沈尹默，陈毅一进客厅，就与沈尹默亲切握手，说：“我拜访上海市高级知识分子，第一个就是你沈老。”在探询了沈尹默的日常生活情况后，陈毅又说：“我们党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党对知识分子是很尊重的。你可以到北京去看看，可以去见见毛主席。”一席话使沈尹默老人备感关怀。未几，沈尹默就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而后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沈尹默接受周恩来总理的聘请，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9年，沈尹默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特地设宴款待。席间沈尹默对陈毅说：“陈老总，新中国成立了这么多年，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你对围棋很重视，已经有了组织，但对书法为什么不抓一抓呀？日本现在学书法的人很多，我们再不抓紧，今后怎么与人家交流？”陈毅仔细地听取了沈尹默的意见和设想，颇为赞同。不久，经中央批准，上海市成立了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沈尹默任主任委员。

陈毅工作之余，喜作诗词，爱好书法。经常请沈尹默写字，除抄录古人诗词外，还索要沈尹默自己创作的诗词歌赋。沈尹默往往欣然从命，书录甚多，奉教于陈毅，该长卷就是其中之一。

此卷书录沈尹默1941年、1943年杂咏诗53首，系滞留重庆时所作。卷首钤有两方起首章，一曰“吴兴”，一曰“游而不周”。落款为：“尹默”，

未署日期。卷尾铃有白文“沈尹默”名章，名字四周饰以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图案。名章之下铃有朱文“秋明室”书斋印章。限于篇幅，卷内诗词且不一一枚举，特拣出杂咏一首，以飨同好——

“羲之笼白鹅，乃写道德经。山阴一道士，亦遂声与名。虽然同所好，正尔异其情。

运之形神间，谁复别重轻。”

周恩来给陈毅创作假

冼济华

1958年4月的一天晚上，中央实验话剧院在首都剧场演出郭沫若的名剧《棠棣之花》，周总理观看完后，对这个戏的灯光很不满意，他回忆起这个戏抗战时期在重庆演出的情景，他说，那是多么艰苦的演出条件啊，有时连电灯也没有，就用汽灯，甚至马灯，但也要想尽办法，用好灯光，创造出应有的氛围和艺术效果。现在我们的舞台条件好多了，一定要把演出舞台的各方面都搞好。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很快，剧院的演职员就下放到河北省涿鹿县农村劳动锻炼、深入生活。几个月后，创作排演出喜剧《桑阳河畔喜事多》，用几个小故事，反映农村的巨大变化和新风貌，这年11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听鹏馆观看了这个戏的片段，而后与剧院同志共进午餐。游本昌这时才20多岁，十分活跃，吃饭间他举起杯来兴奋地说：“为我们的常胜将军陈老总，干杯！”“哪里有什么常胜将军啊！”陈毅副总理操四川口音马上接着话茬说：“我也吃过败仗嘛，只不过没有大败仗，小败仗总有的。”他接着说，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许许多多的好同志，许许多多指挥员、战士，都奋不顾身、英勇地牺牲了，此时，他举杯站起激动地说：“为死难烈士干杯！”于是大家都跟着举起杯来。陈毅副总理话题一转，指着他身边的夫人张茜说：“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位朋友，张茜过去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是你们的同行罗。”剧院听说陈毅副总理有写一部反映我党早期革命斗争的戏的想法就请他动笔赶快写，他说：“我要完成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没有时间写呀。”这时周总理马上说：“你写吧，我给你创作假。”同志们都跟着鼓掌欢呼起来。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坐在不同的两桌吃饭时，周总理先后给同桌的人夹菜。有一盘清蒸清江鲩鱼，他夹了一块给身边的于蓝，然后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说这鲩鱼是最好的淡水鱼之一，产量很少。烹调时必须带鳞才鲜美，但鱼鳞本身又不可口。过去有一个婆婆刁难刚过门的儿媳妇，问能不能做鲩鱼既好吃但又没有鳞呢？这儿媳妇很聪明，她想了个办法，把鱼鳞先打下来，再用针线串起来复盖在鱼身上，一起清蒸。这鱼蒸好后才把盖在上面的鳞剥掉，终于得到婆婆的满口夸赞。

吃过午饭，周总理游兴甚浓，提议一道去登佛香阁，在同志们的簇拥下，健步登上了佛香阁。然后又和同志们乘游艇，畅游昆明湖，游玩间，周总理和同志们聊天，恳谈创作中的问题。

翌日周总理给邓颖超的信中这样写道：“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

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只是小兰被沙可夫、岳慎夫妇带去，她还问奶奶好。实验剧院同志都托我问你好。他们在农村、市区参加劳动锻炼，编了几个活报剧演给我们看，内容和演技都好，证明他们下去确有收获。陈毅、张茜两同志带了珊珊同去。我们在日光下玩了三个多钟头，并吃了他们一顿饭。他们主要目的，是请陈总为他们写剧本，我沾了光……”

王统照介绍陈毅入文会

孔亚兵

提起陈毅元帅，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其实，如果不是处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会首先成为一位文学家。

20年代初，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担任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编辑兼“文学研究会”北京分会书记干事。年仅22岁的陈毅正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

因为爱好文学，陈毅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王统照是他的入会介绍人。

1942年3月，身为新四军代理军长的陈毅在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中曾这样记述他的文学生涯：“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围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1923年冬，我到北京人中法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这期间，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爱好。”事实上，在加入“文学研究会”前后的一个时期，陈毅的确写过不少文学作品，有小说、诗歌和散文，也有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还有文艺理论文章，如：《论劳动文艺》、《对罗曼·罗兰及其英雄主义的批评》、《对巴尔比士著作的介绍》、《在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与徐志摩的争论》等。

他的这些文学活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王统照先生的扶持与帮助，尤其是王统照等人所竭力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对陈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一次，当谈论起文艺与人生的关系时，年轻的陈毅慷慨激昂地对王统照说：“搞艺术是为了人民，拿起武器干革命也是为了人民。现在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严寒笼罩着大地，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祖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后来，革命斗争的需要使陈毅不得不投笔从戎。但是，作为文艺的引路人，王统照先生始终是他崇敬的良师益友。1957年11月王统照病逝，陈毅元帅闻知后，满怀深情地写下《剑三今何在》长诗，以示悼念（剑三是王统照的字）。现录其中四首：

剑三今何在？墓木将拱草深盖。四十年来风云急，书生本色能自爱。
剑三今何在？忆昔北京共文会。君说文艺为人生，我说革命无例外。
剑三今何在？爱国篇章寄深爱。一叶童心我爱读，评君雕琢君不怪。
剑三今何在？文学史上占席位。只以点滴献人民，莫言全能永不坏。

迎接陈毅下山的国民党“七品官”

赵德章“百老汇”忽来江西客

1949年11月，解放才半年多的上海百废待兴，作为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集军务、政务于一身，真可谓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一天，得悉应他邀请来沪的一位江西客人已经到达，他显得特别高兴，无奈公务繁忙未能及时会晤，只好委托秘书代为接待，然后送客人到当时堪称一流的“百老汇”（今上海大厦）住下休息。

来客年近半百，中等身材，穿一身半旧的黑哔叽中山装，清瘦的面颊略显苍白、憔悴。

住进“百老汇”后，他除了一日三餐进出膳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置身在房间里，不是看书看报，就是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些什么。房间里的电话铃偶尔也会响起，那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每当这时，他总是攥紧话筒道谢不迭，心中似在翻腾感情的波涛。

他，就是当年大庾县县长彭育英。

林伯渠南昌荐贤明

彭育英，别号少武，1900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乡，18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五年后学成归国，先后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省长总署秘书等职。1926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在北伐军第六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抵达南昌后，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工作接触中对彭育英的人品才干颇有好感，遂向省政务委员会推荐，委之以虔南县（今全南县）县长，彭育英由此加入国民党。

虔南县是江西省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县，民间素有“小小南县，一泡尿撒遍，县官打老婆，全城听得见”的戏语。在这样一个既偏僻又清静的山城当个一县之长，对不善言谈、性喜种草养花的彭育英来说，本是再恰当不过的所在。岂料好景不长，“四·一二”政变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此后兵荒马乱，彭育英几乎每隔一二年就要奉调易地做官。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1936年5月竟被突然调往大庾县（今大余县）当县长，由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

陷泥淖赴任大庾县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奉命留下的项英、陈毅等同志于1935年春突破敌人重围，到达赣粤边领导南方游击斗争。大庾县属游击区范围，梅山便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陈毅进山，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为之坐立不安，会同广东军阀连连派重兵“清剿”。

然而“剿”了两年，碰得焦头烂额，毫无进展。老谋深算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心生一计，决定撤换“清剿”不力的大庾县县长，重新选派心腹干才前去接任，以加强边界地区的政权。

熊式辉马上想到了彭育英。他和彭育英都是江西籍人氏，先后赴日本求学，同校攻读，当时过从甚密，颇有交情。于是一道令下，彭育英不得不

赶赴大庾主政。熊式辉不但委任他为大庾县县长，还冠以“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把他推上了与陈毅领导的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刀枪相对的境地。然而，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东奔西袭，出没无常，“清剿”、“招抚”谈何容易！彭育英上任一年后，便深感困难重重，无计可施。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无奈的心境，喟然叹道：“年来迭经育英联合各县团队，呈请地方驻军，数次会剿，但因山岭复杂，此剿彼窜，鲜奏肤功。”

识大局幡然觅新途

此时，日寇侵华步步升级。陈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8月8日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彭育英审时度势，感到趁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确是上策，便于8月27日签发“简秘代电”，派人分送赣粤边界各游击区，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欢迎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认为，这样“能多保存一份元气，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抗战实力。”可是，少数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却借机大造谣言，说什么“共匪要求投诚”，游击队要下山“自新”、“归顺”云云。对此，陈毅无比愤慨，于旧历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书函彭育英，义正辞严地指出：“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

在这封长达千余字的信中，陈毅也高度评价了彭育英发出的“简秘代电”：“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

彭育英毕竟有着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他当机立断，首先一改“奸党”、“共匪”等诬蔑共产党、游击队的咒语，而以“友党”、“爱国志士”相称，并公开发表了停止清剿游击队的“和平声明”。接着，他一面以“招抚委员会”的名义，通电湘粤边界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以示诚信；一面派秘书鲁炯雯带着他的手札，翻山越岭四下寻访游击队，约期会面磋商。

陈毅对彭育英的举动深为赞赏，不无幽默地称其为“国统区难能可贵的七品官”。

钟鼓岩一握释干戈

1937年9月6日，这是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彭育英亲率秘书、管印文书、经征处主任等五人，带着香烟、茶点，乘着一辆汽车到达钟鼓岩的寺院内。陈毅带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代表一行五人，亦爬山涉水如约前来。

双方代表一见面就自报“家门”，互通姓名。陈毅不卑不亢，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就是游击队的那个老陈——陈毅。”

彭育英早就风闻陈毅文武兼备，豪爽大方，如今亲眼目睹，心中钦敬之意倍生，但毕竟是头一回相见，不免有些拘谨。

彭育英歉疚地说：“共产党、游击队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我们要联合抗日。过去剿你们不对，错了！”陈毅朗声大笑起来，他用力握住彭育英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交朋友了！”

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磋商，谈妥了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一再向陈毅表示：“你们下山、进城，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此后，彭育英果不食言，不辞劳怨地为合作抗日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组织商民代表、学生队伍和军乐队，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热烈欢迎以陈毅为首的中共赣粤边特委一部分领导同志下山，进入大庾县城；他腾出最好的房舍，精心安置陈毅等同志住宿，不时送去酒、肉、和炼乳，以示慰劳，还找人特意从广州买来特效药“606”，治愈陈毅同志身上的疥疮；他大胆提出撤退“清剿”游击区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意见，并通过江西省政府转报国民党中央政府予以采纳，果断结束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局面；他下令开释已判罪监禁的方志敏烈士的爱人缪敏、毛泽覃烈士的爱人贺怡，并送她们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治病休养，还下令周边各县：凡在监禁的中共党员，不论判罪与否，立即全部释放……

中共赣粤边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顺利进行，很快就签署了关于游击队下山的协议。接着，彭育英又亲自陪同陈毅赴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经过陈毅有理有节的斗争和彭育英的侧面帮助，仅两天时间就解决了各地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的有关问题。

撕“党证”愤然离官场

彭育英做了一桩桩有助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好事，自认为堂堂正正、无可非议。孰料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后，他便遭到了大庾地方顽劣势力和军统特务分子的排挤攻击，他们联名上书控告彭育英，说他“勾结共产，蹂躏地方，大搞赤化”。无奈国共合作大势所趋，彭育英又有熊式辉作“靠山”，这场“逐彭”闹剧才没有演成。

但是彭育英的日子从此再未好过。自1939年初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国共间的磨擦日益加剧。彭育英处境艰难，如履薄冰，他深感留在大庾必有凶险，便毅然弃任赴省，当面向熊式辉提出辞呈。熊式辉婉言相劝，再三抚挽，并采取权宜之计，让他与黎川县县长任和声对调。彭育英碍于情面，勉强走马黎川。

形势的发展，使彭育英对国民党的前途深感失望，终于果断作出抉择：走！1941年，趁国民党党员总登记之机，他愤然撕毁“党证”，辞去黎川县县长之职，就此终止“七品官”生涯，赋闲半年后，到景德镇当了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

1949年5月，彭育英重回赣南，任江西银行赣州分行经理。此时，向全国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陈毅麾下的第三野战军已突破长江天险，攻克南京、上海。处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赣州，反动势力依然十分嚣张，当年协助陈毅下山的彭育英，又成了他们泄恨的目标。为防不测，彭育英打点行装逃离赣州。谁知当他进入会昌山区时，竟遭到一伙国民党散兵的抢劫，他随身携带的行李财物顷刻被洗劫殆尽。

伸援手陈毅念旧情

至此，彭育英已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万安老家还有妻儿老小需供养。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传来了赣州解放的消息。于是，他一扫落寞抑郁之气，只身回到响彻欢庆锣鼓的赣州，试图重新寻找生路。

一天，彭育英当年的管印文书赖志刚给他找来一张报纸，报上刊登着陈毅已经出任华东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消息。彭育英犹如得悉阔别多

年的亲友有了下落，一把抢过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当年陈毅豪爽大方的形象。夜里，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多么想去投奔陈毅啊！然而，梅岭一别，毕竟时过境迁。如今的陈毅非同往昔，他身居高位，手掌大权，是否还记得当年与他握手言和的“七品官”呢？犹疑不决的彭育英，试探性地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很快寄到了上海，展开在市长办公室的桌头。陈毅读后很是感慨。他离开赣南后虽然戎马倥偬，身经百战，又与国民党军队连打了五年，但他依旧无比珍视国共合作抗日的那段岁月，尤其感念当年曾用礼乐迎接他下山的彭育英。于是，他立即嘱咐秘书，复电诚邀彭育英来沪。

捧着陈毅的复电，彭育英又惊又喜，热泪夺眶而出。星移斗转十数载，共产党人陈毅果然不忘旧情，而且是那样的善察人意，善解人心，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

此时适逢中共赣西南工委进驻赣州。彭育英探问到工委的驻地后，便带着陈毅的复电去找工委书记杨尚奎。

杨尚奎曾经和陈毅一道领导赣粤边游击斗争，也曾同彭育英打过多次交道，对他印象颇深。现在，当他得知陈毅来电邀请彭育英去沪，不禁大为高兴，立即嘱咐人为彭育英办好去沪的车票和通行证，并亲笔写了给陈毅、曾山两位同志的信交给彭育英带上，又特意说明：曾山同志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就这样，彭育英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到达上海。

浦江畔笑语留嘉宾

195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彭育英房间里的电话铃骤然响起。他连忙抓起话筒接听，原来是市府办公厅通知他，陈毅市长和曾山主任已驱车来“百老汇”。

彭育英激动不已，忙把房间收拾好，正欲出去迎接，陈毅和曾山却已笑呵呵地跨进门来。待双方坐定，一番寒暄之后，彭育英感慨地对陈毅说：“我此生难忘两个人，一个是熊式辉，是他把我推上与人民为敌的死路；一个就是你，百般感召教化我，使我殊途同归，走上了光明之路。”陈毅问：“听说熊式辉逃到香港去了？”彭育英说：“他是发动内战的四十三名首要战犯之一，罪孽重大，怕杀头呢。”陈毅笑道：“战犯不一定就杀头，也可以改造嘛，就是现在他也可以回大陆来嘛！”彭育英见陈毅言语情态一如当年，毫无胜利者的架子，敬佩之情难以言表，只是不住地点头称“是”。“老彭，你就不要回江西去了。”陈毅忽然话题一转，带着征询的口气说，“是不是就在上海做点工作？”“工作？”彭育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沉吟有顷，才慢条斯理地说，“我能做什么呢？要么就搞老本行，金融工作。请你考虑……”“还考虑啥子哟！”陈毅指了指曾山，说：“财经委员会主任就在这里，现在就可定下来嘛！”

曾山慨然应允：“就让老彭到银行去吧。”

从此，彭育英走进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干部花名册上有了他的名字，职务是“提篮桥办事处第一副主任”。后来，他又被安排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彭育英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尽心尽力，似在回报共产党人的厚遇。不幸的是，在十年动乱中，他也受到严重摧残，于1968年12月5日在上海病逝，终年68岁。十一年后的1979年4月17日，当时的上海市革命

委员会参事室，在龙华举行了“彭育英先生追悼会”，公正评价了他的一生。

叶剑英与陈毅的诗交

曹应旺

叶剑英和陈毅同为文武兼备的“儒将”，两人都擅长写诗。《叶剑英诗词选集》中有四首诗是写陈毅的，这四首诗寓意深刻，格调高昂，反映了两位元帅之间的亲密交往和深厚情谊。

叶剑英诗戏陈毅

建国头几年，叶剑英在华南和中南主持工作，陈毅在上海、华东主持工作，均是肩负重任、为政一方的地方大员。1954年，叶剑英离开华南和中南的领导岗位，调入中央，开始投身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陈毅也于这一年从上海、华东调入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这年12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们相聚在一起。陈毅以鲨鱼皮包赠叶剑英，叶剑英即席戏作诗一首：

故人赠我以皮包，何以报之芒果好。

芒果迢迢在远方，何以致之将铁鸟。

叶剑英诗赠陈毅

1966年“文革”开始后，叶剑英和陈毅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10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各省市、中央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受到了冲击。11月8日，军队院校某些“造反派”头头，又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冲击国防部。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叶剑英和陈毅在会上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11月29日，叶剑英和陈毅又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叶剑英在讲话中，针对一些错误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误的啊！”陈毅在会上说：“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对待，不要把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林彪、江青一伙，对叶剑英和陈毅的上述两次讲话十分恼怒。叶剑英针对林彪、江青等人挑动某些群众组织批判他和陈毅的两次讲话这件事，特意赠陈毅《虞美人》词一首：

串连炮打何时了，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词是投向林彪、江青一伙的匕首，是献给陈毅的友谊花环。陈毅默读着，被这首大胆针砭时弊、坦荡直抒胸怀的词章打动了。他提笔在叶剑英词旁边批了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绝妙好词！”

叶剑英诗慰陈毅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又多次对所谓“二月逆流”横加罪名。1969年10月，他们以战备为名，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赶出北京。叶剑英辗转于长沙、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和张茜一起去了石家庄。

从1970年7月开始，陈毅在石家庄经常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但直到1970年10月下旬，他才回到北京住进301医院。但在“医疗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下，陈毅住院56天，竟无一次会诊。1971年1月16日，陈毅做切除阑尾手术，才发现患的是肠癌，并已有局部转移。

在陈毅生命最后的日子，叶剑英几乎每天都来探望。他看着陈毅十分虚弱的身体，不忍让陈毅劳神，经常只在病房里稍坐一会便告辞出来。然而，走出病房又不愿马上离去，他双手背在身后，垂头无语、步履沉重地长久徘徊在陈毅病房门里。这沉重的脚步，凝结了老战友多少真挚的友情和惦念啊！

1971年12月19日，叶剑英满怀深情地写下《慰陈毅同志》诗一首。诗前有“毅公卧病，诗以慰之”八字。诗曰：

君子坦荡荡，于人日浩然。
赣南危不屈，福建错能悛。
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禅。
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

使陈毅在弥留之际感到宽慰的是，叶剑英带来了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话。

那天，陈毅问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叶帅来了没有？”叶剑英闻讯赶到病房，望着生命垂危的老战友，泪流满面，讲不出话来。他颤抖着双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

毛泽东说：“现在再也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当时是‘五·一六、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打击一大片，包括你（指周恩来）在内。当时那个情况，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以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

听到这里，陈毅黯淡的双眼眨动了一下，他听到了他想听到的话，尽管来得太晚。

叶剑英诗悼陈毅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叶剑英多次去向陈毅遗体告别，每次都痛哭失声，泪如雨下。痛彻的思念，满腔的义愤，他构思了一首五言绝句《悼陈毅同志》：

鬼域含沙射，元良息仔肩。
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

1976年，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后，叶剑英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在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叶剑英是按照他在《悼陈毅同志》诗中所表达的志向去书写历史的。“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是叶剑英对九泉之下的老战友陈毅的最好纪念。

